
蘇軾研究

2020年第2期（总第61期）

（季刊）

卷首语

在川西坝子农村，有竹林便有人家。质朴的小院大多隐没在郁郁葱葱的竹林中，在每一个炊烟袅袅的黄昏，散发出脉脉的温情。

苏轼是土生土长的眉山人，从小在川西坝子的林盘中长大，竹林赋予他无数的灵气，带给他无数的快乐、惊喜和回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念念不忘家乡的竹林：“渐入西南风景变，道边修竹水潺潺”“梦寻西南路，默数长短亭。……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马下”“何时翠竹江村路，送我柴门月色新”“只疑归梦西南去，翠竹江村绕白沙”……慈竹林，是他表达乡心的符号，是他辗转无尽的乡愁。

四月，正是吃笋的好时节。今年的四月，尤其有意义。遭遇新型病毒攻击的城市已重获生机，人们在经历了惊恐、茫然、痛苦后，用勇气、担当和坚持迎来了新生。这正如吃笋的过程，苦涩之后竟是淡淡的回甘。

窗外，绿色正浓！

蘇軾

2020年第2期（总第61期）

（季刊）

- 编辑出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
《苏轼研究》编辑部
- 委印单位：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 主管单位：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
- 主 编：周裕锴
- 副 主 编：潘殊闲 方永江
- 责任编辑：刘清泉
- 编 辑：袁 丁
- 编 务：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 312 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h.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印数：2000 册
发送：苏轼研究学者、爱好者，有关高校及图书馆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眉山市雅彩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研究 SUSHI YANJIU



目 录

□苏学论坛

杜甫与苏东坡笔下的川西林盘	张志烈/04
奋力当世，忧国爱民	刘川眉/07
——苏轼“守其初心”的启示	
苏轼家风与他的为官态度	刘小川/10
守其初心，清廉为政	熊朝东/13
回归初心、不负初心、砥砺初心	戴 路/1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启示	
欧苏的“士君子富贵”诗论与廉政思想	张 淘/21
论苏轼的秦汉三国人物评论	马 强/26
东坡与橘	王晋川/31
苏东坡谪琼居儋往返路径考	林冠群/34
苏轼版权保护问题研究	彭林泉/37
苏轼《浣溪沙五首》墨迹辨疑	王琳祥/45
——读《苏轼〈浣溪沙〉词五首笺注之“墨迹”说辨误》有感	

□顾问：慕新海 胡元坤 王影聪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王水照 刘尚荣
张志烈 苏 灿 邱俊鹏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永江 木 斋 王友胜
王希龙 王晋川 卢晓光
刘川眉 刘清泉 孙开中
朱 刚 陈才智 冷成金
李景新 宋明刚 杨胜宽
杨常沙 张海鸥 张 鸣
张忠全 周裕锴 胡先酉
涂普生 康 震 韩国强
蔡心华 熊朝东 潘殊闲

《滕县公堂记》碑修复及源流考 王龙海 李存建/55
苏轼鄂州西山诗的价值与影响(下) 曹万里/58

□诗文鉴赏

苏轼廉政诗文点评二则

饶学刚/64

□苏学专家

扛鼎之作，情系栾城

李升旗/71

——记陈冠明教授的苏味道研究

□新书序评

应似飞鸿踏雪泥

梁家贵/68

——陆志成著《苏东坡与与颍州》评介

□景苏札记

圣方的绝配

方永江/76

□研究史话

“抚视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十二) 舒大刚/69

——历代对苏轼《易传》《书传》《论语说》的研究

□苏学动态

清明祭扫苏洵家族墓地

有 愚/80

郦波“三苏祠”开讲

有 愚/80

杜甫与苏东坡笔下的川西林盘

张志烈

内容提要 本文以杜甫和苏轼对川西林盘的吟唱为例，探讨了源远流长的川西坝子林盘屋基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川西林盘文化给我们重要的启迪。

关键词 杜甫 苏轼 川西林盘 文化内涵 启迪

—

杜甫《堂成》诗云：“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下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多年来一读这首诗，就自然想起熟悉的川西坝子农村的林盘，那些同乡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而又极富情味的事物，鲜明地涌上心头。我忽然悟到杜甫在浣花村建这草堂，其实正是按当时乡村民居的架构在做。林盘屋基大体呈回字形。最外边的是柴门与篱笆或短墙，这在杜诗中曾多次写到。中间的房屋或为四合院，或为三合院及其变体。房舍与篱笆之间的宽大空间，就正是狭义的“林盘”所在，由各种竹子、各种树子，密排地充实。杜甫向朋友要的绵竹、桤木秧、松树秧，以及各种果秧，大都是栽植在这一区域。在正屋堂前面对的院坝中，则专门种植有“四松”和“五桃”。杜甫在《草堂》诗中说“入

门四松在，步屧万竹疏。”又还专门写了一首《四松》诗，写自己对四松的感情和将来的希望。还在《题桃树》诗中写：“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由桃树而抒发对天下苍生的民胞物与之怀。我的总感觉是无论杜甫在草堂还是离开草堂到外地，草堂林盘里的竹树花草，都像亲人朋友一样永远装在他温暖的胸怀中。这对我们是一种深刻的启示。

《堂成》诗中重点凸出的“桤林”和“笼竹”，正好是千余年来川西坝子林盘的基础生物元素。杜甫写桤木，是记录了川西坝子民众生产生活中普遍仰赖的林木之一。杜甫《凭何十一少府觅桤木栽》：“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钱笺引宋子京《益部方物记》：“厥植易安，数年辄林，民家莳之，不三年，材可倍常，故薪之。频种亟取，里人以为利。”说得最准确简要。笔者儿童时代在温江农村桤木林盘中长大，读杜诗并看前人注，更联想到很多事。桤木，属桦木科，落叶乔木。川中千余年来。篱边、道旁、沟边、田埂普遍种植。四、五年后，树干直径可达六、七寸。一般砍伐为薪（未砍时其落叶也是很好的柴）。川西民居住房建筑用材以柏为主，但一般农家也往往用粗大桤木作柱修草房。农家篱笆一般以竹为基础，但需要植柱时，也

常利用桤木树打桩。都江堰自流灌溉，沟渠纵横，水田淹水时，河沟上要扎堰，堰板和堰桩基本上全用桤木。上世纪四十年代，笔者屡见乡村河流上建石板桥。先要建“桥磴”。建桥磴要先打“地符”，就是把碗口粗的桤木削尖钉入河床，又用桤木横顺铺成平台，上面再压石条数层形成“桥磴”，然后才搭上石板作为桥面。为什么打“地符”要用桤木？因为桤木泡在水中久而不腐。现在《辞海》介绍桤木有这样的话：“分布于我国四川、贵州、陕西，木材坚韧，可制器具、农具和建筑材料。”这比古人泛言“不材木”要合于实际多了。

再说“笼竹”。笼竹就是今天川西林盘最常见的大竹品种慈竹。宋朝人所写《益部方物记》载：“慈竹性丛产，根不外引，其密间不容筭（箭杆）。筭生阅岁枝叶乃茂。别有数种：节间容八九寸者曰笼竹，一尺者曰苦竹，弱梢垂地者曰钓丝竹。或取节修肤致者用为簾笠。”“笼”和“慈”都是形容这种竹子生长的形态特征，初唐人王勃的《慈竹赋》说得最明白：“广汉山谷，有竹名慈。生必向内，示不离本。修茎巨叶，攒根沓柢。丛之大者，或至百千株焉，而萦乎咫步……若乃宗生族茂，天长地久。百柢争盘，千株竞纠，如母子之钩带，似闺门之悌友，恐孤秀而成危，每群居而自守。”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我们说了多年的“林盘”这个词，与王勃《慈竹赋》中这个“盘”字应该是有联系的。《慈竹赋》中对慈竹生长特性的精确描绘，使我们在走进杜甫草堂博物馆和薛涛公园看到那参天盖地的一笼笼高大慈竹时更能感受它的气势和风采。

说到慈竹与川西坝子民居的生产、生活的极密切的关系，简直是个大话题了。笔者几岁即学会划篾条编制从小到大的竹器，如

漏瓢、筲箕、簸箕、筛子、箢篼、背篼、菜篮等等。大型竹器要请篾匠做的，如凉席、箩筐、晒簟等等。今本《辞海》介绍“慈竹”说：“亦称子母竹，钓鱼慈。禾本科。秆材坚韧，一般用以劈蔑编扎竹器，又可作造纸原料或捣制竹筋，和拌石灰粉墙，竹箨可作布鞋底填充物。筭微苦，可食用。”应该补充的还有两点，一是建草房时房顶盖草，下面必用竹竿、竹片扎架；二是都江堰水系治理工程用的“笼篼”都用大慈竹编织，内装大鹅卵石头，这是水利史上重要的科技创造。

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每个民族应对其所处环境的总成就。文化是显示人类在向真善美迈进的过程中一定发展水平的标识。源远流长的川西坝子林盘屋基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是无比丰富的。我们就杜甫一首诗的吟唱举个例，就可见古蜀先民在生产创造、生活安排上的智慧和情味。人深刻认知和把握自己的环境，是为“求真”，按照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理想追求去努力实践，是为“求善”，而这两者的历史统一，就是在“创美”。这是今天认识研究川西林盘文化给我们重要的启迪。

二

苏东坡和杜甫都是中华优秀传统哺育出来的文化巨星，又都熟知川西坝子风俗民情，所以虽然相隔三百多年，却是心有灵犀。杜甫感兴趣的川西土生土长文化，苏东坡同样极为怀思。

东坡谪居黄州时，怀念蜀中家乡，曾写下帖。在《式古堂书画汇考·书》中，标题为《书杜工部桤木诗卷》。全帖共19行，161字。前7行所写即杜甫《堂成》诗，共

56字。后12行共105字，是东坡写的跋语，一般转录文献称之为《题杜子美桤木诗后》。此帖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跋语全文如下：

蜀中多桤木，读如欹仄之“欹”。散材也，独中薪耳。然易长，三年乃拱。故子美诗云：“饱闻桤木三年大，为致溪边十亩阴。”凡木所芘，其地则瘠。惟桤不然，叶落泥水中辄腐，能肥田，甚于粪壤，故田家喜种之。得风，叶声发发，如白杨也。“吟风”之句，尤为纪实云。笼竹，亦蜀中竹名也。苏轼

这段话表明东坡对杜甫《堂成》诗记载的内容很有兴味，对其诗艺很欣赏，对林盘事物、田园风光中承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深厚的理解和发自内心的热爱。

杜诗中写道的桤林和笼竹，东坡诗中也多次提到。元丰八年（1085）所作《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观，将老焉》诗中说：“我欲归寻万里桥，水花风叶暮萧萧。芋魁径尺谁能尽，桤木三年已足烧。”怀念和赞美的感情，溢于言表。元祐三年（1088）所作《木山》诗中说：“城中古沼浸坤轴，一林瘦竹吾菟裘。二顷良田不难买，三年桤木行可櫞。”这四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很快就要辞官回眉山，买田置宅，建起供我养老的林盘屋基。在同时所写的《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中又说：“汝归莳松菊，环以青琅玕。桤阴三年成，可以挂我冠。清江入城郭，小圃生微澜。相从结茅舍，曝背谈金銮。”这是嘱咐侄儿，你们回去要修建以竹林环绕，桤木丛栽，有松树，有菊花，有沟渠，有苗圃的林盘，我们的院子要挨得近。二天我回来，晒着太阳给你们摆朝廷的龙门阵。东坡先生这时官为翰林学士，可他却真真实实地想过去居住在川西坝子林盘的生活。

无论走到哪里，东坡都念念不忘慈竹林。元祐七年（1092）所写《送运判朱朝奉入蜀》说：“梦寻西南路。默数长短亭。似闻嘉陵江，跳波吹枕屏。送君无一物，清江饮君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马下。”慈竹林，已成为他表达乡心的符号。元祐八年《三月二十日开园三首》其三云：“何时翠竹江村路，送我柴门月色新。”建中靖国元年（1101）所写《留题显圣寺》云：“只疑归梦西南去，翠竹江村绕白沙。”这两处用语，其实都是对杜诗的呼应。杜甫《南邻》：“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对柴门月色新。”共同的审美怀念与审美期盼，是出现这种书写的原因。

苏东坡为什么追步杜甫，如此钟情于川西林盘呢？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在《跋李伯时卜居图》中说：“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虽为搢绅，奉养犹农夫。”《题渊明诗二首》其一云：“陶靖节云：‘平畴返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偶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在徐州谢雨道上所作《浣溪沙》其五说：“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他是从孕育天府文化的成都平原农耕聚落里走出来的人，对川西坝子林盘生活的种种美好的体味长怀胸中。

张志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

奋力当世，忧国爱民 ——苏轼“守其初心”的启示

刘川眉

内容提要 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苏轼提出了“守其初心，始终不变”的理念。苏轼的“初心”是什么？苏轼“守其初心”的理念和廉洁从政的实践，对我们今天广大党员干部有何启示？对涵养新时代廉政文化有何借鉴？本文作者简要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苏轼 初心 奋力当世 忧国爱民 清正廉洁 启示

北宋元祐六年（1091）五月十九日，在京城任翰林学士的56岁的苏轼，给哲宗皇帝上了一篇《杭州召还乞郡状》^{[1]911}，请求继续到地方上任职。“守其初心，始终不变”这句话，便是出自这篇奏状。

初心，这里是初衷、最初的愿望的意思，即做某件事一开始所抱持的信念。两句的意思是：坚持最初的信念，自始至终不改变。

那么，苏轼最早的“初心”是什么呢？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2]1117}中曾这样评价他哥哥，说他从小就“奋力有当世志”。奋力，是激励、振奋的意思；当世，这里是用世、治世之意。这句话的意思是，苏轼从小就奋发向上，勇于担当，有报国治世的宏大志向。苏轼自己也讲，他早岁便怀“齐物志”“济时心”（《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其二）^{[3]274}和“致君尧舜”（《沁园春》孤馆灯青）^{[4]125}的理想。他还说：“不以利禄为意，而以仁厚为心”（《谢监司荐举启》）^{[1]1335}、“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许断来章批答二首》其二）^{[1]1248}。可以说，苏轼的初心就是：奋力当世，忧国爱民。

纵观苏轼的一生，忧国忧民、仁心爱民，是其贯穿始终的理念；涵养清正之气，守道修德，洁身重廉，是其毕生的践行。

笔者认为，尽管已过去近千年的时间，苏轼“守其初心”的理念和清正廉洁的实践，对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保持“初心”，对我们涵养新时代廉政文化，仍然有着积极的借

鉴和启示意义。

一、培育“初心”的沃土：良好家教和勤学修身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苏轼出生在西蜀眉山一个诗书之家。父亲苏洵是一位虽屡试不第，但志存高远、位卑忧国、大器晚成的布衣知识分子。母亲程夫人出身眉山大户，“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坟院记》）^{[2]1240}，是一位有独立意识和坚韧图强性格的知识女性，被司马光誉为“识虑高绝”（《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5]181}的一代贤母。苏轼幼年，父亲苏洵和母亲程夫人便亲授以书，为他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苏轼自己也发奋读书、善于思考、勤于修身，外因加上内因，形成了一块培育“初心”的肥田沃土。

在接受知识教育的同时，苏轼从小就接受其父母的道德教育和家风熏陶。

苏洵和程夫人对苏轼的教育各有侧重。苏洵重在教育他读什么书，怎样读书，让苏轼从小就明白古今成败的道理，立志长大后成为国家社稷的栋梁。程夫人则重在教育他做什么人，怎样做人，让他自幼有一颗善良仁慈之心，有鲜明的道德意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两者既有分工又互为补充，旨在培养苏轼的综合素质。

父亲苏洵教苏轼读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明确的目的，即“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藏书室记》）^{[2]1238}。治身，就是要修身、养性、正心；治人，就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文章写作上，苏洵则要求苏轼保持朴质无华的文风，要“有为而作”，要“言必中当世之过”。（《鬼绎先生诗集叙》）^{[1]313}

母亲程夫人则是把苏轼往立乎大志、不辱苏门，做正直清廉之人的路上引导。十岁时，程夫人为他讲东汉史《范滂传》，范滂不畏奸

佞，反贪治腐，为老百姓勇于献身的故事，令苏轼大为感动，他对母亲说，我将来要做范滂这样的人。

程夫人对苏轼的教育不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体现在行为上，在日常生活中率先垂范。程夫人嫁到苏家后，曾在眉山纱縠行租房开铺做布帛生意。一日，婢女发现租房内地下埋有一个大罐子，罐口上还盖着一块乌木板。婢女以为罐中藏有金银财宝，要打开看看。程夫人见状，坚决予以制止，并叫人把罐子重新埋了。她说，这是别人的东西，不可随意动用。他还告诫苏轼兄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凡非分之财，一分一厘也不能妄取。

小小年纪，苏轼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便“奋厉有当世志”，形成了“忧国爱民”的初心，形成了重节操、重廉洁的品行。

二、人生追求：忧国忧民、“守其初心”

苏轼一生坎坷、宦海沉浮，但无论在什么地方何种岗位，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心系百姓、胸怀天下、“守其初心”。

（一）无论何时何地，都“守其初心”

苏轼二十二岁中进士，二十六岁制科考试入三等（一、二等为虚设），开始步入仕途。苏轼一生，从政四十年，在朝廷担任过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皇帝侍读等要职，在地方做过密州、徐州、杭州、扬州等八个州的知州。但无论是身为朝廷重臣，还是作为地方官员，他都能“守其初心”，坚守“忧国爱民”的理念，做出了至今仍被人称颂的业绩。

在徐州的抗洪抢险中，苏轼身先士卒，临危不惧，亲自坐镇城门楼上，指挥军民垒沙袋，筑长堤，奋力抗洪。抗洪期间，他吃住在城楼上，昼夜巡视，数过府门而不入，整整四十五天没回过家，颇有大禹治水的风范。两个多月后洪水退去，徐州城保住了，全城上万百姓的生命财产保住了。两年后，苏轼调离徐州，徐州父老为他献上金匾：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离徐当日，徐州城万人空巷为他送行，人们俯伏在道路两旁，痛哭失声，十里不断。他却轻描淡写地在诗中写道：“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二）。^{[1]935}

在杭州，苏轼带领百姓疏浚西湖，筑长堤数十里，被百姓誉为“苏公堤”，造福人民直至今日，成为“西湖十景”之首。也是在杭州，为除瘟疫，他将多年积蓄全部捐出，同时动员杭州一些富商捐款，加上公费，创办了中国历

史上首家公费医院——安乐坊，专门收治贫困病人。同时，他还将自己收集的药方，无偿捐给医官和杭州百姓。

在扬州，苏轼不顾车马劳顿，在赴任途中就开始调查研究。在得知扬州农民丰年依然愁眉苦脸、官府催收积欠猛于虎狼的民生疾苦后，他毅然上奏朝廷，免除了民间积欠，为扬州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上任后，苏轼遍访民间，发现扬州前任知州效仿洛阳牡丹花会，在扬州也大搞芍药“万花会”，每年用花上千万枝，给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提供了敲诈勒索百姓的机会，花农们深受其害，苦不堪言。对这个搞排场、趋风雅、祸害百姓的芍药“万花会”，苏轼毫不留情地通令取缔，予以罢除，被扬州百姓誉为“苏贤良”。

在地处边防要地的定州，他整饬军纪，惩治腐败，拨军粮以饱士卒，修营房以稳军心，抓练兵以强战力，使军容军貌焕然一新。同时他还整顿健全民间的武装组织“弓箭社”，建议朝廷给予肯定和扶持，使定州的边防有了明显改善，为强军戍边作出了贡献。

（二）无论顺境逆境，都“守其初心”

苏轼在《晁错论》^{[1]365}一文中曾道：“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一生为官四十年，可被贬谪的时间就长达十二年。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顺境，还是处江湖之远的逆境，苏轼都能不忘初心，替国家分忧，爱民如子，尽其所能地为百姓做好事、办实事。

贬谪黄州时，苏轼得知黄州和邻州一带存在一种溺婴的恶俗：因贫穷难以养育，一对夫妻通常只养二男一女，超过这个数就要将初生婴儿置于水中溺死，对女婴尤其如此，导致当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听闻如此恶俗，苏轼不禁悲从中来，他不顾自己的“罪臣”身份，毅然向官府建议革除这种陋俗。他在自己经济最为拮据时带头捐出十千钱，组织各界人士捐款捐物，拯救溺婴，有效地革除了当地这一陋俗。

贬谪惠州期间，苏轼同样非常关注民生。惠州是广州的通衢之邑，可却被一条东江所隔，两地交通非常不便。此外，惠州也有一个西湖，湖上有一座长桥，但经常毁坏。在他的建议和带头募捐下，惠州修建了有史以来的两座便民大桥——东新桥和西新桥。两桥建成后，惠州百姓高兴地“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西新桥》）。^{[3]2200}

在惠州期间，苏轼还应广州知州王吉之邀，为当时广州百姓“吃水难”问题出谋划策。当时广州城内淡水缺乏，一般市民只能喝又苦

又咸的水，经常染上疾疫。苏轼建议，引二十里外白云山滴水岩的泉水入城，工程采用上万竿大竹，若干大小贮水石槽，非常便利实用。工程竣工后，广州市民无论贫富，都喝上了干净清冽的淡水。这项引水工程，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来水’工程”。

被贬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时，苏轼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与程秀才三首》其一）^{[1]1627}的困苦境况，在载酒堂中，办学堂、开讲习，传播中原文化。在儋州三年，苏轼培养了如姜唐佐、吴子野、葛延之等人才。在苏轼的开化下，海南读书之风盛行，“书声琅琅，弦歌四起”（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6]204}。在苏轼去世后不久的宋大观三年（1109），儋州人符确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到了明清之际，海南学子更是纷纷崛起，一时“人文之盛，贡选之多，为海外所罕见”（《儋州志·选举志》）^{[6]204}。在教诗书礼乐之余，苏轼还鼓励儋州百姓发展农耕，凿井取水，帮助改进农具，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改变落后习俗。

三、定海神针：“守其初心”、拒诱惑

苏轼一生，不仅始终把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个勤政爱民的好官，而且还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个清正廉洁的清官。

在密州任知州时，适逢旱蝗相继，盗贼遍地，饥馑遍野。作为“一把手”，苏轼竟然一贫如洗，厨房里经常空空如也。每天公务之余，他只好到野地采枸杞和野菊充饥，与百姓同甘共苦。不仅如此，他还对未能彻底解决密州人民的苦难内疚不已：“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3]700}。

在杭州，他和同事所居住的官舍多年失修，不久前曾倒塌砸死了人，官吏们都害怕进屋办公。苏轼到任时，偏遇上天灾，久旱复涝，粮食大面积减产。苏轼不顾部分官吏的不满，下令先济饿殍，再修官舍。于是动用官钱购买粮食，再低价卖给百姓，以此来平抑粮价，稳定了民心。

在汴京，小偷连续两夜光顾他家，发现这位翰林学士知制诰的朝廷高官家里，竟没有现存的银子和值钱的东西，一无所获，大失所望而走。苏轼以《梁上君子》为题以记其事。

在常州，苏轼听说自己所买的一处宅子，原是一位老太婆的祖传老宅，因其儿子吃官司

才变卖的。于是他焚烧了自己的房契，无偿还房与屋主老妪……

苏轼既有一系列廉政的实践，更有一套廉政的理念。年轻时，他就写有一篇文章叫《六事廉为本赋》^{[1]28}。六事即六计，是北宋考察官吏的六条标准：一善（善其事，有词誉）；二能（政令畅行）；三敬（不懈于位）；四正（行无倾斜）；五法（守法不失）；六辨（辨然不疑惑）。苏轼认为，这六条标准中，廉是第一位的，是统帅这六条标准的灵魂。文中，苏轼还提出“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观点，认为贪污腐化会毁掉一个人的功业，而清正廉洁则会成就一个人的德行。在当时，这个观点可以说是一个创新。一个官员尽管过去功劳再大，但如果因贪污腐化，就会前功尽弃；而一个官员如果把廉洁自律贯穿到为官从政的始终，就会成就他的美德。

苏轼一生为官，之所以能够守住清贫，留下千古美名，是因为他始终坚守从政以廉为首的文化精神。在治国理政、选人用人的过程中，苏轼主张“循理无私，节用廉取”（《东坡易传》）^[6]，意思是按照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办事，不受私心杂念的影响。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减少对老百姓的索取，从源头上强化各级官员的廉政意识。

苏轼还特别强调清正廉洁要从自己做起。在著名的《赤壁赋》^{[1]6}一文中，他提出“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只要不是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一分一毫也不能去拿。要随时随地加强自我约束，从自己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

在密州期间，苏轼曾修葺一座高台，名曰“超然”，并作文《超然台记》^{[1]351}。文中，他提出一个观点“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意思是说，我之所以无往而不快乐，主要是超然于事物之外。也就是说，人只要学会克制欲望，超然达观，不为外物所困，不为浮名所系，就会知足常乐。

苏轼是北宋士大夫中清正廉洁的楷模，是少有的生前就被老百姓立生祠祝祷的官员之一。苏轼为何能做到这点？我认为，这与他随时随地“守其初心”不无关系。初心，就像一根定海神针，使苏轼能够拒绝来自各方面的诱惑，能够有效抵制各种歪风邪气的入侵。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郑重发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号召；党的十九大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大会主题的关键词。

（下转第 20 页）

苏轼家风与他的为官态度

刘小川

内容提要 良好的家风家教，从童年起就渗入了苏轼的灵魂、塑造了他的品格、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做官四十年，无论做京官还是地方官，都对百姓好，像母亲和祖父一样有一颗仁爱的心，即使贬在荒僻的黄州、惠州、儋州，他照样为百姓谋利益，真正做到了以民为本、清正廉洁、超然物外。

关键词 苏轼 家风 为官态度

有人说过：人在五岁左右以前的经历将影响他的一生。

公元 1036 年，苏轼生在眉山，他的祖父苏序像一本书的序言，像一场大戏的序幕。我们从苏轼回忆祖父的传记文章《苏廷评行状》^{[1]1787} 中，对这位小城人物有一些了解。苏序爱读书，有点像“好读书，不求甚解”的陶渊明。苏序爱写诗，“有所欲言，一发为诗”，他能把日常琐事写进他的诗篇，他在漫长的一生中写了很多诗，可惜一首都没有流传下来。苏序喜欢帮助别人，“急人患难，甚于为己”，他是毫不张扬的、民间的慷慨人物，是个利他主义者。苏序曾经“积谷千石”，苏家的邻居们以为他要囤积居奇，等着灾荒年卖个好价钱，不料他把所有的粮食都用来救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苏序以 75 岁的高龄去世，那一年苏轼 13 岁。苏轼对爷爷的印象很深。

苏轼小时候对父亲苏洵的印象倒是有限，大家知道，《三字经》里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洵自己说，他年少时“游荡不学”，这使他的妻子程氏“耿耿不乐”。苏轼长到七八岁，家里很难见到父亲的影子。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苏老泉的游荡何尝不是一种学习，他把外面世界的精彩带回小城眉山，刺激了苏轼、苏辙的好奇心，扩大了儿子的思维圈子。他还认识了雅州（雅安）的知州雷简夫，认识了益州（成都）最大的官张方平，日后为两个出色的儿子搭建了很好的交往平台。

苏序，苏洵，苏轼，祖孙三代人都有豪放

的性格和仁慈的心肠。

苏轼的母亲程夫人被称为古代四大贤母之一，程夫人有哪些贤惠事迹呢？有两个故事见于《东坡志林》，这本书是苏东坡晚年在海南儋州写的。“记先夫人不残鸟雀”^{[1]8458}，这个故事是说，苏家五亩菜园中有一棵桐花树，小鸟们在低枝筑巢，跟大人小孩儿都亲如一家。什么原因呢？因为程夫人教导孩子们善待一切生灵，尤其不能用弹弓打鸟。程夫人是虔诚的佛教徒，家里供奉着佛像。这个故事却有个民间的背景，几乎所有的男孩儿都用弹弓打过鸟，儒学圣人孔子也讲过“弋不射宿”，不打归巢鸟而已。苏东坡小时候打过鸟吗？答案几乎不可能是否定的。

历史人物的大量细节永远是个谜，于是有了关于人物的谨慎猜想。司马迁的《史记》也不乏想象和文学性描写。司马光《资治通鉴》采用了大量野史、笔记和小说。

儿童苏轼有顽皮的一面，“狂走从人觅梨栗”，颇似少年杜甫：“八月庭前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小孩儿苏轼是打鸟的好手吗？很可能是苏轼打鸟在先，程夫人教导在后。这种身教重于言教的教育方式是很成功的，程夫人仁慈，苏轼的乳娘任采莲一辈子慈眉善目，良好的家风点点滴滴渗入苏轼的心灵，塑造苏轼的人格。后来他做官四十年，无论做京官还是做地方官，都对百姓好，像母亲和祖父一样有一颗仁爱的心。

拙作《品中国文人》（五卷），写了包括孔孟在内的五十个大文豪，发现历代文豪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为官仁慈，为人厚道。文化是进入了血液的，仁义道德不是表面文章。文气通正义，歪风邪气写不出传世佳作。

《东坡志林》中另一个故事叫“记先夫人不发宿藏”^{[1]8457}，程夫人在眉山城西的纱縠行做布帛生意，租赁了店铺和后院，辛辛苦苦挣钱，支撑家里的开销，尤其是三苏父子的开销，她的丈夫远游需要盘缠，她的两个儿子念书和

赶考，也需要许多银子。据司马光说，苏家一度“极贫”，贫穷到什么程度呢？现在我们只能作一些猜想。程家是眉山的大户人家，有钱财还有文化。程夫人嫁到苏家，苏家穷了，她可以寻求娘家的资助，可是她没有这么做。她勇敢地站了出来，租赁店铺做生意。宋代妇女做生意是一件丢面子的事，何况程夫人出于名门。她想不想挣钱呢？她当然很想挣钱，为丈夫和儿子求取功名打下经济基础，还要考虑儿子的婚姻，我们知道，苏轼和苏辙在眉山就结了婚，婚后才远赴汴京考进士。

程夫人非常希望多挣钱，但是民间有个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信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北宋民间的道德力量足够强大，换言之，民风淳朴，苏轼写《远景楼记》，对眉山的风俗、道德有可信的记载。

“记先夫人不发宿藏”，是说有一天，苏家租的院子地面塌陷了，露出一个大瓮，大瓮的上面覆盖着乌木板。乌木是值钱的名贵木材，乌木覆盖的大瓮里藏着更值钱的东西吗？一时，左邻右舍都来围观，议论纷纷，小孩子尤其跳来跳去。也许把乌木板启开，把大瓮藏的宝贝弄出来，苏家就发财了，程夫人也从此不需要太辛苦，不必每日起早贪黑、忙里忙外。

当时苏轼的年龄可能在五岁左右。他有三个堂兄：苏不疑，苏不欺，苏不危。从三个堂兄的名字看，他们的父亲是有文化、有道德追求的。

众目睽睽之下，程夫人如何做决定？她犹豫过吗？从苏轼的记载中看不出程夫人犹豫过，她吩咐家里请来的女婢在塌陷处填土，重新覆盖了可能藏有财宝的大瓮。在场的人是夸赞程夫人还是为她感到遗憾呢？苏轼没有写，只说有个堂兄在那个地方转来转去，听见大瓮里似乎有人咳嗽，“一年乃已”，咳嗽声响了一年才停止。估计那位堂兄太想知道地下宝藏的秘密，自己弄出了幻听，还讲给苏轼听。小苏轼听神了，听呆了，晚年在儋州记忆犹新。这件事对苏轼的影响非常之大。不贪不义之财，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讲的这句话，苏东坡显然落到了实处，为官十几个地方，包括到富庶的徐州、杭州、扬州担任太守，真正做到了以民为本，清正廉洁，超然于物外。他也由于坚持他的美政理想，而付出了颠沛流离的代价。即使贬在荒僻的黄

州、惠州、儋州，他照样为百姓谋利益，这几个地方的百姓至今怀念他。

由此可见，良好的家风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儿童苏轼已经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了吗？应该说他懂了一些，但是还懂得不够多；他有了价值观，但是价值观还不够坚实。苏轼二十七岁踏上仕途的第一站，到凤翔府做签判。那个时候他很牛，“年少暴得大名”，由皇帝亲自取舍的朝廷制科考试，他考入三等，赵宋立国百年来只有两个人考入三等，一二等都是虚设。苏轼考的科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仁宗皇帝高兴地预言他将来要做清平宰相。苏轼在凤翔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写诗痛骂强夺民田的大地主，又写《凌虚台赋》，嘲笑他的顶头上司陈希亮。正直的苏轼冲力巨大，很优秀，很牛，但也犯了任性的毛病。

有一年下大雪，苏轼居住的官舍堆积着厚厚的雪，却有一块隆起的地面上不积雪，什么原因呢？苏轼猜测地下藏有丹药，“疑为古人藏丹处”。作为一名医药的探究者，他知道丹药性热，导致地表温度较高，迅速融化了雪花。苏轼像当年的堂兄一般转来转去，心痒痒，很想挖开来看看。他的妻子王弗说：“使先姑在，必不发也。”如果程夫人还活着，肯定不允许苏轼挖丹药。苏轼听从了王弗的劝告。这个故事也是见于《东坡志林》中的“记先夫人不发宿藏”。

两件事相隔二十余年，而内在的联系很清晰，非常清晰。谁建立的联系呢？是苏东坡本人。

马克斯·舍勒说：“人是生活在由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活着要有意义。如果失掉了意义，人就像拔除了触须的虫子一样乱转。

程夫人享年只有四十八岁。1057年3月，22岁的苏轼在汴京高中进士榜，4月8日，程夫人在眉山去世，她并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苏轼苏辙名震京师，苏轼对母亲、对亡妻王弗的无穷怀念会强化对两件事的感受，至死不能忘。

程夫人培育了苏轼的初心，这颗初心到后来越来越坚定，苏轼考中进士后在《谢制科启二首》^{[2]4949}中说：“自今为许国之始。”从这一天起他就发宏愿，要把一切都交给国家。后

来贬惠州，他写诗：“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南康望湖亭》）^{[2]4363} 相隔四十多年，苏东坡担当天下、忧国忧民的心始终不变。

苏东坡的诗文中多次提到初心。特别是大家熟悉的《杭州召还乞郡状》。家风学家教，从童年起就渗入了他的灵魂，塑造了他的人品。他既有很好的遗传基因，又从经典文献中获得优秀的文化基因。

苏东坡没有私心，所以他能够坚定不移。范仲淹、司马光等优秀的士大夫都是苏轼仰慕的人。范仲淹做官做到副宰相，但决不允许他的亲戚到京城做生意。他的儿子范纯仁娶了一个官员的女儿，这位官宦人家的小姐嫁到范家，要把上等的丝织品用来做帷幔，范仲淹发怒了，传话说：“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至吾家，当火于庭！”

如果儿媳妇王氏敢在范家把罗绮用作帷幔，范仲淹就要在庭院中烧了它，以捍卫范家的家法。传话过去了，他的亲家王质把自己的女儿教训了一通。这件事在官员中反响很大。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后来也成为一代名相。

司马光的节俭更是有口皆碑，“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司马光的家里冬天不生炭火，造访他的客人只好自己搓手取暖。炎烈日，他钻进简陋的地下室写他的《资治通鉴》，一写就是十五年。他在洛阳跟一群朝廷元老发起“真率会”，每次聚会的餐桌上只有四道菜。逢年过节，司马光家里永远看不见大鱼大肉。

南宋的岳飞是一品大员，可是他的夫人李氏只穿布衣。岳飞起于贫寒之家，深知富贵来之不易。他节俭了一辈子，为什么？岳飞崇拜诸葛亮和苏东坡。岳飞的书法，学的是“苏体”。

《道德经》说：“五味浊口”，菜肴太多了，容易把人的味蕾搞混乱。

眉山有一句老话：少好吃。少才好吃。

宋代的商品非常丰富，但是很多士大夫保持了节俭的生活习惯，他们担心一旦奢靡，官风败坏了，社会风气将难以收拾。苏东坡为官清正廉洁，并不是孤立的行为。

他在密州（山东诸城）做知州的时候写过一篇《后杞菊赋》^{[1]13}，其中说：“余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贫。”做了十九年的官，反而越做越穷。北宋官员的俸禄并不低，苏轼的钱用到哪儿去了？用到亲朋身上去了，用到需要帮助

的穷人、寒士身上去了。他说：“平生不好蓄此物。”他不爱存钱，平生不卖一幅字画，不建一座豪华府第。他做官做到端明殿大学士，朝廷的三品大员，始终保持了“富贵不能淫”的君子风范。若问何以如此？家风、家教很重要。

苏轼在密州做了那么多有利于百姓的事，离任时却嘱咐继任的孔太守：“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2]1437}

苏轼为什么感到惭愧呢？因为密州还有很多穷人。何谓好官？一个永远觉得自己为一方百姓做得不够的人，他一定是好官。

苏轼在徐州治理洪水有口皆碑，受到皇帝嘉奖，可他却说：“水来非吾过，水去非吾功。”

（《罢徐州，往南京……》二）^{[2]1951} 美政冲动无穷，何处不是密州、徐州？

由于乌台诗案，四十多岁的苏轼贬到远离京城的黄州（今黄冈），一家十余口钱粮不继，吃饭都成了问题。他率领全家人开荒种地，每天累得一身臭汗，但是他吃饭很香，喝酒很爽，笑声很响亮，夜里也睡得很舒服。苏轼一变而为苏东坡，确立了一个划时代的文化符号。

苏东坡写诗说：“谁能伴我田间饮，醉倒惟有支头砖。”（《次韵孔毅父久旱……》其二）

^{[2]2368} 他在田间喝了酒，躺在田埂上，拿一块砖头当作枕头，耳听滔滔不绝的江水声，眼观风中起伏的金麦浪，那种快活，那种发自心底的愉悦，真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如果不是处于持续的兴奋状态，苏东坡不可能有那么好作品在黄州问世。

我在《品中国文人·苏东坡》中写道：“命运的低谷反指艺术的高峰。”

苏东坡著名尺牍《与李公择十七首》其十一^{[1]5617} 有这样的句子：“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遇事有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只要对百姓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苏东坡就完全不计个人的得失。这股浩然正气，肯定要追溯到他健全的童年，追溯到苏家良好的家风，追溯到他的爷爷、母亲和父亲的言传身教。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3]431} （下转第 20 页）

守其初心，清廉为政

熊朝东

内容提要 苏轼大难不死，重返朝堂，官居高位后，不因“乌台诗案”的惨痛教训，委曲求全，圆滑投机，求以自保。而是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始终坚守“致君尧舜”、“奋厉有当世志”之初心，倾尽心血，清廉为政，充分表现出“忠言谠论，立朝大节”的凛然正气。

关键词 苏轼 坚守初心 清廉为政

清廉为政，不仅仅是指为官者能自觉做到不贪不腐，关键还要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去其私心杂念，不计前程得失，不惧官场犯险，这才是不忘初心、清廉为政的要旨。苏轼就是这样的为官之人。

从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上旬，至元祐元年（1086）三月，苏轼被诏还朝，由起居舍人迁升中书舍人（正四品），一贬官升迁竟如此之快，实属少有。正如苏轼在《辞免中书舍人状》^{(1) 662}中所言：“臣顷自贬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为右史。……出入禁闼，三月有余，考论事功，一毫无取。今又昌荣直授，躡众骤迁。”“曾未周岁，而阅三官。”（《谢宣召入院状二首》二）^{(1) 666}数月间，连升三级。到元祐二年（1087）七月四日，朝廷又诏命苏轼兼侍读（皇帝的老师）。

苏轼大难不死，今居高位，按常理，他应该认真真总结二十余年来官场经验教训，加倍珍惜和把握如今来之不易的大好前程，把官做稳做牢靠，只要稍加努力，委曲求全，或圆滑投机，一步之遥，便可登上宰相之位。或“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宋史·苏轼传》）^{(2) 10819}但是，别人做得到，苏轼绝对做不到。他决不会因“乌台诗案”的惨痛教训，而改变“报国之心，死而后已”之志

（《杭州召还乞郡状》）^{(1) 911}。他在《代滕达道湖州谢上表》^{(1) 711}中，如是说：“念兹七年之阨，收之九死之余。臣敢不更励初心，驯图后效。老当益壮，未甘结草之幽途；死且不辞，尚欲据鞍于前殿。”不管身处高贵，还是身处低贱，历尽磨难真情在的苏轼，始终把国计民生的大义放在心中，倾尽心血，清廉为政。“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苏轼文集序》）^{(1) 2385}如陆放翁所赞：“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³⁾

在仁宗朝时，苏轼曾上《进策》《进论》各二十五篇，并《御试制科策》等，针对朝政现实状况，提出过系统的改革主张与措施。神宗朝时，又针对王安石变法的利与弊，两上皇帝书，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招来牢狱之灾。今入侍哲宗，身居要职，仍不怕犯险官场故事，计较得失。在整个元祐年间，所上奏议不下百篇，皆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事，为治国安民，更是倾尽心血。如在哲宗即位之初，便代扬州知州吕公著作《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1) 132}，针对神宗撂下的烂摊子，站在一个政治家的高度，提出系列治理国家、安定民心、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等措施。尤其是社会风俗的好坏，是关乎国家稳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是苏轼治政理念的核心部分。如何做到净化社会风气，关键是朝廷要广施仁政。为此，苏轼在论治道的第一首《道德》中，提出人君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他希望新皇只要坚守这两条，以至诚仁德为治政之根本，就会使四海之内皆亲如父子，信如心腹，天下归于太平，成为尧舜那样的仁主。

在论治道第二首《刑政》^{(1) 132}中以古人“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的治政之道，要求新皇按此百世不变的道理，治理下属要简约，治

理民众要宽厚。苏轼针对朝廷当前存在具有法律效力的皇帝诏令多如牛毛，使人无法全部了解，全部遵守，反倒使法律不管用了的状况，指出昔日汉高祖约法只有三章，萧何制定的法律只有九章，到汉文帝、景帝时，竟然把刑罚搁置起来不用。经历曹魏到晋朝，断罪的法律条文滋长到两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看似完备，却不能抑制奸人，反而使百姓无措手足。这就是宽、严所产生的不同效应。在朝廷问责方面，存在严重的疏漏，监察部门的御史专门搜求考察文书薄册，揭发、指责细微的毛病，使各级官员忙于改过，而对近年来，水旱连发、盗贼滋生、民众流亡、边境不安宁等，却不问责宰相；尚书省的长官和各部门官员文牍如山，终日忙于签批文书。这种抓小放大的治政，如不改变，国家就难以治理好。

对于治理民众，苏轼提出必须宽厚。征收赋税必须正当，不可巧立名目，额外加税，断了百姓衣食。三代的君主食租衣税而已，所以民众心服，天下自然无盜。从汉代以来，盐、铁、酒、茶，即收归官榷，这种与民争利的结果是迫使民众为盜。如今朝廷实行兴利以聚财的政策，以奖赏为国家聚财的臣子，可不是国家之福啊！必然会动摇国本，因为人民是国家之本。这些年，修筑宫室、城池，与西夏和南面小国开战，累计花费不少于5000万缗。如果用这些钱来购置粮食，足可支付边境九年的食用，边境自然安宁，西夏和辽国哪敢贸然入侵呢？不过人臣就无功可立、无赏可领了。所以那些想兴利而不想省费的官员，都是在为自己打算，不是为国家着想。人君不明白这些，而顺从人臣的私计，是十分危险的。朝廷只有改变兴利以聚财，实行省费以养财的政策，才是国家之福、百姓之福。这可是当前亟待改革的问题。

元祐三年（1088）五月初，苏轼又针对朝政得失，上《转对条上三事状》。^{(1) 819}

新皇继位以来，天下多事，灾荒饥馑，盜贼四起，边境不宁，人民劳苦，官吏冗杂，将帅骄横，士卒惰怠，财用匮乏，凡此弊端，不可胜数。而皇帝只是坐于龙庭之上，仅仅凭听取执政、台谏官、开封知府等十余人陈说政事，以此决断实施国家法令。苏轼忧心这种政令出自内宫，决之于十余个朝廷大臣，十分危险。他认为天下这么大，事情千变万化，决不是这

十几个人所能尽知的。如果他们再不称职，或敷衍了事，对于人民疾苦不能如实报告，导致皇上误认为天下太平，无事可言，以致决策失当，可就误了国家大事了。于是，苏轼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求皇上恢复祖宗惯例，广开言路，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要听取来自基层的意见，对于小官吏乃至布衣百姓，应不时特赐召见，这不单是了通下情，也是为了考察群臣真伪及能力状况。这样才能了解下情、民情，这关系到国家的最高决策是否符合实际，朝政是否少出纰漏，非常重要。

苏轼说，自大宋开国以来，冗官的弊病，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的。朝廷对于名位爵禄，出手太简单，每次科考取士，另加特奏名等约八九百人，一次郊礼，要奏补子弟约二三百人，而军官转补，杂色入流，以及皇帝外戚所荐的还不包括在内。从近代以来，取人之多，得官之易，都没有像本朝这样的。现在吏部名籍上只要有一个缺，便有五七人排队等候，互相争夺倾轧，丧尽廉耻。中才小官，放任贫困地区，一到任，便侵扰勒索，无所不为。针对这种乱象，他提出减少官员录用名额，以才取人，以此解决冗官弊端，节省财政开支，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这便是苏轼提出的第二件大事。

第三件事，主要针对“恩荫”的问题。苏轼主张受“恩荫”之人，需得经过考试，合格者方能任职，且三人中只能取一人。这种以减少荫子，革除冗官弊端的举措，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苏轼请求朝廷尽快落实这三件大事。否则，“数年之后，当有不胜其弊者”。到那时，恐怕已经晚了。

对于时政弊端，苏轼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哲保身，而是经常发言，尽一个臣子之责。聪明的苏轼明知发言会得罪人，甚至遭来祸事，却不怕。高太后对他兄弟二人有再生之恩，他却对高太后执掌朝政以来，赏罚不明，举措不当，造成严重后果，提出严肃批评。当时，边廷传来捷报，熙河的将领们奋勇杀敌，俘获西蕃部落首领鬼章，立了奇功，朝廷嘉奖。可是，泾原的将领们闭门自守，让贼人如入无人之境，掠夺百姓财物无数；广东妖贼岑探反叛，围困新州，朝廷派将官童政前去救援，童政竟然屠杀几千平民，其祸害远过岑探；朝廷派江西提刑傅燮去查办，傅燮畏避权势，竟然

颠倒黑白，归罪于新州官吏；蔡州捕盗的吏卒屠杀平民一家无辜的妇女五六口人，割其首级冒充男人首级请赏。州守、通判不查询，监司也不顾问，如此等凶恶、狡猾、贪婪、残暴之事，朝廷却反倒奖赏泾原将领，对童政处罚也只是降去一个实职，其余则不追责问罪。于是，苏轼严正指出：“若不穷究曲直，惟务两平，则君子无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乱，可坐而待，此臣所谓赏罚不明之咎也。”（《述灾沴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1) 823}

治理黄河是贯穿整个北宋时期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黄河几乎年年造成水灾，百姓苦不堪言。在仁宗朝时，黄河几次决口使其下游形成北流、东流两条水道，导流向东还是向北，屡有争议。在元祐二年，枢密院的长官安焘两次上书，皆言黄河故道具有天险作用，京城依赖它阻挡北边的强敌，所以必须让黄河复行故道，而不要怕费时耗钱。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中书侍郎吕大防持支持态度。因此，朝廷“兴役”黄河复行故道工程。苏轼反对这种不合实际的做法，将历史争议与现实相结合，论证如强行让河水东流“功必无成”。因为“故道高仰，势若登屋”，违反了水流的“就下”之性。不但指出安焘等人只知死守河水东流的规律，而不从河道已经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犯了严重的教条错误。如此兴役强河东流（企图经今马颊河入海），并过早地将北流阻塞，必然后患无穷。而且，苏轼算了一笔账，自孙村到海口，原有堤埽45处，役使士兵15000人，管理使臣50员，每年开销费用500余万钱。自从小吴决口之后，原河道的各所堤埽都废弃了，仅余少数官吏、役兵。如果开凿孙村河而不能使黄河复行故道，公、私财力就全部浪费了；即使有幸使黄河复行故道，可原有45处堤埽即以废坏，河水横流的灾害一定比今天更加厉害。现在王孝先打算兴修45处废坏的堤埽，这是一项大工程，所花费用不计其数。而且，他把这项任务下达给北外监丞司，一旦出现问题，则归咎于他人，“其为欺罔，实骇群听”。（《述灾沴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1) 823}

如果今年罢役，仅枉费价值900万钱的物料，白用2万兵士、民工；否则继续兴修，明年将役使数十万人，花费3000余万钱。那么，严重的后果是，民众辛劳到极点不说，还将横遭水患。苏轼建议将3000万钱分

作几年使用，顺水流之势，立一些堤防，低的增高，薄的加厚，数年之后，黄河必然逐渐安流。苏轼认为当年欧阳修有两篇《修河议状》，虽为当时的需要，而欧公所指明的利害之处、处理方法，仍能合今日之用。

就这两件大事，苏轼不惜惹恼高太后，触怒朝中重臣，一针见血，向朝廷上《述灾沴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1) 823}

他以国事民生为重，用这样的方式来报答高太后的知遇之恩。以上所举事例，充分印证了苏轼“守其初心，始终不变”（《杭州召还乞郡状》）^{(2) 911}，清廉为政的可贵品质。

当然，至于朝廷是否采纳苏轼的意见，那是另一回事。元符三年，被贬于海南岛的苏轼，听到黄河又一次决口，重复北流的消息，感慨叹息不已，写下《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期言乃验，二首》^{(4) 2341}。苏轼从实际出发，经多次论证后，主张治理黄河的科学性、正确性，为事实所验证。

苏轼历来重视吏治，认为社会发展、政权稳固、国家强盛、百姓乐业，皆取决于吏治。吏治腐败，乃国家覆亡之祸。早在仁宗朝时，苏轼就提出了一系列整顿吏治的措施。如今的官场奢靡成风，官员素质低下，贪腐渎职，不思进取，争权夺利，为一己之私，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整个官场一片乱象。而对这种现状，苏轼很忧心，他清醒地知道整顿吏治的关键是监察与择吏，可朝廷没有赋予他这个权力，也不是他职责范围之事。但如何教育提高为官者的思想素质、精神境界、道德操守，向官员们敲响“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警钟，使为官者做到清廉为政，他认为自己作为朝廷大臣，是有责任提出的。于是，苏轼在入侍哲宗之初，便写了《六事廉为本赋》^{(5) 131}，以此作为提升百官思想觉悟的读本，将其廉政思想贯穿于整个治政之道：

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官继条分，虽等差而立制；吏功旌别，皆清慎以居先。器尔众材，由吾先圣。人各有能，我官其任；人各有德，我目其行。是故分为六事，悉本廉而作程；用启庶官，俾厉节而为政。善者善立事，能者能制宜。或靖恭而不懈，或正直而不随。法则不失，辨别不疑。第其课兮，事区别矣；举其要兮，廉一贯之。蔽吏治之

否臧，必旌美效；为民极之介洁，斯作丕基。所谓事者，各一人之攸能；所谓贤者，通众贤之咸暨。拟之纲罟，先纲而后目；况之布帛，先经而后纬。于冢宰处八法之末，厥执既分；在西京同大孝之科，于斯为贵。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苟务渎货，都忘属厌。若是则善与能者为汗而为滥，恭且正者为跛而为儉。法焉不能守节，辨焉不能明嫌。故圣人恶彼败官，虽百能而莫赎；上兹洁行，在六计以相兼。此盖周公差次之，小宰分掌者。考课则以是黜陟，大比则以为用舍。彼六条四曰洁，晋法有所亏焉；四善二为清，唐制未之得也。曷曰独擅兹道，分贯其余？始于善而迄辨，皆以廉而为初。念厥德之至贵，故他功之莫如。譬夫五事冠于周家，闻之诗雅；九畴统之皇极，载自箕书。噫！绩效皆烦，清名至美。故先责其立操，然后褒其善理。是以古者之治，必简而明，其术由此。

所谓六事，即：善（善良）、能（能干）、敬（恭敬）、正（正直）、法（守法）、辨（明察）。《周礼·天官·少宰》云：“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5) 133} 六事皆以廉为首。廉为本，方能善其事。而廉者，在于去其私欲杂念。“人情”、“物欲”、“人欲”是人固有的本性，所谓“无私”非天生成。

怎样做到去私欲杂念呢？苏轼在《东坡易传》⁽⁶⁾说：“君子之顺也，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它们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也是同样的道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只要充分认识到物质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不违背规律，遵守规律，就会自觉做到无私，顺利干好事情。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就是“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的道理，有人为啥做不到呢？“物固有是理，患不知。”苏轼《答虔粹俞括一首》^{(1) 1793}中说，这是因为有的人不去探究和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自然就会认识不清物我之间的正负关系，受到私心杂念的干扰，走向反面。为此，苏轼又在《上曾丞相书》^{(1) 1378}中，进一步阐述循理与无私的关系：“以为凡学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

虽欲无私，不可得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出之乎中，其行不然者，且古人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苏轼在这里特别强调为官者一定要潜心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真正掌握事物的本质，才能真正成为无私无畏、廉洁从政的好官；成为一个不被他人所左右、不被私欲所困的智者。只有以“廉”为官，才能心胸坦荡、心系百姓、秉公办事、勤于政务，而以“廉”为官，则要终其整个从政过程，“举其要兮，廉一貫之”，才是一个真正称得上廉洁自律的好官。

为此，苏轼振臂一击，向为官者敲响“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警钟。说明官吏的事功荒废于贪污，德行完成于廉洁。如果为官者追求财贿，就会贪得无厌。古代就有“晋有羊舌鲋者，渎货无厌，亦将及”⁽⁷⁾的事例。假如这样，那么善良和能干就变成了贪污受贿而肆无忌惮，恭敬而正直就变成了邪恶和阴险，知法者不能严守节操，明辨者不知贤与不肖。圣人憎恶那种腐败的官吏，虽有百般能耐也不饶恕。崇尚这种清廉的品行，要求善、能、敬、正、法、辨六种素质，都须与廉相结合，这就是廉为六事之首。官吏们的功劳多种多样，十分繁杂，而其中以“清廉”的名声最为美好。因此，先要求他们树立清操，然后才表扬他们善于理政。所以，古代的治国，必定简要而又明确，其方法就出于此。

苏轼不仅提醒皇上考察百官，以廉为首的治政方略，而且 he 对自己更是严格要求，为官四十余年清廉为政，留下千古美名。

注释

- [1]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 [2] 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 [3] 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九。
- [4]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 [5]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 [6] 苏轼著、龙吟译评《东坡易传》，长春文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 [7] 《春秋左传·昭公十三年》

熊朝东，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新闻中心原主任、总编，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

回归初心、不负初心、砥砺初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启示

戴 路

内容提要 苏轼的初心就是回归初心、不负初心、砥砺初心，做到对理想执著、以百姓为念、向国家负责，这是我们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应该重视的精神资源。

关键词 苏轼 回归初心 不负初心 砥砺初心

苏轼元祐六年五月在《杭州召还乞郡状》^{[1]911}中说道：“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联系上下文看，苏轼的初心就是正言直行、坚守原则。在这篇奏议当中，苏轼强调“危言危行，独立不回”，坚持“直道而事人”，反对随世沉浮，始终不改“常度”。我们知道，儒家士大夫的处世原则就是坚持自身操守，而士大夫的原则和操守又与国家的法度相互统一。《论语·宪问》云：“邦有道，危言危行。”坚守初心就是坚守修身与治国的基本准则。古语有云：“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不变初心就是超越荣辱、不计得失，与天地相始终。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苏轼回顾了步入仕途以来的主要经历，不管是王安石新党执政还是司马光旧党上台，他都坚持为官的基本原则，绝不苟合流俗。虽然饱受政敌攻击，历经官场起伏，但始终不能动摇他对初心的坚持，概括起来，就是对理想执著、以百姓为念、向国家负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我们要善于从眉

山培育的千古文化名人身上寻求命脉与源泉，将苏轼“初心”中精神追求与文化基因融会贯通、传承发展。

一、回归初心，对理想执著

元丰六年，苏轼在给弟弟苏辙的诗歌《初秋寄子由》^{[2]1169}中写道：“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随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处。”他回忆起与弟弟一起在汴京城外的怀远驿读书备考的场景。面对时间的流逝，不变的是始终坚守的“宿昔心”。这个宿昔之心，就是读书人学以致用、兼济天下的抱负。苏轼年少时曾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阅读富弼《使北录》，讨论到辽国慎重用兵的问题。苏轼后来参加制科考试，纵论天下军国大事，面对新党盲目开边时，他又表达怀柔远人的立场，这些都离不开他年轻时的读书积累。苏轼母亲程氏也善于教育，将古今大事、兴衰成败讲给苏轼听。讲到《后汉书·范滂传》时，苏轼为范滂的气节所感染，发誓要做范滂那样的人物。母亲程氏慨然应允，只要你愿意成为范滂，我就会做范滂母亲那样的人物。《范滂传》后来成为元祐文人坚守原则、相互砥砺的重要精神支持，这在苏轼年少时就奠定了根基。同样，年轻时苏轼与苏辙也拥有共同读书经历。苏辙《次韵子瞻感旧见寄》^{[3]221}云：“结发皆读书，明月入我牖。纵横万余卷，临纸但挥手。”月下读书成为兄弟二人共同的人生记忆。回归初心，就是重温年轻时的读书经历与理想抱负，寻找精神气节的源泉。这种理想，又离不开苏轼年轻时那个时代的风气。那正是欧阳修“以通经学

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六一居士集序》）^{[2]315}的时代，通经学古的目的，就是要在朝廷庙堂之上践行自己的学术理想，针砭时弊、致君行道。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庆历士大夫引领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气，对整个时代读书人立身报国的精神气质造成了深远影响。苏轼八岁时进入乡校，此时正是范仲淹庆历变法如火如荼之时。在《范文正公文集叙》^{[1]311}中，苏轼回忆了这段经历：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

苏轼年少时就读到当时广为流传石介《庆历圣德诗》，并能记诵其词。《庆历圣德诗》歌颂了庆历年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群体，苏轼对他们非常仰慕，尤其对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位“人杰”非常尊敬。嘉祐二年苏轼进京赶考时，范仲淹已辞世，“吾得其为人”是感慨之后实践初心的坚定。他考中进士后拜到欧阳修门下，更是对年轻时“奋厉有当世志”的践行。所以来南宋孝宗皇帝在评价苏轼一生时特别赞扬他“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4]62}。正如苏轼在《初秋寄子由》^{[2]1169}所讲，“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处”，读书报国、经世致用的理想贯穿其一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努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不忘初心就是不忘本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一点，应该从苏轼的理想上有所借鉴。

二、不负初心，以人民为念

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1]911}中强调“蒙

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不负心”的具体表现就是贴近民众，关注民生。他在《谏买浙灯状》^{[1]726}指出：“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强调皇帝为民父母，要照顾卖灯百姓的衣食大计，不要减价降酬，与民争利。在与司马光争辩役法的利弊时，苏轼也将民众疾苦作为政策调整的出发点。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1]1117}记载：

时君实方议改免役为差役。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为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无执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若量出为入，毋多取于民，则足矣。君实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与其选，独以实告，而君实始不悦矣。尝见之政事堂，条陈不可。

司马光与苏轼本来同属元祐阵营，私交也颇好，曾为苏轼母亲撰写墓志。但在讨论役法的实施措施时，苏轼既不全面支持司马光，又不完全否定王安石，而是始终以百姓福祉为念。苏轼既反对“免役”的聚敛民财，又担心“差役”造成贪吏滑胥欺压百姓的后果，其论事议政的出发点就是民众的基本生活。他强调役法不能给百姓增加负担：“臣意以为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二者相须，此外有余者，始令出助役钱。”在给皇帝建议役法方案时，特别指出：“臣窃闻降敕之初，百姓莫不喜悦，一两月间，州县定差已了，别无词讼，人情安帖。”这种让百姓喜悦、让人情安定的考量，体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视野和情怀。在地方官任上，苏轼也以始终以方便民众为施政的中心。如在密州实行“给田募役法”，旨在“因法以便民”。徐州遭遇洪水时，身为地方长官的苏轼亲上一线，穿着防水鞋具，驻扎在城楼上，指挥抗洪工作。据苏辙《黄楼赋》^{[3]334}描述：

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东西北门，水皆自城际山。雨昼夜不止，子瞻衣制履屨，庐于城上，调急

夫发禁卒以从事，令民无得窃出避水，以身帅之，与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溃。方水之淫也，汙漫千余里，漂庐舍，败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壮者狂走无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习水者浮舟楫载糗饵以济之，得脱者无数。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渊，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渊诚塞，徐则无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请增筑徐城，相水之冲，以木堤捍之，水虽复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亲。

当洪水漫延、冲毁民居时，苏轼又命令熟悉水性的人划船装载粮食，救民于水火之中。水退之后，苏轼又积极争取朝廷支援，加固徐州的城墙和堤坝，筑牢防洪工程，维系百姓生活的安稳。“民益亲”体现出百姓对苏轼的爱戴，也是对他“不负初心”、心系民生最好的回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今天，我们开展主题教育，就是为民服务解难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如苏轼《答范纯夫十一首》其七^{[1]1456}所讲：“不欲卒负初心”。

三、砥砺初心，对国家负责

苏轼《谢翰林学士表二首》其一^{[1]666}曰：“敢不激昂晚节，砥砺初心。虽洪造之难酬，尽微生而后已。”在其他上奏的场合，苏轼也多次强调“益砺初心”“淬砺初心”。如《谢宣召入院状二首》其一^{[1]664}：“知人材之难得，采虚名而用臣。敢不益励初心，力图后効。”又如《谢兼侍读表二首》其一^{[1]684}：“臣敢不淬励初心，激昂晚岁。誓坚必死之节，少报不赀之恩。”这个需要不断磨炼的初心就是不附和、不苟合，始终对君主尽忠、对国家负责的立朝大节。“表”是以臣禀君的上行文体，表的进呈有一个君臣对话的语境。在这里，“君”是“臣”施展才能、经世济国的重要保证，因为“得君行道”是每一个读书人追求的理想。同时，“君”又是国家的代表，臣僚效忠君主，并非只为君主个人，而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苏东坡砥砺的“初心”，不是为一人一朝，而是为天下万

世。要保持“初心”的一以贯之，就必须时刻自我检视、不断淬砺磨练。在《送俞节推》^{[1]992}中他感叹“异时多良士，末路丧初心”，指出“我生不有命，其肯枉尺寻”。要做到“不丧初心”，不为外在环境所异化和遮蔽，就必须砥砺节操，历久弥坚。“苏文忠公”有一个“忠”字，这个“忠”就是不因朝廷的政策调整而改变，不因个人的仕途起伏而动摇，坚持独立政见，怀道义以正君心，以天下为己任。后人在评价苏轼时往往称赞其忠义之气，如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云：

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爱之也，引之上西掖銮坡。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槁项黄馘，触时干戈。其恶之也，投之于鲲鯨之波。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计东坡之在天下，如太仓之一稊米。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

在黄庭坚看来，苏轼的忠义气节已不限于在朝期间。在“西掖銮坡”“岌岌堂堂”的风光时刻，苏轼当然有上述君臣对话语境中“初心”；但在政治失意、遭遇贬官的磨难时刻，即使有“鲲鯨之波”的危险，苏轼仍然不改初心，不因自己仕途的变化而改变对国家、对天下的忠义之心。这种“初心”尤其需要磨练。苏轼渡海北归时强调“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1]2366}，他的忠义大节和为官初衷，不因政敌的浮云蔽月而改变，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这种气节和初衷，正如“天容海色”的澄澈清朗，超越了一己的荣辱得失、一朝的兴衰沉浮，臻于天地造化境界。“月”是苏轼笔下常见的意象，所谓“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赤壁赋》）^{[1]6}，所谓“云散月明”，所谓“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都代表了他始终不渝的节操和愈发澄澈的情怀。而此时之“月”，正如“结发皆读书，明月入我牖”之月，从年少到晚年，初衷不变，大节不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用科学的理念、长远的眼光、务实的作风谋划事业；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实践历练中增长经验智慧，在经风雨、见世面中壮筋

骨、长才干。”在主题教育中，党员干部要学习苏轼那种“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的担当精神，时刻磨练自己的“初心”。尤其在各种困难时刻，党员干部要学习苏轼那种临危不惧、百折不挠的韧性与定力，始终做到对党忠诚、勇于担当、敢于斗争，不断砥砺奋进。

总之，苏轼的初心就是回归初心、不负初心、砥砺初心，做到对理想执著、以百姓为念、向国家负责，这是我们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应该重视的精神资源。

注释

[1]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2]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3] 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4] (清)王文诰撰、林冠群校点《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海南出版社 2012 年版。

戴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上接第 9 页)

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留下的宝贵遗产，完全可以作为我们今人汲取的精神营养。在我们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在我们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苏轼“守其初心，始终不变”的理念和廉洁从政的实践，无疑为我们广大党员干部提供了可资借鉴、学习的典范。

注释

[1]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2] 高秀芳、陈宏天校注《苏辙集》，中华

书局 1990 年版。

[3]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4]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5] 苏洵著、邱少华点校《苏洵集》，中国书店 2000 年版。

[6] 转引自朱玉书著《苏东坡在海南岛》，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7] 苏轼著、龙吟译评《东坡易传》，长春文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刘川眉，眉山市政协原副巡视员，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上接第 12 页)

注释

[1]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2]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3]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刘小川，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著名作家，眉山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

欧苏的“士君子富贵”诗论与廉政思想

张 淘

内容提要 宋初不少大臣仍然延续着居官如隐的风气，对富贵生活十分执着。欧阳修提出了“诗穷而后工”，诗当关政，建立起儒家教育影响下的文学创作，从而使得对“富贵气”的追求从当政者意识中淡薄并消失。苏轼以诗纪实，大胆直言。又能不营一身，一生以清景为伴，顺境逆境皆能做到心淡无累，遇境安畅。

关键词 富贵诗论 晏殊 欧阳修 苏轼 士君子

北宋仁宗以慈俭著称，在位期间培养出了一大批铮铮有声的名臣，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苏轼等名臣之所以流芳百世，除了优秀的学问和文学修养以外，他们身上具有的“士君子”之气是人们纪念他们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经历了战乱纷争的晚唐五代，宋初不少大臣仍然延续着居官如隐的风气，对富贵生活十分执着，尚未建立起这样的士君子气概。本文从晏殊和欧阳修的例子出发，探讨宋人是如何建立起士君子的责任感。晏殊的学生、苏轼的老师欧阳修提出了“诗穷而后工”，诗当关政，建立起儒家教育影响下的文学创作，从而使得对“富贵气”的追求从当政者意识中淡薄并消失，最终造就了苏轼这样的一代名臣。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前，以诗评政，表达个人意见，建立了一种与儒家提倡的“温柔敦厚”诗教有别的新的诗歌创作范式。当然，随着乌台诗案的爆发，这类诗作明显减少，但他始终坚持着淡泊名利的精神，不屈于政治高压，并在诗中表达自我，用乐观的精神影响着时人与后世。

本文从宋初名相晏殊及其门生欧阳修之间围绕着作诗理念发生的一次摩擦事件谈起，

两人对于诗歌当歌咏何种内容各自有不同的看法。晏殊代表的是唐五代以来台阁诗人常见的作诗方法，即以诗歌咏富贵生活。而苏轼的老师欧阳修试图建立起“士君子”诗歌这样一种创作理念，主张诗歌应该反映符合自己身份的内容，士大夫的诗歌应该关心民生，从而改变了诗坛的风气，造就了苏轼这样的大家。

一、晏殊的节俭与“富贵语”

北宋宋仁宗提倡节俭，这在史书及笔记等中多有记载，如景祐五年（1038）三月十七日，帝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富民之要在节俭赋》等题（《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以试题的形式鼓励将来要成为官员的士子们。大约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宰相晏殊（991～1055）也崇尚节俭，然而他却喜好宴请宾客，故家中常养歌妓，后世以词人目之。在评论诗歌时，他也喜欢使用“富贵语”来评价一首诗作的好坏^[1]。如《归田录》云：“晏元献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玉枕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2]^[3] 这也许是出于古代的一种迷信——诗谶，当时人大多从作诗来占卜一个人将来的命运，《漫叟诗话》“诗咏富贵”条：“江为有诗：‘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或谓作此诗者决非贵族。或人评‘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乃乞儿口中语。”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记载，称此种诗句为乞儿语的正是晏殊：“《青箱杂记》亦载此事，乃元献云：此诗乃乞儿相，未尝识富贵者。”可见，晏殊对诗谶之说深信不疑，认为诗中应当使用“富贵语”的观念根深蒂固。当然，他所谓的富贵不同于

唐诗当中所言的富贵。唐人的富贵是直接对富贵生活的刻画，而他所提倡的“富贵语”则是用环境、氛围描写烘托出和平宁静、高雅悠闲的居所和生活，来显示居所主人的身居高位和养尊处优。或许受此影响，后来其子晏几道的诗亦受到黄庭坚类似的评价。《王直方诗话》记载存^[3]中之语云：“山谷称晏叔原‘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里风’定非穷儿家语。”

宋人的诗话里头还有不少议论唐诗中的富贵。《古今诗话》“唐人作富贵诗”条引《诗话总龟》前五：“唐人作富贵诗，多纪其奉养服器之盛，乃贫眼所惊耳。如贯休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韦楚老云‘十幅红绡围夜（玉）’，十幅红绡为帱不及四尺，如何伸足，所谓不曾近富家儿。”《苕溪渔隐丛话》：“温飞卿《晚春曲》云：家临长信往来道，乳燕双双拂烟草。油壁车轻金犊肥，流苏帐晓春鸡报。笼中娇鸟暖犹睡，帘外落花闲不扫。衰桃一树近前池，似惜容颜镜中老。殊有富贵佳致也”。事实上，唐诗当中多可以找到诗人表达对富贵的追求之意，如高适诗：“男儿贵得意，何必相知早”（《酬裴秀才》）、“男儿争富贵，劝尔莫迟迴”（《宋中遇刘书记有别》）。而宋代诗人已开始意识到这类诗的“俗”气，不喜直接表达，晏殊亦认识到这点，所以对之加以改良。但宋初还有一些未加改良的作品，如与晏殊一样担任过宰相的王珪（1019~1085），他的诗多描写金玉珠宝，被人称为“至宝丹”。“晁以道云：王禹玉诗世号至宝丹，以其多使珍宝，如黄金必以白玉为对。”^[4]王珪在实际作诗时与晏殊的方法不同，他更接近唐人诗言富贵的手法，在诗中加入大量珠玉黄金之语，自然会受到时人的批评。

二、欧阳修的“士君子富贵”以及咏雪引发的廉政思考

欧阳修曾提出著名的“诗穷而后工”理论。这种观点融合了孔子与司马迁等圣人君子的儒家思想。《论语·卫灵公》中云：“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云：“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忠而被谤，反而能创作于《离骚》这样的千古名篇。后世如贾谊、扬雄等人亦是如此：“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5]^[6]班固在《离骚序》中甚至称：“且君子道穷，命矣”。唐代杜甫《天末怀李白》亦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韩愈《送孟东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这些都是“诗穷而后工”理论的先驱。欧阳修希望能够重建儒家政治，故特别注重“君子”之言行应当如何，以上提到的屈原、贾谊、扬雄等皆具有贫贱不能屈、忠言谠论的特点。欧阳修认为“诗原乎心”，同时主张应追求士君子之富贵。《摭遗》云：“欧阳文忠曰：诗原乎心者也，富贵愁怨，见乎所处。江南李氏巨富，有诗曰：‘帘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彻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微闻箫鼓奏。’与‘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异矣。”欧阳修强调的是诗应该发乎内心，并与所处的地位、环境等相匹。那么如若身处宰相之职，自然应当不仅仅是描写日常的生活，还应该有辅治道。

后世评价欧阳修诗歌，亦以“士君子富贵”目之，《桐江诗话》“富贵语”条：“永叔《送李留后知郓州诗》乃士君子之处富贵，非庸鄙有力者所可为。诗云：北州能事谒家声，东土还闻政有成。组甲光寒围夜帐，彩旗风暖看春耕。金钗坠鬓分行立，玉尘高谈四座倾。富贵常情谁不爱？羨君潇洒有余情（李名愿，李都尉长子，先曾知相州）。”此诗前四句皆是描写政事有成，第五、六句则写治家严谨、高朋满座的情形，的确与晏殊诗中描述的富贵有别。最后两句直接点明欧阳修追求羡慕的不是“富贵常情”，而是“潇洒有余情”的处事态度。这种“潇洒有余情”包括对本职工作能游刃有余地完成。

可以想象，持这种主张的欧阳修也许已感觉到自己与老师晏殊之前存在的差异，或者对晏殊的生活实抱有不满。而一场宴会使得二人有正面交锋^[6]。庆历年元年（1041），时任枢密使的晏殊又如往常一般，退朝后在西园与陆经、欧阳修等人宴饮。然而，此时国家形势却与往常不同，与西夏正处于战事之中。欧阳修的心情也像阴冷的天气一样，完全没有放在眼前的美景、美食与美人上。晏殊却完全没有察觉到学生的异样，反而非常欢喜能够在雪天与

二人相聚，雪景不正是勾起诗人灵感的诗料吗？更何况有欧阳修这样的才子诗人在座，今日必定可以收获多首佳作。想到这里，他不觉喜笑颜开，说道：“雪中诗人见过，不可不饮也。”于是他摆上酒肴，欲与客人即席赋诗。欧阳修忧心忡忡，本无作诗心情，但师命难违，于是写下了以下这首《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分层符号①②③……为笔者所加）：

①阴阳乖错乱五行，穷冬山石暖不冰。
一阳且出在地上，地下谁发万物萌。
太阴当用不用事，盖由奸将不斩亏国刑。
遂令邪风伺间隙，潜中瘟疫于疲氓。
②神哉陛下至仁圣，忧勤恩祷通精诚。
圣人与天同一体，意未发口天已听。
③忽收寒威还水官，正时肃物凛以清。
寒风得势猎猎走，瓦乾霰急落不停。
恍然天地半夜白，群鸡失晓不及鸣。
④清晨拜表东上阁，郁郁瑞气盈宫庭。
退朝骑马上银阙，马滑不惯行瑶琼。
晚趋宾馆贺太尉，坐觉满路流欢声。
便开西园扫径步，正见玉树花凋零。
小轩却坐对山石，拂拂酒面红烟生。
⑤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
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

这首七言长篇古诗大体可以分为五层。第一层从天久未雪之因讲起，用阳阴五行的对应之说点出奸将误国乃是背后原因。第二层提到仁宗皇帝忧国忧民之心，看似担忧天久未雪，实则担心边事。第三层接续第二层，仁宗的忧国忧民之心使得雪落如霰，大地悉白。但边事仍然未解。第四层写诗人上朝与退朝所见，百官只为瑞雪庆贺，尤其是晚上到了西园太尉（枢密使）处，看到主人正酒气满面，完全没有忧边之色。第五层规谏主人当关心边事，不当饮酒宴客。此诗中关于瑞雪的描写仅是烘托，真实想要表达的是提醒当权者（晏殊为枢密使，正是负责军事的第一长官）时刻不忘职责，不当沉迷于享乐。

读完此诗的晏殊脸色阴沉，怏然不悦，但席上也不好发作。宴会不欢而散。数天后，他私下对人辩解说：“裴度也曾燕客，韩愈也会做文章，但言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恁地作闹。”

这是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六引《隐居诗话》中所记载的事件，应该具有一

定的真实性。因此次事件，欧阳修与晏殊之间也发生了些许裂缝。宋末方回称“晏相亦坐此罢相”^{[7]875}。其实，晏殊所崇尚的仍然是唐五代以来达官权贵那种养尊处优的吏隐式生活，他不主张在诗歌中过多的反映现实。与他有相似主张的大臣有李昉、寇准、王珪等人。而欧阳修提倡的是真正具有敢言敢作敢担当的士君子精神，应该身在其位谋其政，反对仕宦即“富贵”的思想。欧阳修认为“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六一诗话》）他对于韩愈以及诗歌功能的欣赏，显然不同于一般的看法，不仅仅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以道入诗，而是追求诗歌的多重功能。

欧阳修与他志同道合的好友梅尧臣等人，在诗坛掀起了诗文变革的浪潮。诗坛上也出现了一项重大的变化：即对诗谶之说的反驳。《王直方诗话》引《乐趣》十四提到王安石、苏轼的诗都能不惧诗谶的传说，不回避生死等人生将要面对的问题。“人谓富贵不得言贫贱事，少壮中不得言衰老，康强不得言疾病死亡，或犯之，谓之诗谶。是大不然。诗者，妙观逸相，岂限绳墨哉？王维作雪中画芭蕉，《诗眼》见已知其神情善寓于物，俗（论）则讥其不知寒暑。荆公方大拜，忽书其壁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东坡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岂可与俗论。余作诗曰：东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余万丈光。雪里芭蕉失寒暑，眼中骐骥略玄黄。”洪迈《容斋随笔》“诗谶不然”条云：“今人富贵中作不如意语，少壮时作衰病语，诗家往往以为谶，自公十八岁，病中作绝句云：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然自公寿七十五。”扫除了作诗时的心理障碍，更能在诗中自由抒发自我的见解和意见。

三、苏轼的“心淡”说与廉政思想

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尤其受欧阳修“著书多念虑，许国灭欢娱”（《夷陵县欧阳永叔至

喜堂》)^{[8]111}思想及行为的影响。如果说欧阳修是从诗论和思想上对富贵诗论进行了反驳，苏轼则是从创作实践和行为处事上，彻底否定和颠覆了富贵诗论。

苏轼少年时期便能看破富贵，对富贵和名节等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嘉祐年间所作的一系列出蜀诗中多提及“富贵”一词，表明他在即将真正为官以前，便深思熟虑过这个问题。

《夜泊牛口》^{[8]12}诗中云：“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将汲汲营营之人，与在深山中自然纯朴的山民作对比，表达了他对这种甘守贫贱之人的肯定与羡慕。《入峡》^{[8]64}诗中云“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将世人空慕山林的原因，归结于对富贵的执着。哪怕在吃鱼时，他也会想起鱼是因其贪婪带来丧身的恶果，《鳊鱼》^{[8]158}诗云“谁言解缩项，贪饵每遭烹”，甚至想到此种事情会泪流满面，

“吾今又悲子，辍筋涕纵横！”可见，少年的苏轼即已深知“人心固难足”(《诸葛盐井》)^{[8]57}的道理，在诗中吟咏富贵如浮云的感慨：

“富贵荣华岂足多，至今惟有冢嵯峨”(《竹枝歌》)^{[8]44}、“富责本无定，世人自荣枯”(《浏阳早发》)^{[8]140}。这类少年之作皆直接批判了追求富贵的行为。相比起功名富贵，他认为后世人对一个人的良好评价更为重要：“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

(《屈原塔》)^{[8]41}

出仕以后，苏轼的诗歌不回避现实当中的矛盾与问题，身当其位，不忘其职。从其诗作也可得到与廉政思想相关的启示：

首先，以诗书写仕宦生涯。不管是在凤翔受到上司的轻视产生的负面情绪，还是他不满新法，都在诗中有所反映。如长诗《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以诗纪行，他的诗把平生所见所感皆如实记载下来。在《答陈师仲主簿书》^{[9]5327}中，他教导陈传道“足下所至，诗但不择古律，以日月次之，异日观之，便是行记”。他还继承了欧阳修“诗穷而后工”之说，同样认为“诗

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病中，大雪数日，未尝起观。虢令赵荐以诗相属，戏用其韵答之》)^{[8]257}，逆境反而能给予诗人以灵感，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助于增强见识，使诗内容更深厚、有意蕴。

其次，以诗评政，大胆直言。后人往往指出其诗“好骂”，但这正是他诗歌大胆直言的魅力所在。其《录陶渊明诗》^{[9]7555}中提到：“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试看他在熙丰变法时期的诗歌：《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8]631}云：“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箠环呻呼”“追胥保伍罪及孥，百日愁叹一日娱”“岁荒无术归亡逋，鹄则易画虎难摹”。《戏子由》^{[8]642}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他能够在诗中大胆表达对当时新法政策下朝局的不满。

第三，不营一身，清景为伴。苏轼嘉祐八年在凤翔为官时，曾因休沐得闲，游览了李茂贞的旧宅园林。李茂贞在唐末曾任凤翔节度使，此园为其所筑，其中花木成林，又有小桥方池，极其奢华。然而到宋代已为王氏所有，且“破墙围古屋”，不复往日繁华。苏轼打听到此园为李茂贞搜刮民脂所建以后，不禁为作《凤翔八观·李氏园》^{[8]334}一诗，并抒发自己的感慨。诗云：

谁家美园囿，籍没不容赎。
此亭破千家，郁郁城之麓。
将军竟何事，虮虱生刀鞬。
何尝载美酒，来此驻车轂。
空使后世人，闻名颈犹缩。
我今官正闲，屡至因休沐。
人生营居止，竟为何人卜？
何当办一身，永与清景逐。

李茂贞花费巨大财力物力所建的这所庄园，在他活着的时候却鲜有机会来此游览，而苏轼恰是因为身为闲官，反而得以屡屡至此。可见人生汲汲营营，到头来不过为他人所忙，不如放弃这种经营，且珍惜眼前的自然美景。纵观苏轼一生，虽然也有买田之举^[10]，但只是归老之计，给他带来人生慰藉的是宦游各地的清景与古迹。

第四，心淡无累，遇境安畅。嘉祐年间，

苏轼作《出峡》^{[8]98}诗云：“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他终生亦贯彻着这一思想，不管是在乌台诗案中受到牢狱之灾，还是在新旧党争中遭到打压，远谪岭南，都能淡然处之。因为他已破除了对物质的要求，对功名的执念，所以顺境逆境皆能安然以对。

四、欧苏廉政思想对诗坛影响

欧阳修提出的“士君子富贵”，以及苏轼的“心淡”意识及创作实践对当时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元祐年间，苏轼与欧阳修两子、陈师道皆在颍州，陈师道《次韵苏公涉颍》诗句末云：“须公晓二子，人自穷非诗。”《次韵别张芸叟》：“此别时须问生死，孰知诗力解穷人。”既是对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理论的回应，也体现了安贫乐道的精神。

正是欧苏等人的提倡，改变了宋初喜言富贵的风气，代之以士君子的写实精神。与汉唐人志在封侯不同，宋人的志向更为内敛。他们始终认为，隐逸才是最终归宿。如范仲淹《岁寒堂三题》中赞颂松柏：“目有千年色，耳有千年声。”^{[11]35}他们对待永恒不变的事物总是非常执着与痴迷，对待变动不居的事物则怀有戒惧心理。在他们看来，祸福相依，荣辱不定，是非循环：“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执”（《和葛闳寺丞接花歌》）^{[11]45}，“此景此情聊自慰，是非何极任循环”（《夜韵酬李光化见寄》）^{[11]106}。宋代士大夫的楷模范仲淹便对此有着清醒认识，他将一个人对自己道德的修养视为常：“士之应常也，在于己，不在于人”“天子之常也，在于道，不在于权”（《易义》）^{[11]120}。宋末元初的方回在编选《瀛奎律髓》^[7]卷五“升平”类时，序称：“诗家有善言富贵者，所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是也，然亦必世道升平而后可。李太白谓唐明皇盛时奉诏作《宫中行乐词》，虽渔阳之乱未萌也，而其言已近乎夸矣。今取凡言富贵者，不曰‘富贵’，而曰‘升平’，必有升平而后富贵。羽檄绎骚，疮痍憔悴，而曰君臣上下、朋友之间，可以逸乐昌泰，予未之信也。”个人的富贵不可谓之真富贵，只有国家升平以后才有真正的富贵。欧阳修和苏轼清楚明白地看到这一点以后，才

会舍弃对个人富贵的追求，代之以通过言行来实现国家的升平。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中云：“盖唐自立国以来，况为奢侈，以衣裘仆马、亭榭歌舞相尚而形之歌诗论记者，夸大言之，而不为怍，韩愈氏自诩以知尧、舜、孔孟之传者，而戚戚送穷，淫词不忌，则人心士气概可知矣。延及有宋，膻风已息。故虽有病国之臣，不但王介甫之清介自矜，务远金银之气；即如王钦臣、丁谓、吕夷甫、章惇、邢恕之奸，亦终不若李林甫、元载、王涯之狼籍，且不若姚崇、张说、韦皋、李德裕豪华，其或毒民而病国者，又但以名位争衡，而非宠赂官邪之害。此风气之一变也。”

注释

[1] 相关研究有：杨海明《唐宋词中的“富贵气”》（《文学遗产》，1995年）；王德明《晏殊的诗学思想及其影响》（《文学遗产》，2002年）；《论宋代诗学的“嫌贫爱富”倾向》（《北方论丛》，2003年）；董灵超《宋人富贵诗论的转变》（《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

[2] 《诗人玉屑》“善言富贵”条引《漫叟诗话》，中华书局2011年版。

[3] 一作“崔”。当为韩存中或詹存中。

[4] 《诗话总龟》前集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东汉桓谭《新论·求辅》（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引《意林》。

[6] 彭民权《从晏殊、欧阳修之交恶看晏殊对韩愈的评价》（《文化与诗学》2014年第2期）一文从另外的角度谈到过这次事件，可参看。

[7] 《瀛奎律髓》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8]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9]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0] 可参考：曲德来《苏轼宜兴买田事考辨》（《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邵明珍《论苏东坡的归田情结》（《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等。

[11] （清）范能濬编集、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张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论苏轼的秦汉三国人物评论

马 强

内容提要 苏轼对帝王人物的陟罚臧否，主要取决于建立帝业的获取手段是否符合仁义大道，即道德评价高于事功评价。品评历史上的“卿相”（士大夫）品德风范是苏轼历史人物评论的重点，通过《留侯论》与《贾谊论》一正一反的经验教训，强调历史人物欲成功名者，必须具备忍辱负重的“隐忍”精神与修养。苏轼对孔融情有独钟，推崇其名士风骨气度和卓荦不凡精神；对扬雄、诸葛亮等人物，则是有褒有贬，特别是认为诸葛亮智取西蜀事功中有“诈力”成份，并给予政治道德的批判。苏轼的秦汉三国历史人物评论也体现了他见微知著、察盛观衰的历史观。

关键词 苏轼 帝王论 卿相论 政治道德

秦汉三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激烈动荡而又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一时期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历史人物都对后世社会影响深远，嬴秦立制、刘汉建国，奠定了中国历史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秦末大乱，楚汉相争，风云激荡，豪雄并起，一大批英雄豪杰、哲人谋士纷纷涌现，张良、韩信、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等，由布衣而相卿，由书生而谋臣，各自显要，蔚为大观，为太史公《史记》所载；而东汉末至魏蜀吴三国分立，与秦末楚汉之际历史惊人地相似，风云际会，大浪淘沙，又一批豪杰英雄从社会各个角落走上政治、军事的核心舞台，曹操、袁绍、司马懿、刘备、诸葛亮、关羽、孙权、周瑜等三国风流人物活跃于当时，流芳于后世。这些人物不仅构成了这两个时代的人物主体代表，也成为后世士大夫长期品评、讨论的重点。作为宋代杰出诗人与学者的苏轼一生写下过多篇史传评论，集中地展现了他的历史哲学观、历史价值观与历史审美观。而观其史论人物，其对秦汉、三国人物尤为青睐，苏轼通过其文赋诗词多次发表了对秦汉三国人物的评论与题咏，反映了其独到的历史旨趣与人

物评论选择。

苏轼幼承庭训，熟读经史。在其家庭教育中，史传不仅是启蒙教材，而且给予他深刻的影响，学者所熟知的苏母程氏亲授《后汉书·范滂传》故事就是一例。^{[1]10801} 苏轼历北宋仁、英、神、哲、徽五朝，经历北宋政治由盛而衰的转折，仕宦生涯坎坷曲折，命运大起大落，丰富的政治体验、对历史的熟谙与善于反思的性格特征，形成了他独到的人生观与历史观。坎坷的命运，多忧的心灵，使得他揽读经史、游历前贤遗迹时每每引发对历史的思考，宣泄其爱恨忠愤的情感，这使虽非史家的苏轼不仅具备“察盛观衰”“见微知著”的史家眼光，而且能够以文学的生动笔触抒发其对历史人物的感慨。所以苏轼史论的一大特点是擅长对人物的评论，说古论今，纵横捭阖，左右逢源，雄健豪放，充满史识与哲理。所论历史人物远至虞夏商周，中涉春秋战国、秦汉三国，近至隋唐五代，人物类型跨越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多种，构成了其论的一大特色。相对而言，其对秦汉、三国人物格外看重，评论几占史论人物之半。孔凡礼先生点校之《苏轼文集》第三、四卷就收录有《秦始皇帝论》、《汉高帝论》、《魏武帝论》、《留侯论》、《贾谊论》、《霍光论》、《晁错论》、《扬雄论》、《诸葛亮论》、《魏武帝论》等十篇秦汉三国人物史论。这些人物史论，但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成就都是苏轼史论中的精品，有不少脍炙人口，堪称精湛，历史颇有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一、苏轼的帝王论

秦汉三国时期，是封建帝制由初创到形成之时，皇帝君临天下，建章立制，统驭臣民，其帝德、才干、决策甚至心胸度量，都关涉国家政治是否长治久安，天下百姓是否安居乐业。秦始皇是秦帝国的缔造者，其雄才大略，横绝千古，不仅横扫六合，完成海内一统，结

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华夏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战乱，而且创建的国家制度成为后世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可谓史无前例的千古一帝。但秦始皇又是一个功败参半、历史上颇有争议的皇帝，建国后施行高压暴政，大搞严刑峻法，焚书坑儒，驱使黔首，又使得秦王朝甫建立短短二十多年即土崩瓦解，秦始皇本人也向来有“暴君”的恶谥。苏轼对秦始皇总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的《秦始皇帝论》^{[2]79~80}并未开门见山地批判，而是先从远古生民进化、圣人之礼萌生起篇，从高远的历史视角提出“圣人又忧其桀猾变诈而难治也，是故制礼以反其初。礼者，所以反本复始也”这一命题，然后论及秦始皇以强暴与诈力一统天下，虽然武功盖世，然终非仁义之举而不可取，“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自以为智术之有余，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废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来，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何者？其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苟生之无事乎礼，则凡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矣。呜呼！此秦之祸，所以至今而未息歟”。

苏轼史论中的三个帝王，秦始皇、汉高祖、魏武帝，都是南征北战、艰苦创业的开国之君，其功业的辉煌显赫自不待言，但帝业获取手段是否符合仁义大道，却是苏轼评论的基点。

比起历史上那些直接咒骂秦始皇为暴君暴政者，苏轼对秦始皇及其建制的批判无疑更为高瞻远瞩，认为秦以来礼乐废弛、“诈力”与战争连绵不绝，实乃“秦祸”破坏了三代圣人礼义之“藩墙”所致，这就从文明进化角度揭示了秦始皇及其暴政的负面作用。但苏轼的秦皇论仍然具有辩证的成份，并没有认为秦始皇一无是处而彻底否定，对秦始皇在文化上的贡献，苏轼并没有全盘否定。比如认为秦始皇统一文字，改小篆为秦隶书，便于士人书写，有其进步的一面：

昔者始有书契，以科斗为文，而其后始有规矩摹画之迹，盖今所谓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隶，其后日以变革，贵于速成，而从其易。又创为纸以易简策。是以天下簿书符檄，繁多委压，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书

简策，则虽欲繁多，其势无由。由此观之，则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开詐伪之端也。嗟乎，秦既不可及矣，苟后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则是引民而日趋于詐也，悲夫。（《秦始皇帝论》）^{[2]80}

不过，在对改小篆为秦隶，苏轼尽管认为是一个进步的“变革”，却又回到上古皆好的老调上来，《秦始皇帝论》认为因为书写功效提高，为奸诈之人提供了便利，甚至后来创纸易简也成其弊，致使“天下簿书符檄，繁多委压，而吏不能究”，这一诊断未免失之迂阔。书写工具的进步是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的表现，“簿书符檄，繁多委压”并非是因为书写工具改进所致，而是官吏处理积案存在的问题，怎么能够归之于“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呢？这无疑又反映了苏轼历史观中食古不化的一面。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形象及其功过是非，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予以多方面的刻画与评论，为读史者所熟悉，要给予再评价并且超越前者难度可想而知。苏轼的《汉高帝论》^{[2]81}的开篇与《秦始皇帝论》有些类似，依旧是以仁义作为评论帝王政治得失的天平，“汉高帝起于草莽之中，徒手奋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与兵之胜负而已，安知所谓仁义者哉？观其天资，固亦有合于仁义者，而不喜仁义之说，此如小人终日为不义，而至以不义说之，则亦怫然而怒”。这就为汉高祖的历史评价作了基本定位。但与《秦始皇帝论》的不同在于侧重对汉祚建立后高祖的一系列行为的评论，又如刘邦因宠爱戚氏夫人而欲更易太子，苏轼认为是帝王出于爱欲“废嫡立庶”的表现，“天下既平，以爱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之徒力争之，不能得，用留侯计仅得之。盖读其书至此，未尝不太息”^{[2]81}，帝王的一切作为皆应以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为前提，汉高祖因为一个妃子的爱欲更易太子，显然是一种失德行为。出人意料的是，《汉高帝论》并没有对刘邦的诸多经历与功过进行全面的评价，仅就“废嫡立庶”而最终又接受张良等大臣的谏议而放弃一事发表见解，侧重于皇帝“爱欲”与理性回归的审视，认为汉高祖的可贵之处在于终究能够纳谏，回归了作为一代政治家的理性复苏，“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仍然不失为明大体、

识大局的帝王。

三国时期的魏武帝曹操，也是一个在历史上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苏轼对曹操的评论是从“智”与“利”两个角度展开的。照例是首先进行哲理铺陈，然后切入人物评论。曹操的身份及其争霸天下的实力包括所处的历史环境较之秦皇、汉高，可谓更加复杂、险恶。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诸侯林立，要想力挫群英、一统全国谈何容易。但曹操以其超人的智慧对内灭袁绍，擒吕布，亡刘表、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北方，可谓雄才大略，无愧于乱世枭雄。但曹操又有其鲜明的“恶劣”之处，即嗜杀、奸诈、好色，特别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架空汉室，凌驾汉献，有篡汉野心，是屡受后世诟病的“软肋”。

苏轼对曹操有肯定，也有否定，并没有进行一边倒的道德评价。曹操是三国曹魏政权的奠基者，也是著名军事战略家，又是杰出诗人文豪，作为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其五言诗《观沧海》、《短歌行》、《龟虽寿》、《蒿里行》、《陌上桑》等皆为经典名篇，这是其有别于其他帝王的显著特点。苏轼在其《赤壁赋》中所刻画的曹孟德“横槊赋诗”的英雄伟岸形象跃然纸上，令人难忘。《魏武帝论》^{[2]183}的特点之一是从政治角度将曹操与孙权、刘备作了对比分析，对曹操军事生涯几次关键性的战略失误作出精辟评论。苏轼认为，曹操无疑是智者，东汉末年中央王朝分崩离析，国运何去？采取何种策略以应时变？并非每一个集团首领都看得很清楚。“世之所谓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审乎计之得失，如斯而已矣”。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当天下大乱、沧海横流之际，保持清醒的头脑，审时度势，扬长避短，获取取胜之资至关重要。但曹操尽管雄才大略，也一度统一北方，饮马长江，然而挥师江夏而遭赤壁之败，西征汉中黯然退兵，最终未能完成一统华夏的帝业，仍然是一失败者。失败原因何在？苏轼别具慧眼，敏锐指出其短板：“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故夫魏武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至于败。此不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之过欤！”《魏武帝论》全篇围绕“天下利害”这一主题展开评论，高屋建瓴，气势雄劲，将一代枭雄曹操的功过与

命运放在一个充满得失利害变数的历史环境中评论，因而对曹的评论也就没有落入一般的“抑曹扬刘”的单向思维窠臼，显得立意高远，不同凡响。

苏轼对曹操史事的熟悉非同寻常，在奏稿中对曹操的典故随手可引，熙宁七年苏轼在《论河北京京东盜贼状》^{[2]1753}论及河北区位的重要性时说：“光武亦自渔阳、上谷发突骑，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杀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后四方莫敢敌。”将曹操占领冀州与当年光武帝刘秀收复渔阳、上谷一举扭转颓势的历史相提并论。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2]366}，又提及昔曹操《祭桥公文》中有“车过、腹痛”之典。苏文中这两则涉曹史事的引用态度是中性的，看不出有何褒贬。只有在把曹操与刘备相提并论时，才看得出苏轼的好恶倾向，《东坡志林》所载宋代民间讲史中的三国故事更为人们所熟知：

途巷中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恶，辄与数钱，令聚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则颦蹙有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记王彭论曹刘之泽》）^{[2]2077}

这则纪事常常被学者作为三国故事在宋代流传的珍贵史料，实际上也反映了至迟在宋代，宣讲三国人物的评书中尊刘反曹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而苏轼所加的评议，则将曹操归为“小人”之列。由此可以看出，不同语境下苏轼对曹操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是褒多贬少。

二、苏轼的卿相论

秦汉三国历史人物多由布衣而卿相者^[3]，乘时势风云变幻，一大批社会最低层有才干者借势而起，纷纷投入各方政治军事集团，或建功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名将，或游说奔波于公侯将相之间，成为一代名士，构成了这两个时代士人的一大特色。苏轼对秦汉三国时期的士人关注较多，而且多有议论。在对张良、贾谊、晁错、霍光、扬雄、诸葛亮等人物的评论中，或评论其智慧，或称赞其修养，或赞美其为正义、为国家社稷而鞠躬尽瘁，表现了鲜明的历史人物价值取向。

（一）揭示历史人物欲成就大业，必须具

备隐忍涵养，不可意气用事

《留侯论》^{[2]104}是苏轼史论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其对汉初三杰之一张良的评论别具一格。张良出身布衣，但一生大智大慧，淡泊名利，秦末曾有“锥刺暴秦”的壮举，后辅佐刘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汉书·高祖记》），建有盖世之功。建国后，不贪恋高官厚禄，激流勇退，隐居山中，辟谷养气，全身而终，成为继春秋范蠡之后少有的“智者”。苏轼没有过多评价张良在推翻暴政与辅佐刘邦建国的贡献，而是从其忍辱负重的“过人之节”入手，先从“子房受书于圯上”述起，强调隐忍以成大事的道理。但张良并非天生的谋士，青年时代面对国离家破，也曾挺而走险，做过刺客，狙击秦皇，后侥幸逃脱，也才有后来之黄石公授书，苏轼认为这是张良由刺客向谋士转折的重要原因，“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留侯论》在论历史人物成败时，紧紧抓住一个“忍”字，认为这是张良、刘邦由弱而强、反败为胜的关键因素，“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也就是苏轼在《晁错论》^{[2]107}总结的“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的道理，从而揭示了历史政治人物性格修养在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作用。古来评品留侯众矣，唯东坡能够从“隐忍”以成大业角度切入，可谓独具慧眼。

（二）钦慕名士风骨气度，推崇卓荦不凡精神

汉末名士孔北海即东汉末年的孔融，少有异才，勤奋好学，曾任北海相，时称“孔北海”。性好宾客，喜抨击时政，言辞激烈，后因触怒曹操而被杀。苏轼对孔融风骨气度情有独钟，曾说：“孔北海以忠义气节冠天下，其势足与曹操相抗衡，决非两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汉，岂所谓轻于鸿毛者？何名为蠹哉？”^[4]意为孔融虽然政治势力上无法与曹操相比，忠义干云，则足可与曹操分庭抗礼。在《乐全先生集叙》^{[2]314}中又说：“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苏轼甚至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与孔融最为相似^[5]，苏诗也对孔融赞美有加：“堂堂孔

北海，直气凛群儿。”足见他对这位一代名士的欣赏与推崇。究其原因，主要是苏、孔二人在性情、心理、气质上有不少共同之处，惺惺相惜，可谓异代知己。

（三）质疑名家，挑战权威

扬雄是西汉末著名的政论家、汉赋大家，著有《法言》。扬雄在历史上享有盛名，苏轼同时代人王安石恃才傲物，却对扬雄深怀景仰，甚至以诗称赞之为“儒者凌夷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6]。苏轼《扬雄论》^{[2]111}整篇讨论人性善恶理论，针对扬雄人性善恶混杂说和韩愈人性论“三品说”发表自己看法，力驳扬雄“人之性善恶混”之论，指出：

虽然，扬雄之论，则固已近之。曰：
“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此其所以为异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恶，而以为善恶之皆出乎性也而已。

苏轼并没有因为扬雄、韩愈是经典名家就盲目随潮肯定，但也是说理在前，为“至理”而驳议，属于真正的学术讨论，这一精神无疑是可贵的。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出将入相，一生为恢复汉室南征北战，鞠躬尽瘁，是中国古代享有崇高名望的一代政治家、军事家，在宋代其名声更是如日月经天，深受景仰，苏轼对诸葛亮无疑是持肯定态度的，曾将诸葛亮上升到三代圣贤的高度，与殷商贤相伊尹并举：“古之君臣，有如二君而不相疑者，汤之于伊尹，刘玄德之于诸葛亮是也。”^[7]并且在诗中也高度评价诸葛亮：

有怀诸葛亮，万骑出汉巴。
吏士寂如水，萧萧闻马挝。
公才与曹丕，岂止十倍加。
顾瞻三辅间，势若风卷沙。
一朝长星坠，竟使蜀妇髽”。

——《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亮所从出师也》^{[8]176}

但在专论诸葛亮的《诸葛亮论》^{[2]112}中，却对诸葛亮有褒有贬，并非一味颂扬。《诸葛亮论》从“仁义”理论出发，开门见山地说：

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
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之，以周之所以守之者，汉

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苏轼认为，以诸葛亮之贤智，其文治武功中不应“仁义”与“诈力”夹杂，但在计取荆州、兼并西蜀之役中，诸葛亮均采用了“诈力”，为时人所诟病：

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

可见苏轼对诸葛亮的评价，并非是以事功，更多的是从政治道德作为批评基准的，反映了在儒家纲常伦理日益强化的北宋时代，士大夫对有“丞相第一”美誉的诸葛亮评价的时代特色。诸葛亮并非没有缺点，早在陈寿著《三国志》之《诸葛亮传》时，就委婉地指出诸葛亮政治、军事具有“治戒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8]的短板，可谓中肯之论。但比起陈寿对诸葛亮的批评，苏轼把对诸葛亮的评价提高到了政治伦理高度，无疑超越了陈寿。苏轼认为诸葛亮辅佐使用了“诈力”与曹操无异，此论断历史上罕见同论，是否正确可以商榷，诸葛亮作为一代兵家以智谋取胜无可厚非，更何况古代兵法有“兵不厌诈”之说，把用兵中的“诈力”夸大成政治伦理上的污点也不无偏激之处，但敢于对声望日隆的神坛人物“反弹琵琶”，对圣贤人物道其非，表现了苏轼历史人物评价中可贵的批判精神。

（四）以微见著，察盛观衰

苏轼历史的一大特点是以微见著，察盛观衰。贾谊是汉文帝时博士，官至太中大夫，为著名政论家，才气超人，但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贬谪为长沙王太傅，忧郁早逝，是历史上才大难用的悲剧人物。苏轼史论中有《贾谊论》^{[2]105~106}，同样对贾谊怀有深深的同情，感叹“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的悲剧，但基于贾谊具体处境的分析，认为其不能审时度势而以书生意气对抗权臣，结果必然以失败告终。“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雄雌。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进而批评贾谊之所以英年早逝，是因为“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可谓知人论世，切中要

害。与贾谊常常相提并论的晁错，苏轼也有独到的评论。晁错因主张削藩引发“吴楚七国之乱”而被皇帝冤杀，属于与贾谊不同的另一类悲剧人物。苏轼认为，晁错之死，是倡盛世危言，为天子忧，“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而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应该说，苏轼对晁错的评论基于北宋中期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并非就历史而论，其《晁错论》^{[2]107}开篇即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苏轼释褐入仕正当北宋太平盛世，《晁错论》大约作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次年应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按要求在制科考试前向朝廷上呈所作的策、论各二十五篇，《晁错论》即其一。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是典型的忧患之论，也是其“察盛观衰”史论的具体表现。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190)

注释

[1] 《宋史》本传载：“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比冠，博通经史”。

[2]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3] 赵翼：《念二十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卿相之局》。

[4] 《仇池笔记》卷下《孔北海》。

[5] 《仇池笔记》卷下《孔北海》：“王巩云：张安道说苏子瞻比予孔北海、诸葛孔明。孔明吾岂敢望？北海或似之，然不若是之蠢也。”

[6] 王安石《临川文集》卷三二《扬子二首》。

[7] 苏轼《书传》卷七《商书·伊尹相汤伐桀》。

[8]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马强，西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东坡与橘

王晋川

内容提要 苏东坡爱橘、种橘、伺橘、品橘、尝橘，一生写下数十首咏橘的诗词。这些咏橘诗文中蕴含着他对故乡的思念，对人生的感慨、理解等。

关键词 苏轼 橘 诗词

2019年3月8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眉山市长罗佳明，在四川代表团全体会议上，面对一百多家中外媒体，满腔热忱地向世界推荐“眉山春橘”。“市长卖橘”瞬间霸屏，一时传为佳话。

眉山产橘，产好橘。据《华阳国志》记载：早在汉代，巴东郡的鱼复、朐忍及犍为郡的南安就设有橘官，专门管理柑橘生产。

《史记·货殖列传》曰：“蜀、汉、江陵千树橘”“此其人皆与千户候等。”左思《蜀都赋》也说蜀地“户有橘柚之园”。说明汉晋时期，巴蜀地区就是柑橘的重要产地。生在宋代眉州的苏东坡，少小时就种过橘树，还亲手嫁接过橘树。君若不信，请看苏东坡写的《种橘帖》：

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王逸少云：“我卒当以乐死。”殆非虚言。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暇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元丰七年十月二日书。此帖又叫《楚颂帖》^{(1) 8751}。苏东坡在

这篇短文中透露了一个秘密，即少小时在家乡眉山，不仅种橘栽松，还能自接果木，俨然一技术娴熟的“老果农”。照此推断，其水平应与当今农科院的专家教授不相上下呢，呵呵！苏东坡对屈原高洁的品格十分推崇，因而仿效《橘颂》，欲筑“楚颂亭”。惜此夙愿未成，旋即又被卷入纷纷扰扰的政治漩涡，徒留下“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²⁾⁴⁰⁹的无奈与哀叹。

橘，原产地在中国。常绿乔木，枝细有刺，叶片卵圆，果呈球状，橘皮为红黄色，果肉多汁而甜。其皮、络、籽、叶均可入药，李时珍《本草纲目》上有明确记载。

橘与中华文明的成长相伴，“晏子使楚”的故事流长源远。晏子用橘与枳的不同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晏子春秋·杂下之十》

橘，很早便融入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国象棋被形象的称为“橘中戏”，下象棋叫“橘中乐”，就连象棋的棋谱，都名之曰“橘中秘”。

苏东坡爱橘、种橘、伺橘、品橘、尝橘，一生写下数十首咏橘的诗词。人们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作于杭州的《赠刘景文》^{(3) 3600}：

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
最是橙黄橘绿时。

橙黄橘绿，金风送爽，尽管荷尽菊残，但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总是与我们依依相伴。只要在秋风里结好你的果子，又何必在春光面前感到害羞呢？

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苏东坡在贬地黄州，吃到香甜的橘子，不觉“含滋嚼句齿牙香”。他自称“北客”，对“南金”（荆、扬系产金之地）的橘子赞誉有加，兴奋地写下《浣溪沙》（几共查梨到雪霜）^{(2) 484:}

几共查梨到雪霜，一经题品便生光，
木奴何处避雌黄。 北客有来初未识，
南金无价喜新尝，含滋嚼句齿牙香。

查梨指山楂与梨子。古人把橘称为木奴、木奴子，意谓橘如忠诚的奴仆，不仅不费衣食，每年还把甜美的果实奉献给主人。苏东坡一曲吟罢，意犹未尽，索性依原韵又写下一首《浣溪沙·咏橘》^{(2) 482:}

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芭绿叶照林光，
竹篱茅舍出青黄。 香雾噀人惊半破，
清泉流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

比之前一首，苏东坡写得更加细腻传神：一夜霜风以后，菊残荷枯，而新橘和橘叶生气勃勃，在阳光下更显得光亮耀眼。竹篱茅舍掩映在青黄相间的橘林之中。剥开新橘，橘皮溢出的汁液香雾一般散开来，令人惊喜。小心翼翼地品尝嫩嫩的橘瓣，甜甜的橘汁如清泉般流过齿颊。江南女子剥了橘子，三天后手上还留着余香。苏东坡不愧是“超级吃货”，看的分明，吃的仔细。他哪里是在吃橘子啊，分明是在细细咂摸生活的味道。

苏东坡写诗爱用典，不知典故的读起来不免感到晦涩。一旦弄清了出处，便澄清了迷雾，读起来格外顺畅熨贴。请看这首《食甘》^{(3) 483:}

一双罗帕未分珍，
林下先尝愧逐臣。
露叶霜枝剪寒碧，
金盘玉指破芳辛。

清泉蔌蔌先流齿，
香雾霏霏欲噀人。
坐客殷勤为收子，
千奴一掬奈吾贫。

开篇前二句即化用“怀橘奉亲”的典故，语出《三国志·吴志·陆绩传》：“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遗母。’术大奇之。”后世以“怀橘”为思亲、孝亲的典范，被列入二十四孝。古代“甘”即“柑”。柑橘熟了，本应该用罗帕包起来，给亲人分享的（无奈双亲已逝，再也无法怀橘奉亲了），如今却由自己来先品尝，因此内心感到不安。历经风霜后的柑橘用金色的盘子盛到面前，美人用纤纤玉指掰开，一时香气四溢。柑橘汁液饱满而甜美，口齿留香。朋友殷勤地劝我收下这些柑橘。想当年东汉太守李衡可以种千株柑橘来养家糊口，如今我却只有这一握柑橘，实在是太贫穷太可怜了。

苏东坡嘴上赞美着柑橘甜美，心中却五味杂陈。面对被谪贬的命运，困苦的生活，一咏三叹，读来令人心酸。

苏东坡与诗僧道潜（参寥）交好，元丰元年（1078）苏东坡途经江苏徐州时，道潜设茶局为东坡接风洗尘。道潜有诗，东坡回赠一首长诗《次韵僧潜见赠》^{(3) 1832:}，其中写道：

秋风吹梦过淮水，
想见橘柚垂空庭。
故人各在天一角，
相望落落如晨星。

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苏东坡知贡举，甲科进士刘焘，文章秀丽，尤善书法，笔势遒劲，甚得东坡青睐。苏东坡有诗见赠，鼓励其积极上进，操守其心。

时新满座闻名字，
别久何人记色香。
叶似杨梅蒸雾雨，
花如卢橘傲风霜。

每怜莼菜下盐豉，
肯与葡萄压酒浆。
回首惊尘卷飞雪，
诗情真合与君尝。

——《次韵刘焘抚勾蜜渍荔支》^{(3) 4281}

苏东坡于元祐七年自广陵(扬州)召还，元祐八年乞会稽(绍兴、苏州一带)，适逢友人求诗，得诗三首。诗题交代了作诗的缘由：《七年九月，自广陵召还，复馆于浴室东堂。八年六月，乞会稽，将去，汝公乞诗，乃复用前韵三首》^{(3) 4211}，其二曰：

梦绕吴山却月廊，
白梅卢橘觉犹香。
会稽且作须臾意，
从此归田策最良。

魂牵梦绕忆江南，杭州梵天寺的月廊，廊下的白梅卢橘啊，至今仍香在我的梦里。此番去会稽，逗留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我已经决定归隐田园，这是我的最佳选择。

苏东坡咏橘的诗文中，最神奇的莫过于《洞庭春色赋》^{(1) 51}。赋前有小引：

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犹子(侄子)德麟得之以饷予。

喝了朋友赵德麟送来的黄柑酒，东坡提笔“戏作赋曰”：

吾闻橘中之乐，不减商山。岂霜余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戏于其间？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斑。

“橘中之乐”语出《玄怪录》：“巴邛人橘园霜后，两橘大如三、四斗盎，剖之各有二老人相对游戏于其中。一叟曰：‘橘中之乐，不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为摘下耳。’俄而四叟共乘龙飞去。”^{(1) 53}苏东坡由此感悟到人生如泡影，纵使千里江山，也不过橘中之核瓣也。这篇赋写洞庭风光，借范蠡、夫差、西子，尽情抒发因仕途坎坷而郁于心中的不平。文章豪迈畅达，想像丰富瑰丽。其书法沉雄劲健，一气呵成，文章之气与文字之美珠联璧合，堪称双绝。

苏东坡在后记中写道：“绍圣元年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东坡此时已经59岁，书于被贬岭南途中的襄邑(河南睢县)。

《洞庭春色赋》一直被收藏于宫中，刻入《三希堂法帖》。乾隆曾评曰：“精气盘郁豪楮间，首尾丽富，信东坡书中所不多觏。”王世贞云：“此不惟以古雅胜，且姿态百出，而结构谨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眉山者，苏眉山苏轼也。溥仪出宫时将此卷携出，藏于长春。1945年伪满州国覆亡，此卷下落不明。吉林省博物馆苦寻三十多年，于1982年2月在一位中学老师家中寻得。惜卷前隔水、引首被人损坏，令人痛心不已。

注释

[1]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王晋川，眉山市文体局原调研员，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苏东坡谪琼居儋往返路径考

林冠群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对苏轼谪琼居儋往返路径进行了考证。

关键词 苏轼 谪琼往返路径 考证

北宋熙宁、元丰年间，于琼州设“琼管安抚司”，主管全岛军政事务，为海南最高行政首府。治所在当时的琼山县。但具体设置于哪年哪月，犹未有定论。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〇^{[1]7719}载，元丰四年十一月，“琼管司言：‘已罢海南经制事，如有生黎归附，乞量支官钱买物犒设。’”则在元丰四年十一月前已有“琼管”之说。又据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琼州兼广西路安抚都监》条载：“汉武帝斩南越，遣使自徐闻渡海略地，置珠崖、儋耳二郡。今雷州徐闻县递角场，直对琼管，一帆济海，半日可到，即其所由之道也。”据此两条史料参读可知，宋代由雷州半岛过琼，海道径自递角场“直对琼管”（指治所琼山县），顺风半日可到。

苏东坡于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自递角场渡海至琼管治所（琼山）登陆海南岛。他在渡海前所写的《与杨济甫二首》其一^{[2]6533}中说：“今日到海岸，地名递角场。明日顺风即过琼矣。”苏东坡登岸琼山后，以其“琼州别驾”的虚衔，不愿与当时的琼管安抚司长官张景温见面，称“知舟御在此，以病不果上谒”（《与张景温二首》其一^{[2]6421}）。在琼州约十余日后，苏东坡沿岛西路线，取道澄迈、临高，于七月二日抵达贬所昌化军（昌化军于熙宁六年十一月，由儋州改名）。

据此可知，苏东坡过海，由琼山登陆。这条线路就是南宋人周去非所记述的“即其所由之道也”。清代王文诰也称这条海道为当时的官员们过海必经的“福海”：“凡四

州过雷者，必由琼山出口，以其地渡舶所集，凡风色早晚迟速皆有一定故也。雷琼人号此路为‘福海’。其他处不渡审矣。”^[3]（《苏诗总案》卷四三）苏东坡到儋后，也有书信寄郑靖老又提到：“见说琼州不论时节有人船便也。”（《与郑靖老四首》其二）^{[2]6192}

然而，海南的一些学者却认为苏东坡渡海“由澄迈登陆”。虽然这一观点至今未见有系统的专文加以辨析，但却有不少文章公开提到这一点，造成一定的影响。是否正确，值得一辨。

持“澄迈登陆”的观点，在海南见于吉大文《上唐芷庵刺史书》，他说：

考宋时苏公渡海，由徐闻县直指澄迈县通潮驿，非如今日由海安指海口也。

吉大文这一“考”字下得很果决，简直毋庸置辩，但他的根据又在哪呢？他是咸丰年间的崖州举人，距离南宋时的周去非起码有六七百年的历史，距离苏公渡海更有八九百年了，他有什么理由否定《岭外代答》中关于递角场至琼山之间的海道为人船往来的“所由之道”呢？又有什么根据直说“苏公渡海，由徐闻直指澄迈县通潮驿”呢？看来，他连《岭外代答》似乎都没读过，所以对于七八百年前的事并非都了然于心。这样说似乎有点唐突古人，但看他在此文中的下一段论述，真不得不下此断语。因为吉大文的这篇《上唐芷庵刺史书》是与崖州知州唐镜沅（字芷庵）讨论唐代李德裕被贬崖州到底是北部的“崖州”还是南部的“崖州”。他主张是北部唐代的“崖州”。这点是对的，但接下来他说：

《唐书》载卫公居相府时，每阅舆图，遇崖州则闭目不观，恶其瘴毒，到者必死。故贬为司户参军有“崖州在何

处，生度鬼门关”之语。

这段话里，明显就有两个错误，证明他的读书不是很认真：其一，他说李德裕（卫公）当宰相时，在相府中看到地图上有“崖州”就会闭目不观，厌恶这地方的瘴毒。这其实是把唐代韦执谊的事错用在李德裕的头上，“韦冠李载”了！《旧唐书》卷一三五载，韦执谊“为郎官时，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谊遽命去之，闭目不观”。

《新唐书》卷一六八载：“及为相，所坐堂有图，不就省。既易，旬试观之，崖州图也。”可见新旧《唐书》均有这段记载，事涉韦执谊而不是李德裕。其二，他把杨炎的诗“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误记为李德裕的诗。如此含糊草率，硬要把距他七八百年前的历史事实“考”出个毫无根据的结论来。而且他“考”的是：“唐时渡海水路，想亦由此登岸。”原来结论是他推想出来的。这就更难让人信服了。

看来，持“澄迈登陆”观者，还不如多想一想，如果苏东坡不是在琼山登陆，他能在海湾中见到琼管安抚使张景温的“舟御在此”吗？如果他不知道琼州随时有人船过海，他能托琼州府副职（琼州倅）黄宣义帮他带信到广州吗？若是在澄迈登陆，他何不托赵梦得或其家人代劳而舍近求远找到六十余里外的琼山去？

此外，北宋释惠洪的《石门文字禅》更早提到苏东坡初至海南登陆琼山。他的《次韵苏东坡》诗：

先生谪儋耳，一叶航渺茫……琼山
绕珠渊，宝光夜煌煌。我曾至其舍，月
出波心房……（《石门文字禅》卷5）

释惠洪因罪于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被削去僧职，贬逐到崖州。人称“浪子和尚”。四年（1114）遇赦返回江西。他初至海南时，从他的诗中也知他在琼山登陆。他在《初至海南，呈张子修安抚》诗中说：

南来稍复召惊魂，知有留侯异代孙。
未即解衣甘九死，试令骑马赋千言。

琼山有月光相射，玉海无风浪自翻……

（《石门文字禅》卷一一）

但他遇赦返回大陆时却又明言从澄迈过海。他在该书卷二三《梦徐生序》中说：“余窜珠崖三年，既蒙恩泽释放，政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琼州澄迈北渡。”也许因为惠洪这一说法，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四载“苏轼条”：“元符五年，量移廉州，由澄迈北渡。”又在苏东坡《六月二十日夜渡海》^{[4]5130}一诗中注曰：“东坡自昌化移廉州，由澄迈北渡诗。”海南的一些学者对此说法坚信不疑，常在报刊杂志上坚持苏东坡北归由澄迈过海的观点。还有的人以苏东坡《渡海帖》中有句“轼将渡海，宿澄迈”为据，从而引证王象之的话，以为确论。其实，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一书，主要是节录当时数以百计的各地的方志，由于其“概览”性质，又篇幅巨大，以传抄耳食为据，未能细细实地检核，故常有疏漏舛误。比如记载苏轼这一条，“元符五年”就是元符三年之误，因宋哲宗并无“元符五年”的年号。又如在“昌化军”条中，记儋州城云：“即汉儋耳郡城。”其实，儋州城为唐代所筑，早已于数百年前移到高坡（即今中和古镇）。

读苏东坡《渡海帖》应注意其落款：六月十三日。若苏东坡于十三日或十四、十五日已渡海，则不应有《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该诗的明确日期可证苏东坡至二十日夜才离开海南。这之前，自十三日写《渡海帖》之后，他尚在琼山逗留数日。这点也有他的诗文为证。如他的《琼州惠通泉记》一文，明书“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记”。又有《洞酌亭》（并引）诗，其中的引言讲得非常明白：

丁丑岁六月，南迁过琼，始得双泉
之甘于城之东北隅，以告其人，自是汲
者常满。泉相去咫尺而异味。岁庚辰六
月十七日，迁于合浦，复过之。

这就是说，三年前，他从递角场渡海登陆琼山后，逗留期间发现了城东北隅的双泉，但没有写记与诗。三年后的六月十七日，重

又到琼山，应郡守陆公之请才写下这首诗，并以“引”叙其始末。那么，十八、十九日，苏东坡在琼山又有何活动呢？还是看释惠洪的《冷斋夜话》吧，该书卷五云：

又谒姜唐佐。唐佐不在，见其母。母迎笑，食余槟榔。余问：识苏公否？母曰：“识之，然无奈好吟诗。公尝杖而至，指西木榻自坐其上。问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还。有包灯心纸，公以手拭开，书满纸，祝曰：秀才归，当示之。”余索读之，醉墨欹倾曰：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空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这段记述姜唐佐母亲见苏东坡一事，只有在苏东坡北归过琼山时才有，也即应发生在十九、二十日这两天内。这是十八、十九日苏东坡回到琼山准备渡海前的活动。然而二十日仍有活动。据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四三载^[3]：“姜唐佐来见，约吴复古与唐佐会食作诗。”诗云：“天下风流笋饼餺，人间济楚蕈馒头。事须莫与缪汉吃，送与麻田吴远游。”是夜乃登舟至递角场。

至此可知，苏东坡来往于琼儋之间，都走同一条道路。并无于澄迈登陆之说。

为什么苏东坡北归仍至琼山出陆？这仍可以从他的诗文中求证。他在儋，获知遇赦消息后，曾写信给在雷州的秦少游云：

某启。近累得书教，海外孤老，志节朽败，何意复接平生钦友。伏阅妙迹，凛凛有生意，幸甚！幸甚！比日毒暑，尊候佳否？前所闻果的否？若信然，得文字后，亦须得半月乃行。自此径乘疍船至徐闻出路，不知犹及一见否？（《答秦太虚七首》其七）^{[2]5763}

从这封信可知，当时苏东坡急着要到雷州与秦观相见，甚至打算乘一般渔民的疍船过海。可是到写给秦观的第二封信时，他又改变了主意：

某书已封讫，乃得移廉之命，故复

作此纸。治装十日可办。但须得泉人许九船，即牢稳可恃。余疍船多不堪。而许见在外邑未还，须至少留待之。约此月二十五六间方可登舟。并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风色过渡，一日至递角场。但相风难克日尔。有书托吴君，雇二十壮夫来递角场相等，但请雇下，未要发来。至渡海前一两日，当别遣人去报也。若得及见少游，即大幸也。（《答秦太虚七首》其六）^{[2]5761}

他要等候泉州人许九的大商船，同时还要托徐闻县令吴君，请他事先帮雇下二十个精壮的民夫作搬运行李之用。总之还是要急着到雷州与秦观相见。所以在最后等不到许九船的情况下，决定走老路直达琼山过海。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他曾写信给琼山的姜唐佐云：

某已得合浦文字，见治装，不过六月初离此。只从石排或澄迈渡海，无缘更到琼会见也。此怀甚惆怅。（《与姜唐佐秀才六首》其六）^{[2]6360}

可见他原本是打算乘许九的大船从石排或澄迈渡海，不再到琼山与唐佐会面的，只因许九船等不到，才走来时的陆路，最后到琼山又见到了姜唐佐。

释惠洪在《石门文字禅》卷二三《送李仲元寄超然序》一文中也提到：“余至海南，留琼山。张公怜之，使就双井养病，在郡城之东北隅。东坡北渡，尝游爱泉。相去咫尺而异味，为名其亭曰洞酌。”再次证明，苏东坡北归由琼山过海。

注释

[1]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2]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四十三，巴蜀书社1985年版。

林冠群，海南日报社原总编助理，海南省儋州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苏轼版权保护问题研究

彭林泉

内容提要 本文从苏轼诗文的盗版情况、盗版《钱塘集》对苏轼的负面影响，苏轼作品盗版产生的制度原因、苏轼对盗版的态度，《钱塘集》初传高丽与苏轼建言禁止书籍输出高丽等方面进行分析，希望对苏轼法律思想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 苏轼 诗文 盗版 版权 保护

在苏轼生前，其诗文已被盗版，在境内外流传，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长期以来，苏学界对苏轼版权保护问题，少有深入而具体的研究。本文从苏轼诗文的盗版情况，盗版《钱塘集》对苏轼的负面影响，苏轼作品盗版产生的制度原因，苏轼对盗版的态度，《钱塘集》初传高丽与苏轼建言禁止书籍输出高丽等方面进行分析，希望对苏轼法律思想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苏轼诗文的盗版状况

版权，通常也称为著作权。版权的对象是作品。据统计，苏轼为我们留下了 2700 多首诗、300 多首词和 4000 多篇散文，包括奏议。

关于苏轼生前的著述，苏辙曾述及。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在常州不幸病逝。不久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概述了苏轼去世时编纂的苏轼著述情况，除完成苏洵未完成的《易传》，还有《论语说》、《书传》、《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

卷、《外制》三卷，以及晚年的诗四卷。这一数量较大，也是可靠的。

在此基础上，人们进行了具体分析。比如，曾枣庄先生对苏轼著作生前编刻的情况进行了详细叙述。他说，苏轼生前著述的编刻情况，主要有《南行集》（三苏合著）、《岐梁唱和诗集》（苏轼兄弟合著）、《钱塘集》、《超然集》、《黄楼集》、《眉山集》（熙宁末年行世）、《汝阴唱和集》、《大苏小集》（契丹刊刻）、《东坡集》（京师印本），以及刘沔编录的苏轼诗文集二十卷，陈慥所刻的《苏尚书诗集》，张宾老所编并载于蜀本的《东坡词》，《易传》、《论语说》、《书传》、《东坡志林》、《艾子杂说》。^{[1]68~80}《东坡后集》二十卷是在刘沔编录的苏轼诗文集二十卷的基础上增补其后所作诗文编辑而成的。不过，对京师印本《东坡集》的存在和《艾子杂说》是否是苏轼的作品，在苏学界存有争议。李之仪、陈振孙、胡仔、苏辙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东坡集》，均证明苏轼生前已有《东坡集》问世，有的还读过，据此可以推定《东坡集》的版本可能不止一种。

苏轼诗文在生前曾被多次辑集，有他本人编辑或参与编辑的，如《南行集》、《岐梁唱和诗集》、《和陶诗》、《东坡集》，但更多的是别人为他编辑的，有友人为他编辑的，如陈师仲、刘沔；也有政敌为他编的，如舒亶所编“印行四册”。有宋王朝辖区编的，也有契丹辖区刊编的。问题是苏轼在生前没有编辑刻印（版）过自己的文集、著述，

也没有授权、同意别人结集出版自己的文集，但在市场上出现了有关他的诗文的盗版。表现在以下从五个方面：

（一）盗版的作品

从笔者接触的资料来看，盗版苏轼的作品主要有《钱塘集》或《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眉山集》、《东坡集》、《大苏小集》等。这里的《钱塘集》为王诜编，不是陈师仲编的钱塘诗。按照曾枣庄先生的考证，钱塘诗当指熙宁年间苏轼通判杭州时所作诗，很可能是经过乌台诗案后，《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已毁板，曾任钱塘主簿的陈师仲编辑或收录的，据此，盗版的诗集是《钱塘集》，而不是《钱塘诗》，尽管从文字上看，《钱塘集》有两种，分别为王诜编和陈师仲编的。

（二）盗版的地域

在北宋朝所辖区，有苏轼诗集或文集的盗版，在境外，如契丹，也有苏轼诗集或文集的盗版。如契丹所刊的《大苏小集》。据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卷七说：

张芸叟奉使大辽，……间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
[2]118

这则材料表明表明，苏轼的《眉山集》已流传入“范阳书肆”，还印有《大苏小集》。

（三）盗版的种类

盗版苏轼作品的种类大致有二十多种。有论者认为，在生前，苏轼“并不想也没有编辑刊刻出版文集，但书肆上却流行署名苏轼的文集 20 余种，有的还流传到境外”^{[3]142}。也有论者认为，由于宋代书籍出版空前繁荣，为了谋利，侵犯作者和出版者版权之事屡见不鲜。尤其是盗版现象极为普遍，苏轼深受其害，他生前从未出版过文集，但是当时流传的“苏轼文集”却多达 20 多种，而正是这些文字为他惹来了乌台诗案之祸。^{[4]110}尽管盗版的名称、构成未明，但盗版的种类是相同的，有 20 多种，的确不少。

（四）盗版的次数

有的是一次盗版，有的是多次盗版，如《钱塘集》。《东坡乌台诗案·御史台检会送到册子》说：“检会送到册子，题名《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全册，内除目录更不抄写外，其三卷并录付中书门下。”^{[5]4}从《元丰续添

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的“元丰续添”四个字可以看出，熙宁年间可能已有人印行过《钱塘集》，至少已两次印行。

（五）盗版的方式

宋代的版盗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对原创原作进行盗印、改题盗印、改头换面盗印和直接盗版翻印。^[6]第一种盗版形式是诗文未经作者同意就被拿去刊刻。苏轼遭遇的主要是这一种，如《钱塘集》，也有遭遇第四种的情形，如时人编了一部《王状元集百家分类东坡先生诗》25 卷，改写盗版的宋刊本就有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建安魏忠卿家塾刻本、建安万卷堂家塾刻本、建安虞平斋务本堂刻本等各种版本。近人傅增湘为此书作跋并进行了考证，他认为：

此书宋代闽中刻本“版式行格皆同，盖人士喜诵苏诗，风行一时，流播四出，闽中坊肆遂争先镌刻，或就原版以摹刊，或改标名以动听，期于广销射利，故同时同地有五六刻之多，而于文字初无更订也。”^[7]

可见，苏轼的诗风行一时，福建书肆“争先镌刻，或就原版以摹刊，或改标名以动听”，有时候同时同地竟然会有五六个盗版出现。

一些商人借印刷技术的发展和出版的繁荣之机，大肆对苏轼诗文进行盗版，以谋取利益，以此过者衣食无忧的生活。如北宋徽宗崇宁初年，书坊刻工李仲宁，本来家境比较贫寒，但就是因为刻印盗版苏轼和黄庭坚的词翰而有了衣食无忧的生活。^{[3]142}这是个案，是偶见载录的其中之一。在“元祐党祸”期间，某州太守令李仲宁镌刻“党人碑”，他不愿意干，说：

小人家旧贫，止因开（刻）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温饱。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6]

这一表白揭示了靠刻印苏轼、黄庭坚的诗解决温饱的事实，这也是他不愿意刻元祐党人碑的直接原因。其实，像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

二、盗版《钱塘集》对苏轼的影响

关于盗版对苏轼的影响，已有文章涉及，并与“乌台诗案”相联。这已揭示了盗版对苏

轼的负面影响，值得重视。

对苏轼作品的盗版，使苏轼作品流传开来，不仅在北宋广为流传，也流传到境外，如契丹和高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元祐四年（1089），苏辙出使契丹归来后，在《北使还论记北边事札子五首》其一^{[6]747}说：

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

苏辙出使契丹不仅听说《眉山集》已在契丹流传，而且在辽南京集市上还看到兄苏轼的《眉山集》。可以说，在苏轼生前，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或文学家相比，苏轼诗文也许是刊刻最多、流传最广的。

一般地说，自己的诗文能够广为流传，提高知名度，是令人欣慰的。有些人还在寻求扩大名声。可是，在苏轼却不同，不仅市人逐利，弄得“真伪相伴”，“又多俗子改窜”，大大损害了苏轼的声誉。尤其是宋代朋党林立，党争不断，由于署名苏轼的盗版诗集的流行，苏轼的思想观点（包括一些不是苏轼的观点）大白于天下。政敌也正好下手，构陷成著名的“乌台诗案”，使苏轼受到政治迫害。^{[3]142~143}由此看来，苏轼也是受盗版损害最大的。

乌台诗案涉及苏轼在杭州、密州、徐州和湖州四地的诗文，但主要是通判杭州和知密州时的诗文，特别是《钱塘集》。这本诗集收录了苏轼在通判杭州时所作的诗，包括与王诜、李清臣、黄庭坚等人的诗赋，并非苏轼编辑出版，如前所述，为王诜编。对苏轼而言，不幸的是，盗版的《钱塘集》或《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成为“乌台诗案”主要的罪证材料。这本诗集共三卷，至今已不传。仅能从现存宋人朋九万、周紫芝《诗谳》和清人张鉴的《眉山诗案广证》、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等所录被指控的诗文来分析。

《钱塘集》中，部分创作指陈时政，讽喻新法，成为“乌台诗案”的罪证材料。从当时劾奏文字看，这些集子流播较广，影响较大。如何大正札子云：“（苏）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犹取镂板而鬻于市者进呈。”^{[5]1}舒亶札子云：“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他找了几首苏轼的诗，作为上奏弹劾的依据，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

讪謔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5]1~2}李定札子云：“（苏轼）衔怨怀怒，恣意丑诋；见于文字，众多共知。”^{[5]3}最后献词云：“作诗赋及诸般文字寄送王诜等，致有镂板印行。”^{[5]33}这些诗句出自苏轼的《山村五绝》《戏子由》《八月十五日看潮》等。

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值得注意的是，何正臣、舒亶、李宜和李定的劾奏状的后面一段小标题为“御史台检会送到册子”：交代“诗案的主要罪证，是杭州刊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后苏轼被判“当徙二年，会赦当原”，刑审院的结案判词如下：之一为“作诗赋寄王诜等，致有镂板印行，各系讥讽朝政。”^{[5]33}这与大理寺的判词是一样的。可见，《钱塘集》在当时曾镂板印行。

《钱塘集》何时刊印，至今也无法确定，但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

客观地讲，苏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于熙宁四年（1071）离开朝廷，通判杭州，七年离任。苏辙在《为兄轼下狱上书》中说：

（苏轼）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寮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8]622}

这里的“向者曾经臣寮缴进，陛下置而不问”，可能指沈括。旧诗是以盗版的形式传播，断送了苏轼的政治生命，改变了苏轼的命运，一些人也因“乌台诗案”受到牵连。

对此，今人有不同的看法，如王水照先生认为，被列入“乌台诗案”的不少诗作，和新法并没有关系”。从现存宋人朋九万、周紫芝《诗谳》和清人张鉴的《眉山诗案广证》等所录被指控为攻击新法的几十首诗文来看，其中不少和新法根本无关，或没有直接关系。这原

是可以理解的，围绕“乌台诗案”的斗争，不仅有变法借以打击反变法派意义，而且夹杂派系互相倾轧、报复的因素，因此，必须存在罗织周纳、锤炼逼供等官场司空见惯的现象。诗案中还有一些攻击盐法的诗，实际上也与新法没有多大的关系。苏轼的确写过一些反对新法的诗，如《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苦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9]404

这首诗作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秋，有攻击青苗法和免役法的内容，有政治保守倾向，也表现了部分历史真实。

三、苏轼作品盗版的制度原因

苏轼诗文被盗版，就其原因来说，是多方面的，比如，是名家名作，在社会上盛行，盗版可以非法获利。我国学者认为，苏轼诗文被书贾大量刊刻，除反映了北宋印刷业的发达外，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感人的艺术魅力，从而赢得了大量的读者。这就是苏轼一生虽屡遭贬责，作品虽被严加禁毁，却仍获得广泛流传的原因。^{[1]81}这是客观原因。从制度层面上讲，苏轼版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以下因素有关：

（一）对版权的属性并不明确，也没有达到共识

自唐代起，作者的创作权益受到重视。至宋代，版权意识和版权控制真正萌生，并得到强化。宋代出书时，封面后或封底上已开始印上“牌记”，牌记里印有作者、出版者名号、版权声明等。如当时出版的《东都事略》一书内页上，长方形牌记中便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宋王季平先生著”

“振露堂藏版”等字样，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中国版权保护例证，这也是“版权所有，不许翻印”最原始的出处。但是，版权是权利还是权力并不明确，存在争议。从作者的角度讲，版权是一种权利，民事权利；从官方的角度讲，

版权是一种权力，是控制思想的权力。由于在苏轼生活的北宋后期对此远没有形成共识，对其版权的保护是不力的。

（二）保护范围过狭

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翻版有例禁于宋代”。这是一个标志，具有重要的意义。说明宋代的版权保护思想也较为成熟，这与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有关。但是，在宋代，出现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对翻版的例禁是雕版印刷。我国学者郑思成认为：

从历史上的时间上看，更接近于现代版权保护的禁例，出现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而不是隋唐发明雕版印刷术之时，但就宋代来讲，已发现的禁例所保护的客体，仍旧是雕版印刷。^{[10]6}

“版本”一词，也出自宋代。不过，在苏轼生活的北宋后期，版权保护的范围内比较狭窄，主要是历书和经书。《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收录了一条元丰三年（1080）的诏令：

诏自今岁降大小历本付川、广、福建、江、浙、荆湖路转运司印卖，不得抑配。其钱岁终市轻赍物，附纲送历日所。余路听商人指定路分卖。^{[11]7366}

政府之所以垄断司天监独家出版日历，是因为历法在封建农业社会里极其重要，能上升到国本的层面。另据罗壁的《识遗》记载：监本的“九经”一经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想翻刻的话必须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其他涉及议论朝政、御书墨宝、宗教天文等的书籍，也往往在打击之列。换言之，当时政府管得最严的是历书和九部官方的儒家经典。这是必要的。为了保护版权，官方对某类别的书籍如历书，实行了垄断出版的政策，以指导农业生产，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政权统治。但对个人著作的保护不够。

（三）方式单一

宋代对版权保护的手段，主要有图书的榜示和牌文（告示）等。“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书籍版权，会向官府申请书籍的版权保护，官府审查确认后会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版权公文，申明书籍的版权所有人，并张贴在出版商云集处。同时，也会下发公文，让有司约束管辖范围肆的行为，如果有人盗版，将会销毁其刻版权，并依法定罪。这些保护版权的制度法令，推动了宋代书籍出版的蓬勃发展，也成

就了宋代书籍的传世美名。”^{[4]110}但是，对私人著述的盗版侵权，政府的惩罚手段和力度较弱，在苏轼生活的北宋后期更是如此。由于商人追逐利益的本性，书坊也会违规出版书籍。对此，宋代朝廷经常针对民间出版颁布诏令，甚至立法明确规定了禁止其出版的内容。虽然版权保护手段已使用，但仍未能杜绝抄剽和盗版行为。将别人的书稿改头换面再出版，或是直接换个名字翻刻的现象很普遍。在版权没有立法保护的情况下，虽然保护手段在使用，但仍未能杜绝抄剽和盗版行为。

（四）付费制度的缺失

版权，是随着印刷术出现的。它最早产生在北宋，而不是欧洲。以为产生在欧洲是误解。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在该组织的《版权基本知识》中指出：“有人把版权的起因与15世纪欧洲印刷术的发明联系在一起，但是，印刷术在更早的许多世纪之前，就已经在中国和朝鲜存在，只不过欧洲人还不知道而已。”何况，欧洲的印刷术是从中国传入的。^{[12]173~178}北宋时，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印刷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出版业的发达，作品传播更加快速。而文学的繁荣也推动了各类图书的出版。由此，赋予了版权的内容，但是当时并没有付费制度，所以，难以遏制盗版。在此之前，如唐代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也没有付费制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代，直到近期才有所改变。可见，在宋代缺少有效的版权保护制度。

当时在反盗版的过程中，作者或学界、业界并没有对反盗版形成共识，至多是单打独斗，无法形成正版产业的规模和繁荣。

四、苏轼对盗版的态度

苏轼曾经感叹过：“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李氏山房藏书记》）^{[13]359}在苏轼生活的北宋，出版业已经开始蓬勃发展，他会为自己这代人不用抄书而感到庆幸。可是他当时没有想到，盗版与正版是孪生兄弟，如影相随，自己成了盗版的受害者。

问题是苏轼在被盗版侵权后是否维权。从文献资料来看，苏轼对盗版他的作品，多次表

达了不满。

元祐四年（1089）5月，苏轼在给友人陈传道的信中，抱怨道：

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当俟稍暇，尽取旧诗文，存其不甚恶者，为一集。以公过取其言，当令人录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答陈传道五首》其二）^{[13]1574}

陈传道是苏轼生前诗文的热心收集者，但是，在苏轼看来，缺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辨别，说明他先后编的《超然集》、《黄楼集》，以及“今所示”的苏轼集，都存在求多不求精的毛病。苏轼只对刘河编录的苏轼晚年诗文集二十卷比较满意。苏轼认为，现在阁下给我看的，没有一篇是假的，也很少有错误。

这里的“市人”即指书贾，有的说指市肆中人，商人。意思是最近因为那些奸商很是心烦。他们喜欢把我的文章拿去刊刻，我恨不得毁掉他们的雕版。等我有空了，得把那些还看得过去的诗文集结起来，自己出版。可见，在被严重侵权，产生不满时，苏轼也有结集出版自己文集的念头，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未变成现实。

苏轼生前，其诗文的“镂版行世”，基本上都是旁人特别是书贾所为。在《与陈传道书》中，苏轼说“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又向刘河诉苦道：“世之蓄轼诗文者多矣，率真伪相半，又多为俗子所改窜，读之使人不平。”（《答刘河都曹书》）^{[13]1429}意思是，世上收存我的诗文的人多了，大多数是真假参半，又往往被世俗的人所窜改，读了叫人心里愤愤不平。有的把“不平”译为不安，不准确，没有反映苏轼的态度。但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能认识真品的人太少了，而这是自古以来就让人头痛的事。

元符三年（1100）三月，苏轼在《答刘河都曹书》^{[13]1429}一文中又说：

蒙示书教，及所编录拙诗文二十卷。轼平生以文字言语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补，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弃笔砚，为瘖默人，而习气宿业，未能尽去，亦谓随手云散鸟没矣。不知足下默随其后，掇拾编缀，略无遗者，览之慚汗，可为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轼诗文者

多矣，率真伪相半，又多为俗子所改窜，读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识真者少，盖从古所病。……今足下所示二十卷，无一篇伪者，又少谬误。

这里再次重复了上述的话，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上苏东坡诗文虽然流传很广，但是真的和假的交织在一起，让一般收藏、购阅者莫辨真伪。二是在苏轼看来，之所以出现“真伪相半”的情况大多又是因为那些“俗子”对苏轼诗文的窜改，这些伪作对苏轼的名誉有损无益。不仅如此，苏东坡对书坊利用刊苏氏诗文牟取利润的书商（书坊主），不仅因为假冒、窜改而使他愤愤不平，而且对于市人逐利的侵权弊端发出了惩治心声，“欲毁其板”。或许正是因为盗版，才断送了苏轼的政治生命。由于当时“毁板”惩治不轨书商，尚无法律可依，靠官府实行政处罚，得是有力之家，^{[3]142~143}因此，苏轼对侵权书商的“欲毁其板”的主张，也难以实现。可以说，在作品被数次侵权时，虽然苏轼多次流露出不满，但更多的是无奈。

其实，在一些诗文中，苏轼落款为眉山苏轼、眉阳苏轼、赵郡苏轼，从版权的角度讲，实为署名。从盗版的情况看，也是署真名苏轼，尚未发现假名、笔名、无名、盗名、更名、弃名等情况。署名权决定着著作权的归属，标记着作品的人格，而不仅仅是作者对自己姓名的一种标记；苏轼的作品具有作者独特的“风格”。遗憾的是，苏轼虽然有维权的意识，但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如编辑出版自己的诗集或文集，对“真伪相半”、窜改的，亲自校改修正，重新刊刻出版，以补救盗版者对自己荣誉的侵害，对读者的误导。

应当看到，苏轼在诗文中多次提及真伪，对一些名家作品的真伪，持谨慎的态度。如元祐八年（1093）七月十日，丹元道士前来拜访，与他谈起诗文，口述了据说是李白写的两首诗：

人生烛上花，光灭巧妍尽。
春风绕树头，日与化工进。
惟知雨露贪，不念零落近。
昔我飞骨时，惨见当涂坟。

青松霭明霞，缥缈山下村。
既死明月魄，无彼玻璃魂。

念此一洒酒，长啸登昆仑。

醉着鸾凤衣，星斗俯可扪。

——《记太白诗二首》^{[13]2097}

苏轼在《题跋》中，写了此卷的由来：“余顷在京师，有道人相访，风骨甚异，语论不凡。自云：‘常与物外诸公往还。’口诵此二篇，云：‘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李太白作也。’”^{[13]2097}是否是李白的作品，未下结论。

五、《钱塘集》初传高丽与苏轼建议禁止书籍输出高丽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苏轼文集初传高丽的是否是《钱塘集》，如果是，那么应是盗版的诗集。

王水照先生《苏轼文集初传高丽考》中说，据现存资料推断，早在苏轼在世时，他的文集已传入高丽。他依据的是苏颂的诗句和自注，以及《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的内容。苏颂在《己未九月》的诗中有两句“拟策进归中御府，文章传世带方州”。这里的方州指高丽。他在自注中说：“前年，高丽使者过余杭，市予瞻集以归。”这首诗作于元丰二年（1079），前年指熙宁十年（1077），“此年初苏轼由密州知州改赴徐州任，是时汇辑倅杭时（熙宁四年至七年）作品的《钱塘集》早已刊印，《超然集》（密州）或尚未行世，《黄楼集》（徐州）刊印更是后话，高丽使者所购之集，似是《钱塘集》。”^{[14]314}在此，王水照先生并未持肯定态度。苏颂时任杭州守，后曾被关押在苏轼隔壁牢房，对御史台审问苏轼的情形有过真实的记录：“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另据《宋史·高丽传》说：“往时高丽人往反皆自登州，（熙宁）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九年，复遣崔思训来，命中贵人仿都亭西驿例治馆，待之浸厚，其使来者亦益多。”^{[14]14046}王水照先生认为：“苏颂自注所说的‘高丽使者’，大概是熙宁九年由崔思训所率领的使团。他们从明州登陆，往返汴京，杭州是必经之路，觅购苏轼作于是时的作品结集《钱塘集》也就十分自然了。”^{[14]315}如果是这样，传入高丽的就是盗版的诗集。

苏集传入高丽后，迅速为彼帮士人所崇拜，至高丽朝中叶，出现了“专学东坡”的局

面，因而刊印苏集也就应运而生。现可考知最早的苏集高丽刻本当是“尚州摹本”和“全州新雕本”，均见于高丽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李奎报（1168～1241）为门人、全州牧崔君址“新雕”本《东坡文集》作的跋，从时间上看，这是在苏轼逝世后。

苏轼还建言禁止向高丽输出书籍，以加强防务问题。他有七篇奏议要求朝廷禁止向高丽输出书籍，反对密切宋与高丽的关系。其中，元祐四年和八年，曾先后两次向朝廷呈奏六篇札子。在《论高丽进奉状》、《论高丽进奉第二状》、《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善状》三文中。苏轼指出“（高丽）使者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议者以为所得赐予，大半归之契丹”

（《论高丽进奉状》^{[13]847}），要求期限船送明州归国。元祐八年二月，高丽使者又至汴京，欲购《册府元龟》等书，苏轼时任礼部尚书，又上《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13]994}，提出了著名的“五害说”，涉及财政、军事和外交等方面。在军事方面，图书文籍中涉及山川险要及边防利害，若允许出，为患不浅。在外交上，高丽、辽“阴相计构”。在苏轼看来，“今使者所至，图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岂复有善意哉？”“终必为北虏（契丹）用。其所得宋庭赐予，必分遣契丹，乃是借寇兵而负盗粮。”此外，高丽已为契丹藩国，其通好宋朝，恐为契丹向宋寻机提供借口。（《论苏轼的高丽观》）^{[14]318}

关于防止因图书输出而失密的问题，在当时紧张对峙的对外关系中习空见惯。如宋辽之间就相互禁书流出。《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十六^{[15]8290～8291}载：天圣五年（1027）二月二日，中书门下上言，辽国使臣和商人“将带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深不便稳”。朝廷于是颁布了相应的诏令。以后扩大为普遍施行的政策：康定元年（1040）五月，京师“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板鬻卖，流布于外，宋廷就此下诏：“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鞠闻奏。”（《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十四）^{[15]8296}至和二年（1055）五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言：“京师近有雕布（市）《宋贤文集》，其间或议论时政得失，恐传之四夷不便，乞焚毁，从之。”^{[11]4341}苏轼的禁书输出高丽之议，也就不足为

怪了。这与他反对宋神宗推行的亲丽政策有关，对亲丽政策的效果（联丽制契）持怀疑态度。苏辙也有相同的看法。因为高丽和辽国是政治同盟关系。不过，这依旧阻挡不了宋代书籍以各种渠道流传高丽。

如前所述，元祐四年（1089），苏辙出使辽国，在辽南京集市上看到苏轼的《眉山集》，并且在随后的与辽国当地官员的交淡中得知自己和父亲苏洵的作品也流传到了辽国。归国后，他在《北使还论记北边事札子五首》其一^{[8]747}中说：

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访闻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惟是禁民不得擅开板印行文字，令民间每欲开板，先具本申所属州，为选有文学官二员，据文字多少立限看详定夺，不犯上件事节，方得开行。仍重立擅开及看详不实之禁，其今日前已开本，仍委官定夺，有涉上件事节，并令破板毁弃。

针对可能带来的问题，苏辙主张“禁民不得擅开板印行文字”，与苏轼的建言向高丽禁止输书的目的是致的。

应看到，苏轼、苏辙对书籍出版内容标准、惩罚措施、审查步骤、审查人员素质标准等事宜均有上书，请求立法。虽然朝廷并未完全采纳他们的建议，但他们的想法无疑推动了书籍审查制度的完善。但是，官方的出版审查似乎并没有起那么大的作用。如国家禁止印刷关于士兵操练的书籍，以防军事机密泄露到辽金等地。苏辙以上的感叹：“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就是例证。出现这样的情况，与当时出版业的利润非常高密切相关。

苏轼的盗版诗集《钱塘集》初传高丽，苏轼还建言禁止向高丽输出书籍，以加强防务问题。这是值得关注的。

结束语

后人对宋版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明代高濂在《燕闲清赏》中论藏书时，对宋书有过“纸坚刻软”“字画如写”的评价，意思是宋书的纸张质量很好，印刷质量也属上乘，有论者认为，“宋版本校勘精美，刻印精美，成一代之书。”^[4]但苏轼诗文集的雕版情况未有详细的记载。《东坡集》四〇卷，苏轼著，南宋年间杭州刊本，公文书馆藏残本。看上去很精美。但盗版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盗版是“大恶”，如今，人们对著作权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提出并论证著作权人格权。我国学者认为，著作权人格权是系列权利，包含署名权（表明作者身份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尊重作品权（尊重作者权）、公开权（发表权）、为控制作品继续传播和利用之目的的收回权（追悔权）和接触权。署名权是一种彰显性权利，集中体现了作者的人格尊严，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尊重作品权是一种对作品内容的控制权，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思想自由；公开权、追悔权和接触权是一种对作品物的控制权，集中体现了作者的行为自由。^[16]在实践中，如何有效地保护版权、著作权、人格权，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它需要考量技术进步、市场竞争，制度或规则、价值观，考虑利益或产权，需要包括著作权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发挥版权的力量。在涉外贸易中存在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争议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回溯苏轼的一生和创作，可以看出他对其诗文的珍惜和对盗版的不满，我们在尽情享受苏轼诗文美感的同时，也应在新时期依法保护苏轼研究著作的版权，尊重保护著作权人的智力劳动。

注释

- [1] 曾枣庄著《苏轼历代研究概述》，巴蜀出版社 2018 年版。
- [2] 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岳麓书社 1984 年版。
- [3] 李明山主编《中国版权史》，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 [4] 知中《了不起的宋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7 年版。

- [5] 朋九万撰《乌台诗案》，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 [6] 祝尚书《论宋代的图书盗版与版权保护》，载《文献》2009 年第 1 期。
- [7] 傅增湘《元建安熊氏本百家注苏诗跋》，上海古籍出版社，载《燕园群书题记》卷十三。
- [8] 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 [9]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 [10] 郑思成著《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 [11]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 [12] [美]卡特（T. F Carter）《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商务印刷馆 1957 年版。
- [13]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 [14] 王水照著《苏轼研究》，中华书局 2015 年版。
- [15]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
- [16] 周晓冰《著作人格权的保护·前言》，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 年版。

彭林泉，四川省眉山市人民检察院专委、高级检察官、四川大学法学院刑事案件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苏轼《浣溪沙五首》墨迹辨疑

——读《苏轼〈浣溪沙〉词五首笺注之“墨迹”说辨误》有感

王琳祥

内容提要 凌先生“萧藏墨迹其实是一件伪作……托名苏轼的萧藏墨迹是对吴宽《东坡词卷》的临仿之作。萧藏墨迹以《东坡词卷》为蓝本，在内容上全抄吴书，在书风上亦与吴书逼肖，最后更改其落款，补以伪章、伪跋，以求射利”的结论值得商榷。萧藏墨迹是吴宽临仿苏东坡《浣溪沙五首》墨迹的蓝本，而不是凌先生所说吴宽身后的人“在内容上全抄吴书……”，凌先生将史实本末倒置了。清安歧《墨缘汇观录》中载吴宽“行书苏文忠公《浣溪沙五首》，共三十一行，书法亦学苏文忠”的记述已经将吴宽书东坡词卷的来龙去脉表述得清楚明白。凌先生提出“吴宽的《行书东坡词卷》所据苏词版本现已无从查考”，说明其立论底气不足。

关键词 苏东坡 黄州《浣溪沙五首》
墨迹 辨疑

近读凌天明先生发表于《词学》2019年第2期的《苏轼〈浣溪沙〉词五首笺注之“墨迹”说辨误》，受益匪浅。因笔者曾在《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上首发《但令人饱我愁无——喜见苏东坡黄州〈浣溪沙〉五首墨迹》，又于2018年在《国家人文历史》以及《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发表《国宝苏东坡黄州〈浣溪沙五首〉墨迹沉浮记》，对萧老收藏的苏东坡《浣溪沙五首》墨迹作过精心考证，凌先生也援引了笔者的学术心得，但

其结论却与笔者的学术观点相左，故作此文以商榷。

一、凌先生的结论值得商榷

凌先生认为萧藏的《浣溪沙五首》墨迹不是苏东坡的手迹，故称：“过眼、收藏、鉴定过墨迹原件的如吴传荣、杨守敬、史树青等名家皆认为是苏轼真迹，今人王琳祥、曹隽平等亦撰文称是苏轼真迹，但本文认为，以上所有人的判断都是错的，萧藏墨迹其实是一件伪作。……萧藏墨迹以只得苏字之形的吴宽《行书东坡词卷》为蓝本进行临仿，在内容上全抄吴书……”

凌先生认为“萧藏墨迹其实是一件伪作。……萧藏墨迹以只得苏字之形的吴宽《行书东坡词卷》为蓝本进行临仿，在内容上全抄吴书”。这样的判断合乎史实吗？我认为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一) 清安歧称吴宽《书东坡词卷》行书苏轼《浣溪沙五首》，书法亦学苏

清人安歧在《墨缘汇观录》中言：吴宽《书东坡词卷》“白纸本，行书苏文忠公《浣溪沙五首》，共三十一行，书法亦学苏文忠”。

吴宽（1435~1504）明代诗人、散文家。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会试、廷试获第一，入翰林，授修撰。曾侍孝宗东宫，孝宗即位，迁左庶子，预修《宪皇帝实录》，进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后又升任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等。吴宽作风高洁，不受时尚左右，而以清正自守。死后谥文定。少壮好学，于书无所不读，尤喜

《左传》、《汉书》、唐宋大家散文，最喜爱苏东坡的诗词文章。写字喜好模仿苏东坡的书迹，其秀劲处可与苏书媲美。

凌先生在其大作的第四部分“吴宽《书东坡词卷》与萧藏墨迹的关系”中说：“清初著名书画收藏家、鉴赏家安岐的《墨缘汇观录》有一则‘吴宽《书东坡词卷》’，其曰：白纸本行书苏文忠公《浣溪沙五首》，共三十一行，书法亦学苏文忠，前书苏题‘十二月二日雨后微雪，太守徐公君猷携酒见过，坐上作浣溪沙三首。明日酒醒，雪大作，复作两首’，词后款题‘偶阅东坡词录一过匏翁’，前押延陵朱文长印，后押太史氏朱文印、玉延亭主白文印。这应该是目前关于书写苏轼《浣溪沙》词五首最早的文献记载了。”

按，苏文忠公指苏东坡。

凌先生援引清人安岐《墨缘汇观录》的以上文字旨在说明安岐《墨缘汇观录》中的“吴宽《书东坡词卷》”是目前关于书写苏轼《浣溪沙》词五首最早的文献记载，但先生却忽视了安岐的以上记述尚有吴宽此作“行书苏文忠公《浣溪沙五首》，共三十一行，书法亦学苏文忠”等文字。“书法亦学苏文忠”七个字在这里尤为重要，文字表明吴宽此作不独抄写苏文忠公《浣溪沙五首》的内容，其书法也是学苏文忠公的。安岐《墨缘汇观录》的以上文字事实上已经将吴宽书东坡词卷的来龙去脉表述得清楚明白。

安岐字仪周，号麓村，晚号松泉老人，室名思原堂、古香书屋、洁水草堂，朝鲜族，先世入旗籍，天津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生，乾隆十年（1745）后卒，年岁不详。家富藏书，博雅好古，鉴赏古迹不爽毫发，倾家收藏项元汴、梁清标、耿昭忠、孙承泽、高士奇、卞永誉等名家所珍藏的书画，所庋名迹甲于海内，成为清初的大收藏家之一。安岐善于记事，对其寓目之法书名绘必认真记录，晚年将其积累数十年之书画札记拣选编次为《墨缘汇观录》。当今收藏界认为安岐的藏品“有清一代唯梁清标可与比肩”。安岐卒后所藏书画精品多归乾隆御府，藏书归杨氏海源阁。

紧接上文，凌先生说：“循此安岐信息，笔者找到了现藏于香港艺术馆虚白斋的吴宽书东坡词卷（虚白斋命名为‘吴宽《行书苏轼雪词卷》’）。该卷内容与萧藏墨迹毫无二致，

唯独吴书落款为‘偶阅东坡词，录一过。匏翁’，而萧藏墨迹落款为‘东坡居士轼’。”

有必要指出，凌先生刻意强调吴宽《行书苏轼雪词卷》的内容与萧藏墨迹毫无二致，只是落款不同，“吴书落款为‘偶阅东坡词，录一过。匏翁’，而萧藏墨迹落款为‘东坡居士轼’。”但对吴书落款为“偶阅东坡词，录一过。匏翁”的含义却未作任何解释，殊不知这种落款颇有讲究。

“偶阅东坡词”，表明吴宽此前没有见过苏东坡此词墨迹，因是偶然看到这五首词与通行的《浣溪沙五首》内容有异，觉得很有价值，故将其“录一过”。

“录”本是抄录的意思。“一过”，即抄录一遍。正如凌文所引，吴宽曾在《跋所摹东坡〈楚颂帖〉》中说：“邵文敬太守世家阳羨，其先作天远堂，盖取东坡至阳羨词语，见于周益公跋文。敬感其事，因俾予临一过，而请李宾之尽录益公之说，以见其家旧事，其意不在帖也。然此帖亦阳羨嘉话，文敬所宜得者。惜予不善用墨，遂使坡翁风韵衰飒，乃复摹一过而归之，庶终得其形似耳。文敬之官思南，便道过家，将揭旧扁于堂，倘能砻片石刻之堂中，亦一奇也。”

以上吴跋中的“临一过”“摹一过”之“一过”皆为临或摹一遍的意思。

与“临一过”“摹一过”稍有不同，吴宽在《行书苏轼雪词卷》里用的是“录一过”。吴宽为什么用“录”而不用“临”或“摹”，这本是凌先生应该探讨的课题，但先生忽略了这个“录”字的内涵。

学过书画的人都知道，临是照着原作或写或画；摹是用薄纸（绢）蒙在原作上面或写或画。临摹连用，则是指按照原作仿制书法和绘画作品的过程。临和摹各有长处，也各有不足。就书法而言，昔贤认为“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也就是说，临书容易学到笔画，可是不容易学到间架结构；摹书容易学到间架结构，可是不容易学到笔画。从难易程度来说，摹书容易临书较难。不管是临还是摹，都要以与范字相像为目标，从形似过渡到神似。故自古以来，人们在练习书法时大都临摹结合，扬其长而避其短。

吴宽在《跋所摹东坡楚颂帖》中先说邵文

敬“感其事，因俾予临一过”，后说“惜予不善用墨，遂使坡翁风韵衰飒，乃复摹一过而归之，庶终得其形似耳”。意思是先应邵文敬之请临写了一遍。后考虑到自己不善用墨，故又再摹一遍欲得其位置。文字表明，吴宽深知临、摹的区别，也深谙临摹之道。

录与临、摹的含义不同，一般情况下是指抄写。但在特殊情况下，又不单指抄写。

吴宽在《行书苏轼雪词卷》的题款中虽然用的是“录一过”，但从“偶阅东坡词，录一过”中的“偶阅东坡词”五个字，即可知吴宽的这幅作品实际上不止于抄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是在偶然间看到苏东坡这五首词后才动念头抄录的。阅的基本字义是看，“偶阅”就是在偶然间看到。这里的“阅”已不同于一般的阅读。这里的“东坡词”也不是指苏东坡诗词集中的这五首词，而指苏东坡亲手书写的一幅作品。欣赏书法作品用“阅”字比“读”字精准。由于眼前的这五首词非同一般，既有文学价值，又有书法价值，故吴宽“阅”后下决心摹写一遍，欲得其形。只是在摹写的过程中，吴宽发现自己摹写的作品与苏东坡的原作在字形神态上尚有一定的差距，且章法上也未能忠于原作，故用“录一过”而不用“临一过”或“摹一过”纪事，但在书写的過程中他确实有欲得其形的意识。

需要强调的是，安歧言吴宽此作“行书苏文忠公《浣溪沙五首》，共三十一行，书法亦学苏文忠”，是将吴宽“录一过”的“录”作了精准的解读，指出了吴宽是临仿苏东坡的手迹。

（二）吴宽《行书苏轼雪词卷》所据的版本溯源

有关吴宽《行书苏轼雪词卷》所据的苏词版本，这本是凌文必须作的功课，但凌先生在其大作中却未作深入考究，只是在文章的最后说：“吴宽的《行书东坡词卷》所据苏词版本现已无从查考。”

凌先生在谈吴宽《行书苏轼雪词卷》的传承过程中曾提到“吴书之后有向迪琮和饶宗颐二人的题跋”，且详细转述了向迪琮题跋的要点。令人遗憾的是，先生却未能在向迪琮的题跋上作一作功课。

向迪琮（1889～1969）字仲坚，清末民初双流城关镇人，同盟会员，大学教授。现将向迪

琮的题跋文字转述如下：

匏翁姓吴名宽，字原博，以文行，有声诸生间。成化中，会试、廷试皆第一，进礼部尚书，卒谥文定……翁书法摹东坡，其秀劲处殆与相埒。此卷录东坡词，为翁晚年极精意之笔。

向迪琮以上的题跋，与安歧的记述相近，其重点在“翁书法摹东坡，其秀劲处殆与相埒。此卷录东坡词，为翁晚年极精意之笔”。

在向迪琮看来，吴宽留世的书法作品虽然较多，但没有一幅能与《书东坡词卷》相提并论，故向迪琮认为“此卷录东坡词，为翁晚年极精意之笔”。

向迪琮言吴宽“书法摹东坡”“其秀劲处殆与相埒”，即强调吴宽写字喜好模仿苏东坡的书迹，其秀劲处可与苏书媲美。

摹，即照着样子书或画。埒，同等。相埒，相等。

紧接向迪琮上文，凌先生转述说：“（吴宽《行书苏轼雪词卷》）初为安仪周藏物。安氏籍没，此卷遂入清宫。安氏《墨缘汇观》、乾隆《石渠宝笈》并有着录。废帝宣统窃号满洲，曾携以出关。满亡后，俄掠废帝北去，庋藏名迹，散落人间，得之者畏祸，多埋匿隙地，不敢出以示人。厥后故都厂肆人纷集长春，争相购置，政府不知禁，于是流转京沪者日众……兹于古肆忽构斯卷，爱不忍释……民国第一戊子冬十月廿又五日，柳溪老人呵冻识。”

根据向迪琮的以上记述，凌先生认为：“该卷先由安歧收藏，后入清宫，一直到一九三二年宣统皇帝出关携之北去，最后落到向迪琮手中的时候，已是民国第一戊子（1948）了。”

紧接着，凌先生断言：“笔者经过认真观察和比对，认为托名苏轼的萧藏墨迹是对吴宽《东坡词卷》的临仿之作。萧藏墨迹以《东坡词卷》为蓝本，在内容上全抄吴书，在书风上亦与吴书逼肖，最后更改其落款，补以伪章、伪跋，以求射利。”

笔者反复品味向迪琮的以上记述，且仔细核对萧藏墨迹，却得不出凌先生的以上结论。

既然吴宽此作先被清康熙时代人安歧收藏，然后转入清宫，世人根本没有机会来临仿吴书并更改其落款，托名苏轼，且补以伪章、伪跋，为求射利弄虚作假。

凌先生既然提出此结论，就应该将临仿吴

书的人是谁作出交代，但先生对全抄吴书、在书风上亦与吴书逼肖的人是谁却没有解释，似有不妥。

(三) 吴宽《书东坡词卷》与萧藏墨迹之间的关系

笔者曾在《苏东坡黄州〈浣溪沙五首〉墨迹沉浮记》里对萧藏墨迹的传承作过考证，今根据其原件上的题跋以及前人钤盖的印章与吴宽的《行书苏轼雪词卷》比对，认为早在吴宽见到墨迹前数百年就有人关注这件作品。

笔者与凌先生的认知正好相反，即吴宽《行书苏轼雪词卷》所依据的蓝本正是萧藏墨迹，吴宽书录苏东坡《浣溪沙五首》的目的：一是得其内容以告天下，二是欲得苏字之形，丰富自己的书学知识。

那么史实究竟如何呢？

1. 元揭傒斯题跋见于墨迹原件

明代大书家董其昌曾在《画禅室随笔》卷一中记述：“东坡作书，于卷后余数尺，曰以待五百年后人作跋。其高自标许如此。”

元代延祐六年（1319），奎章阁侍讲学士揭傒斯受命主修国史，管理经筵事务，为皇帝拟写制表。一日，他在内府得见苏东坡《浣溪沙五首》墨迹，遵文宗图帖睦耳之命用小楷题跋于墨迹之后说：

古人不可见，所可见者，纸上之遗文耳，故诵其诗者，如闻其言；观其书法者，如对其人。苏长公为百世文章，翰墨千古一人。此卷为太守徐公雪天见访作。《浣溪沙五首》，诗既高古，书复神妙，与平日酬应者不同，想见其挥毫时眼空四海，神游八极。翰林学士揭傒斯。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号贞文，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元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与虞集、杨载、范椁同为“元诗四大家”，又与虞集、柳贯、黄溍并称“儒林四杰”。延祐元年（1314）由布衣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前后三入翰林，官奎章阁授经郎，迁翰林待制，拜集贤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阶中奉大夫，封豫章郡公。元代朝廷纂修辽、金、宋三史，揭傒斯担任总裁官。《辽史》成，得寒疾卒于史馆，谥文安。著有《文安集》。为文简洁严整，为诗清婉丽密。善楷书、行、草，朝廷典册，多出其手。

揭傒斯的以上题跋与苏东坡《浣溪沙五

首》的墨迹书写在同一幅纸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按凌先生所说：“萧藏墨迹以（吴宽）《东坡词卷》为蓝本，在内容上全抄吴书……最后更改其落款，补以伪章、伪跋，以求射利。”吴宽所书的《浣溪沙五首》并没有揭傒斯的题跋，那么揭傒斯的题跋从何而来？揭傒斯善楷书、行、草，朝廷典册多出其手，传世的作品也很多，如此精美的蝇头小楷谁又能模仿出来？

吴宽出生于1435年，卒于1504年，揭傒斯的生年为1274年，卒年为1344年，二者相隔将近两百年。

揭傒斯是历史上在苏东坡《浣溪沙五首》墨迹原件上题跋的第一人。如按凌先生所说，托名苏轼者为什么偏偏要以揭傒斯的名义作伪呢？

2. 《浣溪沙五首》墨迹被顾瑛收藏

元末明初，苏东坡的《浣溪沙五首》墨迹被著名文学家顾瑛收藏。

顾瑛（1310～1369），元代著名文学家，昆山（今属江苏）人。顾瑛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文人，他在元末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傲然出世，曾逃避和谢绝多方政治力量的征辟，因其家业豪富，筑有玉山草堂，又建藏书楼“玉山佳处”，以藏古书、名画、彝鼎、古玩。顾瑛轻财好客，广集天下名士诗人，与杨维桢、柯九思等人往来甚多，时有诗词唱和，玉山草堂遂成诗人游宴聚会场所。时天下纷乱，顾瑛尽散家财，削发为在家僧，又于其祖莹处为身后修造生圹，名曰金粟冢，自称“金粟道人”。

顾瑛十分珍惜苏东坡的《浣溪沙五首》墨迹，他没有在墨迹上题跋，只是在原件上钤盖了“金粟道人”阳文印一枚。

顾瑛与吴宽相隔一百多年。作伪者为什么选择顾瑛作伪？凌先生理应作出解释。遗憾的是，凌先生拿不出证据。

3. 《浣溪沙五首》墨迹被徐有贞收藏

明英宗朱祁镇时代，苏东坡的《浣溪沙五首》墨迹被南州武功伯徐有贞收藏。

徐有贞（1407～1472），字元玉，号天全，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系著名书法家祝允明（1460～1527）的外祖父。宣德八年（1433）进士，授翰林编修。因谋划英宗朱祁镇复位，封南州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

在徐有贞收藏《浣溪沙五首》墨迹之前，

此墨宝由元末明初人顾瑛收藏转为明代内府收藏，朝廷在作品上钤盖“内府宝玩”葫芦印一枚。

徐有贞在《浣溪沙五首》墨迹上也未留下手迹，只钤盖了“南州武功伯家藏之宝”的印记，旨在表明这件宝物是英宗赏赐给自己的。

徐有贞的生活年代稍早于吴宽，徐有贞卒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而吴宽正是这一年会试、廷试获第一，入翰林，授修撰。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实证，在吴宽走上仕途之日的明宪宗成化年间，徐有贞收藏《浣溪沙五首》墨迹已有很长时间。

从理论上讲，在吴宽第一次见到苏东坡《浣溪沙五首》墨迹之前，见到这件作品的人应该是大有人在。吴宽临仿的《浣溪沙五首》在当时既为人熟知，如按凌先生所说，吴宽身后托名苏轼者选择徐有贞作伪是一件很容易被人识破的事情，换言之，作伪者更改其落款，补以伪章、伪跋，想以此求利，这在当时是很難站得住脚的。更何况祝允明为明代书法大家，吴宽身后的人敢借其外祖父的名义作伪的几率更小。

凌先生对揭傒斯、顾瑛、徐有贞等名家的题跋与钤章不作任何考证，一概视为伪跋伪章，并称“托名苏轼的萧藏墨迹是对吴宽《东坡词卷》的临仿之作”，失之草率。

4. 吴宽模仿苏书的痕迹明显

凌先生在其大作中把大量的精力花在将吴宽的作品与萧藏的墨迹进行比对上，由于他的立足点是想说明托名苏轼的萧藏墨迹是依据吴宽作品临仿的，故得出了与史实相反的结论。

将吴宽《行书东坡词卷》的字迹与苏东坡手书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二者的差距。苏东坡手书因是一气呵成，字与字之间有连带笔意，笔画自然天成，其结体稍呈扁形，一看就有苏体的特征。欲得苏字形体的吴宽因是模仿，故字的笔画显得生涩，缺少自然灵动的神态，看似苏体而全非。如果将其单独品味，根本没有苏字的感觉。如脚、收、带、车、烟、梦、昏、晓、苏、浣、沙等字，乍看相似，细看则相差甚远。

吴宽的用墨、用笔以及天赋等，与苏轼不可比肩。只是吴宽一生推崇苏轼书法，对其心慕手追，故与吴宽同时代的金石学家都穆褒奖

其书曰：“书翰之妙，识者以为不减大苏。”

在笔者看来，萧藏墨迹不是吴宽身后的人模仿吴宽的笔迹更改其落款，托名苏轼，补以伪章、伪跋，以求射利，而是吴宽模仿萧藏苏东坡的墨迹，以“录一过”的名义署上自己的别号，其不录“东坡居士轼”五个字是合乎情理的。

二、《浣溪沙五首》墨迹的创作背景

苏东坡《浣溪沙五首》与《黄州寒食帖》的创作时间不同，其背景具有独特性，《浣溪沙五首》与苏轼《太白仙诗卷》风格相近。凌先生在其大作中将萧藏的墨迹与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进行比对，认为萧藏墨迹的字体左低右高，与《黄州寒食帖》不合，故而怀疑其非苏东坡手书。凌先生看似在理的说法实则是对苏东坡的书法缺少全面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浣溪沙五首》墨迹的创作背景具有特殊性缺乏了解。

（一）苏东坡《浣溪沙五首》书于天寒地冻之时

凌先生将《浣溪沙五首》与《黄州寒食二首》进行比对看似在理，但先生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二者的书写时间。《浣溪沙五首》书写于天寒地冻的十二月上旬，《黄州寒食二首》书写于阳春三月清明节前。

在《浣溪沙五首》中，苏东坡用了“归时冰颗乱粘须”、“小槽春酒冻真珠”、“天寒酒色转头无”、“冻吟谁伴捻髭须”、“樽前何手镊霜须”这样的词句，表明当日天气寒冷，大雪纷飞，冰冻令人难堪。试想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书写字，笔墨冻结，怎么能得心应手？

以上提过的向迪琮于冬十月二十五日写字尚有“柳溪老人呵冻识”的说法，更何况十二月大雪纷飞之日，呵冻暖笔势在必然。

与《浣溪沙五首》书写的时间不同，《黄州寒食二首》写于阳春三月，天气暖和，笔墨俱佳，写字运笔能得心应手，可以随着自己的情绪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凌先生将《浣溪沙五首》与《黄州寒食二首》进行比对是不科学的。

（二）苏东坡的执笔方式与众不同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曾在《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跋东坡论笔》中说“东

坡不善双钩悬腕”。同时代的画家李公麟在《西园雅集图》中所绘的苏东坡的单钩执笔方式与黄庭坚的记述吻合。清人戈守智在《汉溪书法通解》卷一中说：“或曰：坡公作戈，多成病笔，腕著而笔卧，字皆左秀而右枯。”

从李公麟《西园雅集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执毛笔的单钩方式确实与众不同，很像今人拿硬笔写字，其手腕着案，笔呈卧式，难怪其字形体式呈倾斜状，其字左秀右枯。有书法经验的人熟知凡不能悬腕者，写不好榜书，稍大一点的字就会感觉力不从心。尤其在天寒地冻之日，像苏东坡这种不能悬腕的单钩执笔方式短处凸显，写出的字更会左低右高。

（三）苏东坡喜欢用浓墨作书写字

苏东坡喜欢用浓墨作书写字，这是古今书画鉴赏家的共识。之所以用浓墨，是因为他经常利用研墨来构思佳句。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李之仪在《姑溪题跋》卷一中说：“东坡捉笔近，特善运笔，而尤喜（浓）墨。遇作字，必浓研，几如糊，然后濡染。”

明代大书画家文征明跋东坡《楚颂帖》真迹说：“世传苏文忠喜墨书，至有‘墨猪’之诮。”

吴宽曾在《匏庵家藏集》卷十七中记述：“坡仙写竹如作书，笔底溢出书之余。书形譬石压蟾蜍，俗人不识称墨猪。古来书画同一法，使彼见此当轩渠……”

只是天寒地冻之时，墨汁过浓，影响书写效果，这是因为毛笔一旦被浓墨裹住，其笔锋缺少弹力，往往运笔迟滞，写出的字显得疲软无力。

萧藏墨迹《浣溪沙五首》的墨色颇浓，故每个字看上去，灵动稍嫌不足。

将苏东坡执笔的方式与不能悬腕、喜好用浓墨等诸多要素通盘考虑，再把天寒地冻的特殊时段加在一起，《浣溪沙五首》墨迹与《黄州寒食二首》墨迹稍有不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四）《浣溪沙五首》墨迹与苏轼《太白仙诗卷》风格相近

凌先生将《浣溪沙五首》中的相关字与某些作品中的字进行比对，认为《浣溪沙五首》中的字不符合他平生的写法，这种比较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苏东坡在一生中写的字变化多

端，每幅字因各自的环境、情绪不同，其结构自然不同，其点、横、竖、撇、捺便各具神态。

宋人李之仪（姑溪）在《跋东坡帖》中所说：“东坡从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观之，几不出于一人之手。至于文章，在场屋间与海外归时，略无增损，岂书或学而然，文章非学而然耶？”清人杨宾在《大瓢偶笔》卷五中：“姑溪云‘东坡从少至老所作字，几不出于一人之手’。余谓无论老少，工力不同，即一时兴会，亦自有异，无足怪也。”

有趣的是，笔者曾将《浣溪沙五首》墨迹与苏轼的《太白仙诗卷》进行比对，感觉两幅作品书写的风格近似。《太白仙诗卷》为苏轼元祐八年（1093）所书。在传世的苏书墨迹中，书家认为《黄州寒食诗帖》和此卷最具神韵。古今书法鉴赏家皆认为《太白仙诗卷》是苏轼最不顾及笔法、字法、章法，最率意而为的作品，但书家的性情、学养、功夫都在其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正所谓“无意于佳乃佳”。

《浣溪沙五首》墨迹与《太白仙诗卷》的创作背景有相似之处，二者都饱含着深情，只不过书写的时节不同，故《浣溪沙五首》墨迹字字独立而略显拘谨，看不出太大的情绪变化，但《太白仙诗卷》的创作显然是处于一种波澜起伏的情绪之中。

《太白仙诗卷》中有很多字的造型也是左低右高，呈倾斜状，如：头、落、塗、朝、既、死、璃、脱、洒、岷、嵩、祐、传等。

三、《浣溪沙五首》墨迹原创作者是苏东坡

《浣溪沙五首》墨迹的内容与古今流传的所有版本不同，其自注独一无二，原创作者是苏东坡。

萧藏的墨迹之所以被吴宽、安岐等人重视，是因为其内容与通行的版本有别。笔者曾在《但令人饱我愁无——喜见苏东坡黄州〈浣溪沙〉五首墨迹》中作过考证，现存最早的苏词版本南宋人傅干的《注坡词》中竟没有苏东坡的四条自注，就连权威的中华书局1965年版的《全宋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的《苏轼全集》中，《浣溪沙》居然也没有苏东坡的自注。正因为如此，萧藏墨迹的珍贵是

不言而喻的。

不独如此，墨迹的内容与通行的版本亦有区别。现分述如下：

墨迹词序“太守徐公君猷”，《全宋词》、《全集》为“太守徐君猷”；墨迹“雪大作，复作两首”，《全宋词》《全集》作“雪大作，又作二首”。

墨迹词一“雪床初下瓦跳珠”之后有自注：“京师俚语，谓霰为雪床。”《全宋词》作“雪林初下瓦疏珠”，无注；《全集》内容同墨迹，无注。

墨迹词二“小槽春酒冻真珠”，《全宋词》同；《全集》作“小槽春酒滴真珠”；墨迹在“门前轆轤使君车”后自注：“公见访时，方醉睡未起。”《全宋词》、《全集》无注。

墨迹词三“荐士已曾飞鹗表”，《全宋词》、《全集》作“荐士已闻飞鹗表”。

墨迹词四“冻吟谁伴捻髭须”，《全宋词》同，《全集》作“冻吟谁伴拈髭须”。

墨迹词五“万顷风潮不记苏”，《全宋词》、《全集》皆作“万顷风涛不记苏”；墨迹在“万顷风潮不记苏”后自注：“轼有田在苏州，今岁风潮荡尽。”《全宋词》、《全集》皆无注。

墨迹“樽前呵手镀霜须”，《全宋词》、《全集》为“樽前呵手镀霜须”。

此外，《全宋词》、《全集》有“又前韵”或“又再和前韵”等字，墨迹则无。墨迹尚有落款“东坡居士轼”五个字。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人傅干《注坡词》将《浣溪沙》五首创作时间定于元丰五年，且在词五“万顷风涛不记苏”后说：“旧注云：‘公有薄田在苏，今岁为风涛荡尽。’”傅干没有见过《浣溪沙五首》墨迹，故与墨迹的自注“轼有田在苏州，今岁风潮荡尽”有异。“今岁风潮荡尽”，典型的当事人的语气，指的是作词之年，即元丰四年七月九日苏州遭受平地丈余的大风海潮。苏东坡在《书游垂虹亭》中说得清楚明白：“今岁七月九日，海风驾潮，平地丈余，荡尽无复孑遗矣。追思曩时，真一梦也。元丰四年十月二十日，黄州临皋亭夜坐书。”

垂虹亭在今江苏省吴江县东垂虹桥上，离苏州只有十多公里。

元丰四年（1081）十二月大雪，还可从当时人以下诗文中印证：孔平仲有《元丰四年十二月大雪》诗，苏东坡于元丰四年十二月作《江

城子》，其序云：“大雪，有怀朱康叔使君……”又作《送牛尾狸与徐使君》诗，自注：“时大雪中。”《记梦回文二首》叙中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当月又作小记《书雪》说：“黄州今年大雪盈尺，吾方种麦东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无薪米者，亦为之耿耿不寐，悲夫！”此小记写在《浣溪沙五首》之后，既可证《浣溪沙五首》创作于元丰四年十二月，亦可作“但令人饱我愁无”的笺注。

《浣溪沙五首》墨迹的内容与古今流传的所有版本不同，其四条自注非一般人所能伪造，故原创作者是苏东坡。

四、汪康年并不是认定墨迹作者是苏东坡的第一人

汪康年迳称“苏文忠手书《浣溪沙五首》”是因为他坚信《浣溪沙五首》墨迹是苏东坡真迹，但汪康年并不是认定墨迹作者是苏东坡的第一人。

凌先生认定萧藏的《浣溪沙五首》墨迹不是苏东坡的手迹，故在大作中声称：“汪康年迳称‘苏文忠手书《浣溪沙五首》’，朱祖谋、龙榆生递引其说，曹树铭则以吴传荣所拓《浣溪沙五首》用于苏词笺注，但误称收于《景苏园帖》，后之学者纷从其说。过眼、收藏、鉴定过墨迹原件的如吴传荣、杨守敬、史树青等名家皆认为是苏轼真迹，今人王琳祥、曹隽平等亦撰文称是苏轼真迹，但本文认为，以上所有人的判断都是错的，萧藏墨迹其实是一件伪作。……萧藏墨迹以只得苏字之形的吴宽《行书东坡词卷》为蓝本进行临仿，居然骗过了汪康年、杨守敬、吴传荣、史树青等人，同时，也导致了朱祖谋、龙榆生、曹树铭及薛瑞生、刘尚荣等苏词笺注者的误会，讹传至今。……吴宽的《行书东坡词卷》所据苏词版本现已无从查考，但它对于苏词笺注的参考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在今后的苏词研究中，亟须去伪存真，谨慎引用汪康年、曹树铭的论说。”

将凌先生以上的文字梳理，分为五个层

次，其一，萧藏的《浣溪沙五首》墨迹因汪康年迳称“苏文忠手书《浣溪沙五首》”而被朱祖谋、龙榆生所重视并转述。其二，因吴传荣摹刻了《浣溪沙五首》，曹树铭用其内容为苏词笺注。因曹树铭误将吴传荣摹刻的《浣溪沙五首》当成了杨守敬选刻的《景苏园帖》，后之学者以讹传讹，纷从其说。其三，过眼、收藏、鉴定过墨迹原件的如吴传荣、杨守敬、史树青等名家皆认为是苏轼真迹，今人王琳祥、曹隽平等亦撰文称是苏轼真迹。其四，以上所有人的判断都是错的，萧藏墨迹其实是一件伪作。其五、在今后的苏词研究中，亟须去伪存真，谨慎引用汪康年、曹树铭的论说。

无庸讳言，凌先生是有意将萧藏的《浣溪沙》五首墨迹的承传过程斩头去尾，其将汪康年视为称萧藏的《浣溪沙五首》墨迹为“苏文忠手书《浣溪沙五首》”第一人是错误的。事实上，在汪康年迳称“苏文忠手书《浣溪沙五首》”之前，湖广总督张之洞已将其作为苏东坡的墨宝独自欣赏或临仿很久了。汪康年在《汪穰卿笔记》中记述自己在张之洞府中看到过《浣溪沙五首》墨迹的原文是：“在张文襄幕，见苏文忠公手书《浣溪沙五首》，‘雪林初下瓦跳珠’句，‘林’作‘床’。注：‘京师俚语，霰为雪床。’”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特别喜欢苏东坡的书法，曾刻苦摹习苏体，故其字颇有苏书的韵味。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汪康年曾为张之洞的幕僚，并在自强书院担任编辑兼任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习。由于汪康年受张之洞之托为他的两个孙子授课，故有幸目睹《浣溪沙五首》墨迹的风采。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晚年号恢伯。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光绪年间进士。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系张之洞的幕僚。光绪十六年（1890），他应张之洞之招，为其孙子授课。

也就是说，汪康年见到苏东坡《浣溪沙五首》墨迹是在光绪十六年。

有必要在此说明，《浣溪沙五首》墨迹揭傒斯的题跋之后钤盖有“黄小园曾观”阳文印章。黄小园即黄铎，清同治六年（1867）举人，曾作过徽州教授。也就是说，汪康年目睹《浣溪沙五首》墨迹之时，墨迹上已有“黄小园曾观”的印章。

汪康年目睹《浣溪沙五首》墨迹之后，汉阳人吴传荣作为收藏者自觉此墨迹的贵重，故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斥巨资，将《浣溪沙五首》墨迹与揭傒斯的题跋钩摹上石，并将拓本分赠同好。

吴传荣，字筱珊，清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举人，曾任武昌府兴国州训导。吴氏精书法，擅楷书，汉阳归元寺《藏经阁记》即由其书丹。

宣统三年（1911），岁在辛亥。十二月，吴传荣携苏东坡《浣溪沙五首》墨迹拜会为避乱寓居上海的杨守敬。

当杨守敬见到《浣溪沙五首》墨迹时感慨万千，当即题跋其后说：“此东坡在黄州作，诗书皆妙。辛亥嘉平月观于沪上，因题。邻苏老人，时年七十有三。”不独如此，杨守敬还应吴传荣之请，题签曰：“东坡浣溪沙五首，辛亥嘉平月，邻苏老人题。”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湖北宜都人。博学多才，在地理、目录版本、金石文字、书法、书学理论以及藏书诸方面成就巨大，一生著述达83种之多，有“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的美誉。杨守敬是清代著名的书法鉴赏家。光绪十年（1884），杨守敬从日本回国，旋任黄冈县教谕，筑室藏书，名之为“邻苏园”，自号“邻苏老人”。光绪十六年（1890），杨守敬应黄冈知县杨寿昌之请，精心选刻《景苏园帖》六卷。以杨守敬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此余为成都杨葆初所选刻，大抵皆从旧本摹出，皆流传有绪之迹，绝少伪作，固应为苏书鉅观。”并认为：“余意此帖虽后出，当为近世集苏书之

冠。”

令人遗憾的是《景苏园帖》六卷内没有收录《浣溪沙五首》的墨迹，这是因《浣溪沙五首》墨迹的原件当年正在张之洞府上，杨守敬没有机会接触原作。

民国十六年（1927），吴传荣将《浣溪沙》拓本赠给当时的收藏家张仁芬，他在拓本上题签：“苏文忠公浣溪沙词墨拓，桂荪宝玩，传荣赠。”并钤“吴传荣印”一枚。吴氏在拓本上首分别标明墨迹与古今坊间刻印本的区别，并在题跋中强调：“苏文忠公《浣溪沙五首》，用硬黄笺所书，现藏敝庐。宜都杨惺吾先生题跋，称为‘诗书皆妙’。光绪癸卯春钩摹上石，俾广流传。坊本苏集无小注，‘雪床’作‘雪林’，以此证之，足证坊本之误与词句之妙。其他出入处亦多，用特标出，以俟鉴赏家之审定焉。民国十有六年，汉阳吴传荣志。”跋后钤有“传荣之印”。

张仁芬（1868～1936）字季郁，号桂荪，晚年号簠庐退叟。祖居汉阳西门外，是近代著名收藏家。

吴传荣在赠给张仁芬的拓本上题跋说：“（墨迹）现藏敝庐。宜都杨惺吾先生题跋，称为‘诗书皆妙’。”文字表明，杨守敬为《浣溪沙五首》墨迹题签题跋之日，《浣溪沙五首》墨迹还在吴传荣家珍藏。

二十世纪初，朱祖谋的《东坡乐府编年》、龙榆生的《东坡词编年笺注》相继面世，此后四十多年笺注苏词者蔚然成风，曹树铭、郑向恒、唐玲玲、薛瑞生多家皆有苏词全集注。以上名家对《浣溪沙五首》墨迹皆有记述，其承袭关系大略如下：

清末宣统二年（1910），朱祖谋《东坡乐府编年》三卷成书。朱祖谋在《浣溪沙五首》注中援引了汪康年的以上说法。

朱祖谋（1857～1931）原名朱孝臧，字藿生，一字古微，一作古薇，号沤尹，又号彊村，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因病假归作上海寓公。工

倚声，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著作丰富。书法合颜、柳于一炉；写人物、梅花多饶逸趣。卒年七十五。著有《彊村词》。

朱祖谋辞世前，以遗稿及生平校词朱墨双砚相授门生龙榆生，并吩咐说：“吾未竟之业，子其为我了之。”龙榆生秉承遗命，并作《东坡乐府编年笺注》。龙榆生在《东坡乐府编年笺注》中也援引了汪康年的说法。

龙榆生（1902～1966），江西万载人。名沐勋，晚年以字行。在家族中行七，笺注故又自称龙七。别号忍寒居士、风雨龙吟室主、荒鸡警梦室主等。40岁后又自署箨公。1948年后又名元亮。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早年师从黄侃、陈衍和朱祖谋等名师习诗词及文字音韵学，后遂终身致力于词学研究。

1974年，曹树铭《苏东坡词》在1968年8月修正版的基础上再版，由香港上海印书馆出版。曹树铭在校注《浣溪沙五首》时首创了“杨守敬序刻《景苏园帖》第五次五首浣溪沙墨迹石刻，末字鬚俱作须”的说法，且有“东坡自注‘京师俚语，谓霰为雪床’”等记述，但他把苏轼词五的自注“今岁风潮荡尽”说成是“今荡尽”，却又让人怀疑其是否真的见过《景苏园帖》石刻。

事实证明，曹树铭误将吴传荣摹刻的《浣溪沙五首》当成了杨守敬选刻的《景苏园帖》，后之笺注苏词的学者因不明曹说有误，以讹传讹，纷从其说。

凌先生以上“汪康年迳称‘苏文忠手书《浣溪沙五首》’，朱祖谋、龙榆生递引其说，曹树铭则以吴传荣所拓《浣溪沙五首》用于苏词笺注，但误称收于《景苏园帖》，居然骗过了汪康年、杨守敬、吴传荣、史树青等人，同时，也导致了朱祖谋、龙榆生、曹树铭及薛瑞生、刘尚荣等苏词笺注者的误会，讹传至今”的说法即来源如此。

结语

综上所述，凌先生“萧藏墨迹其实是一件伪作。……托名苏轼的萧藏墨迹是对吴宽《东坡词卷》的临仿之作。萧藏墨迹以《东坡词卷》为蓝本，在内容上全抄吴书，在书风上亦与吴书逼肖，最后更改其落款，补以伪章、伪跋，以求射利”的结论值得商榷。萧藏墨迹是吴宽临仿苏东坡《浣溪沙五首》墨迹的蓝本，而不是凌先生所说吴宽身后的人“在内容上全抄吴书……”，凌先生将史实本末倒置了。清康熙时代人安歧《墨缘汇观录》吴宽“行书苏文忠公《浣溪沙五首》，共三十一行，书法亦学苏文忠”的记述已经将吴宽书东坡词卷的来龙去脉表述得清楚明白。汪康年迳称“苏文忠手书《浣溪沙五首》”是因为他坚信《浣溪沙五首》墨迹是苏轼真迹，但汪康年并不是认定墨迹的作者是苏东坡的第一人，因为生活于康熙时代的安歧早有此说。凌先生将安歧之说弃置不顾，只言“汪康年迳称‘苏文忠手书《浣溪沙五首》’，朱祖谋、龙榆生递引其说”，这显然是不尊重史实的。凌先生全盘否定前贤今人考证的成果，称“托名苏轼的萧藏墨迹是对吴宽《东坡词卷》的临仿之作”，又说“吴宽的《行书东坡词卷》所据苏词版本现已无从查考”，其立论底气不足。凌先生拿不出元明时代人揭傒斯、顾瑛、徐有贞等名家的题跋与钤章系伪造的证据，其结论是经不起批驳的。平生最喜爱苏东坡诗词文章书法的吴宽眼见《浣溪沙五首》墨迹的内容比古今流传的所有版本翔实，其四条自注内容前所未有，故决心临写一遍，以辨讹误，凌先生在其大作中也承认萧藏《浣溪沙五首》墨迹“对于苏词笺注的参考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说明萧藏《浣溪沙五首》墨迹的内容具有权威性，后世的学者不可能伪造得如此精准。

苏东坡《浣溪沙五首》墨迹自元人揭傒斯题跋之后，见者不是很多，吴宽第一次临仿其作，虽然仅得其形，但将其内容公诸于世，善莫大焉；清人吴传荣将墨迹摹刻上石，旨在扩大影响，将墨迹留传久远。吴宽、吴

传荣为弘扬苏东坡《浣溪沙五首》墨迹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然而苏东坡《浣溪沙五首》墨迹作为国之瑰宝更值得有识者宝爱珍藏。

参考文献

- [1]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 [2] 龙榆生校笺《东坡乐府笺》，香港商务印书馆 1936 年排印本，商务印书馆 1958 年重印，华正书局（香港）1979 年出版。
- [3] 曹树铭校编《苏东坡词》，1968 年 8 月香港上海印书馆修正版，1974 年 2 月再版。
- [4] 刘尚荣著《傅干注坡词校证》，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 [5] 薛瑞生著《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 1998 年版。
- [6] 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 [7] 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 [8] 汪筱舫纂辑，王琳祥点校《黄州赤壁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 [9] 《景苏园帖》，长江出版传媒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主编：童德昭。释文点校：王琳祥。
- [10] 王琳祥《但令人饱我愁无——喜见苏东坡黄州〈浣溪沙〉五首墨迹》，《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 18 卷第 5 期 2016 年 10 月出版。
- [11] 王琳祥《国宝苏东坡黄州〈浣溪沙〉五首墨迹沉浮记》，《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 20 卷第 5 期 2018 年 5 月出版。
- [12] 吴宽《家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 [13] 安歧《墨缘汇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王琳祥，黄冈市赤壁管理处副研究馆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滕县公堂记》碑修复及源流考

王龙海 李存建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滕县公堂记》碑的产生背景、流传历史和主要内容，并就修复该碑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纠正了历代《苏轼文集》中的谬误。于今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关键词 《滕县公堂记》碑 修复 源流

苏轼虽然诗文数千篇，但在宋代被刻石，且流传至今的原碑极少，完整的宋碑更是难觅其一。《滕县公堂记》碑一度遗失、泯灭，被当做“四旧”砸坏，历经千年沧桑，被农民馆长李存建找到，保存在山东墨子故里博物馆中，这是十分值得庆幸的。该碑写于乌台诗案前一年，集苏轼诗文于一体，碑体基本完整，十分珍贵。在李馆长的大力支持下，笔者用时两年，将遗失、损坏的碑文修复，厘清了该碑的源流，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一览此碑的神采。

一、碑刻的诞生、流传

1077年苏轼刚到徐州不久，就遇到了暴雨和黄河溃堤引发的特大洪水。徐州四周一片汪洋，附近城池纷纷被淹。徐州城地势低洼，而且位于黄河主泄洪道上，城破房倾势不可免。在苏轼带领下，经过艰苦的抗洪抢险，终于让徐州转危为安，创造了大宋军民抗洪抢险的奇迹。次年，各地洪灾水毁工程陆续完工，七月他到徐州北面同样受灾的滕县考察。当时范纯粹知滕县^[1]，工作勤奋廉洁，不修官宅修县衙，于是苏轼为新建的县衙写了《滕县公堂记》。不久，范纯粹离任，王安上^[2]继任县令，将《滕县公堂记》勒石，矗立在县衙里。

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贬黄州。《滕县公堂记》也被作为讥讪朝政的罪证。因为这时王安石已经失势，御史台追查起立碑“讥讽朝政”的责任来，王安上也冤冤枉枉地被追两官勒停、罚铜20斤。

南宋人洪迈在《容斋五笔》中记载了此事的缘由：“是时，新法正行，御史大夫如束湿^[3]，虽任二千石之重，而一钱、粒粟不敢辄用，否则必著册书。东坡公叹其廉，适为徐守，故为作《滕县公堂记》。《滕县公堂记》之出，新进趋时之士，倡疾以恶之。”^[4]

不过，好在宋神宗没再继续搞文字狱，《滕县公堂记》碑也没有被砸。

到了徽宗登基、蔡京祸国时，朝廷大兴元祐党祸，严令各地毁坏苏轼等人的书籍、印板、石刻，苏轼墨迹被毁坏殆尽。苏碑只有徐州的《黄楼赋》碑、《眉州远景楼记》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滕县公堂记》碑等少数碑刻被暗中保护下来。党禁废弛后，《滕县公堂记》碑重新立在县衙，直到了文革时期。

破四旧运动开始后，《滕县公堂记》碑被“红卫兵”砸坏、遗弃，下落不明。文革结束，滕县的老文化人、民间爱好者，听说该碑当年没有被完全砸烂，于是开始搜寻其下落。李存建偶然得知此碑可能在临近的沛县。他刚好在筹建博物馆，于是每天骑摩托去沛县摆地摊，四处寻访打听。三年中，他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先是经济匮乏，三年摆摊收入才200元钱，远远不够油费；再是安全问题，冬季在冰天雪地里往返上百里，数次摔倒，甚至有次骨折住院。终于他寻访到了石碑的线索，于是一路追寻，在居民家里见到了它。此时，他已家徒四壁，只得四处借钱。筹够20万元巨款，找了不少亲戚朋友去做工作，人家终于点头，同意他把石碑拉走。

于是历经磨难的《滕县公堂记》碑，回到了家乡滕州市。^[5]

二、修复过程

从网络上找到的石碑照片模糊，文字无法辨认，我十分遗憾，于是和李馆长联系，反复

探讨，得知碑文毁损严重，三分之一的字迹已经无法辨认。听说国内不少单位、专家，都曾去研究，我建议他请他们支持，修复此碑，可是一直无人回应他的求助。

2019年初，我身体略为好转，一年过去，修复石碑的事情仍然没有进展，于是我决定自己动手，修复该碑。李馆长十分支持，马上用手机拍来了照片。可是他的手机实在太老旧了，远远达不到书法处理的像素级。他答应请专家来，专门给我拓一张。

7月份得到他的好消息，拓片做好了。因为从未见面，不好意思请他邮寄给我，于是利用出差的半天空档，绕道去滕州，到木石镇的乡村，拜见了李馆长。

烈日炎炎，李馆长见我浑身冒汗，关心我吃午饭没有，不停地递水、递扇子。我们站在石碑前仔细辨认，交谈石碑的历史。

石碑由当地坚硬的青石制成，高190厘米、宽80厘米、厚22厘米，顶部为圆额。额眉上题写两横排大篆字“滕县公堂记”，下部的正文为楷体，竖排。正文共16行，每行满排27字。正面斑驳陆离，隐隐约约看到有些字迹。加上展室光线差，逆光，完全看不清碑文。石碑重达1500公斤，我们两人也无法挪动。

《滕县公堂记》正文共412字，其中缺失61字，大部分损坏的160字，小部分损坏的130字，三者占全部字数的85%。加上变形、走样的字体，需要修复的达到80%以上。

打开《滕县公堂记》拓片，我感觉大事不好，不仅因为几乎每个字都有损坏，而且该碑字体独特，在苏轼书法作品中找不到类似的墨迹。苏轼写此碑时，既不是正书，也不是行楷，而是楷中带隶，和其前后期的书体差别很大。这就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了。

我大学学的是文科，对计算机的爱好也是业余级别，勉强打字而已。以前修复过苏轼的书法残片，也是业余爱好，小打小闹。真的要修复这通书法残碑？我心里突然没底。可是千里迢迢坐飞机、火车、三轮车、走路过去，怎么好就此放弃呢？何况李馆长当晚还追到招待所，坚决地请我吃饭。齐鲁汉子的深情，万万不敢辜负。

带着拓片回到眉山，开始拍照、扫描，揣摩其字体、碑韵，前后经历了四次失败：第一

次是扫描件失真，过于相信专业的大型公司设备的教训深刻。最后还是自己用复印机，逐字逐句复印。第二次是字迹像素不够，缩小看差不多，放成原文大小，就有细微差异。第三次是苏体味太重，忠于原碑不足，没有残碑的厚重感。第四次是版本错乱，文字规格不一。四个月的努力，不仅白废，还用掉了8瓶滴眼液，双臂几断，耗尽了自己全部的意志和体力。

对修复此碑，我几乎绝望，看来不得不放弃了。思前想后，不忍前功尽弃，决定最后一次尝试。于是请了工作以来第一次劳累的“公休假”，闭门不出，在家感应东坡写碑的心情，把握一闪而过的灵感，终于满意地看到了修复的碑文。

修复完成后，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重新校正了《东坡全集》中《滕县公堂记》的文字6个。分别是：“菲”为“破”，“二”为“异”，“捐”为“损”，“赞”为“讚”，“日（吾力有所未暇而已）”为“曰”，“（天圣）之（年）”为“元”。

三、错综复杂的《滕县公堂记》

苏轼写《滕县公堂记》，有支持下属工作、阐述自己为政观点、委婉规劝变法三层曲折的含意。

苏轼从小敬仰范仲淹，可是在他进京赶考前，范仲淹就去世了。范仲淹有四个儿子，范纯粹是老四。苏轼在京城史馆时，和老二范纯仁关系不错，但是和范纯粹没有交往。他知徐州时，范纯粹也从中书省（检正官），贬知滕县。范纯粹到基层任职，工作之余整理父亲的遗稿。苏轼除了支持他的工作，还答应给《范文正公文集》作叙^[6]。

当时新党不仅严格控制舆论，还严格控制各地的投资和修建，修衙门更是被严厉禁止的。象滕县县衙这样52年没维修过的官署不少，苏轼在杭州工作期间，就曾发生过衙门倒塌，压死官员的事情。在暴雨洪灾后，滕县官署更是摇摇欲坠，无法办公，苏轼支持报批县衙的修建。县衙竣工后不久，范纯粹也没享用几天，就调走了。估计有人批评他违规修建“办公用房”，因此苏轼在《滕县公堂记》里，特意说明事情的原委：“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圣元年^[7]，县令太常

博士张君太素，实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赞善大夫范君纯粹，自公府掾谪为令，复一新之。”^{[8]1192}并褒奖范纯粹节俭：“寝室未治，范君非嫌于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

苏轼为官一生，始终践行孟子的仁政思想，把老百姓的疾苦冷暖放在心上。孟子的故乡就在邹国^[9]，滕国和邹国当时都是鲁国的属国，有很多孔子的门徒，儒家学说盛行于朝野。孟子师承子思的弟子，他曾到宋、鲁、齐、楚列国游说，宣扬仁政的思想。虽然这些国君很尊重他，但是没有谁真的对其“民为本”的话感兴趣。估计听到“君为轻”时，心头更是嗤之以鼻。孔子在世时，各国争霸，对他以“礼”

“仁”为核心的为政观不感兴趣。孟子生活的时代，战国称雄，各国大力开疆拓边，醉心于壮大武力，因此集聚钱财、武装军队才是大事，富民惠民简直就是糊涂。世道败坏如此，孟子接连碰壁，心情很糟糕。

这时滕文公邀请他去滕国讲学，让他居住在最高档的“国宾馆”——“上宾馆”^[10]，真心实意地请教孟子的治国之道。

孟子主张治国要首先培养任用优秀官员，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水平。其次是清明吏治，避免官场逆淘汰。“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第三是适当提高待遇。“今也膝有仓禀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等思想，都是在滕国期间讲述的，这就是《孟子·滕文公》的来历。文中“厉民以自养”，就是引用于《孟子》。“滕，古邑也。”也是点名滕县自古“号为难治”，因此修建官署实际上为民。

滕文公是个实在人，认真实践了孟子的“仁政”后，取得了民富国足，群贤咸集的好效果，滕国也被美誉为“善国”。但是，滕方圆不过百里，实在太小了，地盘在和现在一个县差不多，无法在列强夹缝中生存。滕文公刚要大展宏图时，不幸去世。滕国很快就被宋康王灭掉了。

在《滕县公堂记》里，苏轼开篇就讲为官之本：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养也。
才有大小，故养有厚薄；苟有益于人，虽
厉民以自养不为泰^[11]。是故饮食必丰，

车服必安，宫室必壮，使令之人必给，则人轻去其家而重去其国。如使衣食菲恶不如吾私，宫室敝陋不如吾庐，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虽君子安之无不可者。^{[8]1192}

这段话的意思也是引申于《孟子·滕文公》，孟子说：“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社会有分工，“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为官者以自己的才学服务社会，获取报酬，享受一定的工作待遇是正常的事情。朝廷如果不顾实际禁止官舍维修，使得官员的办公室破破烂烂，还不如自己家；其他待遇还不如未做官时好，不仅官员会流失，而且在职的也不会专心工作，对国家是有害的。王安上将文章刻石，立在县衙前，本意也是警示官吏提高素养，多为民服务。

至于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
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
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
造之功。欹仄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
一椽。此何义也？^{[8]1192}

苏轼对滕县修建县衙如此专文论述，有严峻的社会现实背景，而且明显对上级的瞎指挥不满。

洪迈记载：“恭览国史，开宝二年二月诏曰：一日必葺，昔贤之能事。如闻诸道藩镇、郡邑公宇及仓库，凡有隳坏，弗即缮修，因循岁时，以至颓毁，及傭工充役，则倍增劳费。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廨舍，有无隳坏及所增修，著以为籍，迭相符授。幕职州县官受代，则对书于考课之历，损坏不全者，殿一选，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太祖创业方十年，而圣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于此。后之当官者不复留意。以兴仆植僵为务，则暗于事体、不好称人之善者，往往翻指为妄作名色，盗隐官钱，至于使之束手讳避，忽视倾陋，逮于不可奈何而后已。（下转第 63 页）

苏轼鄂州西山诗的价值与影响(下)

曹万里

内容提要 本书主要对苏轼鄂州西山诗文进行研究解读,探讨鄂州西山对苏轼的影响及苏轼鄂州西山诗文独特的价值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 苏轼 鄂州西山 鄂州西山诗文 价值 影响

二、苏轼鄂州西山诗文的价值和影响

苏轼在北宋中期文坛的领袖地位,使他的鄂州西山诗文,对当时乃至后代,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 苏轼形象成为后人楷模

作者借助鄂州西山独特的景物和名胜景观,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塑造了一位正直率真、忠诚爱国、豁达乐观、幽默风趣、磊落坦荡、胸怀天下的封建文人形象,成为后人竞相学习和崇拜的偶像。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均有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传统,如屈原《楚辞》《离骚》均以花朵、美玉、宝剑、美女、芝草等众多意象,象征美好的人生和政治理想,苏轼出色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艺术手法,在他写菩萨泉的作品中,酴醿花、菩萨泉是纯洁友情的象征,也是其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

苏轼《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萨泉见饷,二首》,其一:

酴醿不争春,寂寞开最晚。
青蛟走玉骨,羽盖蒙珠嚮。
不妆艳已绝,无风香自远。
凄凉吴宫阙,红粉埋故苑。
至今微月夜,笙箫来翠巘。
余妍入此花,千载尚清婉。
怪君呼不归,定为花所挽。
昨宵雷雨恶,花尽君应返。

其二:

君言西山顶,自古流白泉。

上为千牛乳,下有万石铅。
不愧惠山味,但无陆子贤。
愿君扬其名,庶托文字传。
寒泉比吉士,清浊在其源。
不食我心恻,于泉非所患。
嗟我本何有,虚名空自缠。
不见子柳子,余愚污溪山。

这是因友情而成的作品,可以说是千年前酴醿花、菩萨泉的活广告。苏轼初到黄州,人生地不熟,却与老朋友杜道源父子偶然相遇,他们带来了象征西山风景的酴醿花、菩萨泉水,并邀请诗人到鄂州西山游览,其真挚的感情不言自明。

第一首开篇就说酴醿花高洁自好、不与群芳争奇斗艳,在春天开放最晚。她像蛟龙一样,以玉为骨骼,分外隽爽、高洁,枝头的花瓣就像镶有玉珠的车盖。她不用装扮就艳丽绝伦,即使没有风芬芳也飘得很远。可叹昔日的吴王行宫如今多么荒芜凄凉,那些娇艳美丽的嫔娥早已埋葬在旧日的花园里。时至今日,每当月色朦胧的夜晚,似乎可以听见她们在苍翠的山峰间吹奏着笙箫,凄婉动人。那些美女残留的艳妆都打扮了酴醿花,纵然千年还是清丽秀婉。难怪先生呼不归家,原来是被这美丽清婉的花朵深情挽留。我突然想到昨夜雷雨暴烈,想必花已落尽,先生也应该返回江南了。

这首诗描写酴醿花精准细微,惟妙惟肖,比喻精到贴切,想象丰富多彩,反复出现的意象摇曳多姿,艺术感染力极强。由眼前繁华的风景映衬昔日吴王行宫的荒凉,历史兴亡之情油然而生,耐人寻味,启迪人们不断思索和反省。酴醿花是诗人纯洁、真挚情谊的象征,也是他追求的高洁人格精神的真实写照,是物化的社会精神的载体。

第二首诗写菩萨泉,其实诗人并没有亲身观赏西山风景、品赏菩萨泉,但通过杜道源的热情推介,诗人仿佛已品赏了菩萨泉的清冽甘

甜，内心早已心驰神往。开篇即说，杜先生介绍，鄂州西山山顶上有一股洁白清澈的流泉，就像千头牛挤出的乳汁，流到山脚仍色白如故，不愧有惠山第二泉的味道。虽然我没有茶圣陆羽的贤惠聪明，但愿意通过诗文艺术，将先生的盛情和诚恳扬名于世，并传之后代。寒彻透骨的清泉好比是美男子，是清澈甘冽还是浑浊不堪根本在于源头，这使我想起了“井渫不食，为我心恻”的哲理。可是，我内心嗟叹自己原本一无所有，徒有虚名自我爱惜罢了。如今，不能遇见柳宗元先生，我的愚俗其实玷污了西山的圣洁高贵啊！全诗以菩萨泉比喻正人君子，象征自己高洁、纯真的美好人格，反映了诗人在逆境中依然坚韧不拔地追求人生理想和远大政治抱负的决心，表达了他豁达乐观、淡泊心志、洁身自好、昂扬向上、造福民众的精神风貌。

学生兼侄女婿王子立从筠州随同苏辙到黄州看望苏轼，居住了数日之后，因要到徐州赶考便辞行。临行前，苏轼酌满了一罐武昌菩萨泉水作为送行的礼物，寄托了对晚辈的殷切期望。其诗曰：“送行无酒亦无钱，劝尔一杯菩萨泉。何处低头不见我，四方同此水中天。”诗人贫困拮据、无权无势，给你送行既无酒宴也无钱财礼物相赠，只有一杯清澈纯洁的菩萨泉劝你饮下。诗人别开蹊径，表面说自己无钱无物可送，实际上暗示学生：做人要像菩萨泉那样清明纯正、品性高洁、独具情操。只有你理解了我的苦心，你今后不管身在何方，只要望一眼这清澈无瑕的菩萨泉，你就会如同得到佛祖教诲、启迪一般，生出非凡的智慧，从而立下远大的志向。全诗风趣幽默，语句简练、生动、含蓄，整篇以菩萨泉作喻，托物言志，富有哲理，余味无穷。

（二）引发了历代文人的踊跃唱和

由于苏轼的西山诗文具有突出的艺术成就和强大的感染力，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下，当时有三十多位朝廷官员踊跃唱和，后来还有文人将西山风景及历史风物等绘成了画卷，苏轼亲自为其题诗颂赞。至南宋，官员、文人所作和诗达五十多首，明清、现代依照其韵唱和的诗歌作品也不在少数。

黄庭坚在其和诗里对苏轼在逆境中仍然豁达乐观、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予以颂赞，对恩师在遭受政治打击时蒙受的苦难、屈辱表

示深深的同情、理解。诗中借景抒情，融情于景，作者把对历史兴亡的感慨与个人情感、人生命运相联系，写出了患难与共、相知相识的师生情，强烈坚韧的爱国情。

楼钥的《次韵东坡武昌西山诗》，全诗充满了对苏轼的同情、理解、声援、赞颂，对政治迫害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深刻讽刺，语言清丽、流畅、活泼，意境优美，形象摇曳多姿。其诗曰：

党论一兴谁可回，贤路荆棘争先裁。
窜流多能擅笔墨，囚拘或可为盐梅。
雪堂先生万人敌，议论磊落心崔嵬。
向来罗织脱一死，至今诗话存乌台。
凭高望远想宏放，眼界四海空无埃。
黄冈踏遍兴未尽，绝江浪破琉璃堆。
漫郎神交信如在，石为窟樽胜金罍。
邓侯先曾访遗迹，铭文深刻山之隈。
山荒地僻分埋没，二公前后搜莓苔。
元祐一洗人间怨，天地清宁公道开。
玉堂同念旧游胜，笔端万物挫欲摧。
时哉难得复易失，弟兄远过崖与雷。
北归天涯望阳羨，买田不及归去来。
我为长歌吊此老，恸哭未抵长歌哀。

这首和诗表达了诗人对苏轼的爱慕、敬佩之情，对其人生境遇充满了深切的同情、惋惜和不平之意。诗中毫不留情地对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进行评判，针砭时弊，切中要害，将苏轼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叙写刻画，一位忠直敢言、率性天真、襟怀坦荡、品性高洁的文人官员形象跃然纸上。

苏辙在兄长初到黄州时，曾一起游览了西山风景，有感而发作《黄州陪子瞻游武昌西山》。作者借历史人物表达自己仍然希望得到朝廷的重用、为国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其诗作《次韵子瞻与邓圣求承旨同直翰苑怀武昌旧游》以生动的笔墨，深情回忆了游览西山的具体过程及感人的细节，特别是兄弟相互搀扶登山、诗酒风流的情景，其高尚、纯洁的情操及精神面貌跃然纸上。

诗人张耒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与恩师患难与共、感情相通，用生命去追寻恩师的足迹，他在贬谪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写武昌西山的作品就有十几首，如《游武昌》《吴王郊台》《题寒溪长老方丈》《西山寒溪》《新堂望樊山》《雨霁望樊山》《宿樊溪》

《樊山》等。《次韵苏公武昌西山》借助摹写西山的凄凉落寞，写出了苏轼那种孑然独立、傲岸高洁、不为权贵折腰的千古名士形象。《游武昌》描绘了几幅壮阔雄浑而又静谧优美的西山宴饮图，表达了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愤懑不平、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恩师的深切怀念之情。《西山寒溪》形象地反映了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并不因人生挫折和政治打击而消沉，相反仍然沿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奋勇前行，他也像恩师一样胸襟旷达、洁身自好、风流倜傥，无论人生遭遇多少风风雨雨，经历多少坎坷不平，他始终保持着封建士大夫的高尚情操和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因而其人格精神和灿烂的诗篇流传千古。

孔武仲在其《次韵苏翰林西山诗》中用精妙的诗句描写了苏东坡在贬谪黄州初期的困顿生活和萎靡、愁苦的精神状态，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愤慨。这不仅是对苏公、邓公两位政界、文坛大佬的人生总结，还深刻揭示了“大贤坎坷终必用”的道理。其诗作《寄武昌孙彦常》以回忆西山漫游为叙写内容，热情颂赞了西山的秀美风景和丰富的人文景观，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和追求理想人生的高洁人格。此诗首尾呼应，写景状物独具特色，摇曳生姿，活泼有趣，充满丰富的联想和浓郁的浪漫色彩，给读者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美的冲击。结尾形象而富有意蕴，令人遐想。《武昌县西山寺》以作者游览武昌西山寺的具体情景和深邃细腻的心理感受作为描写对象，反映了诗人追思怀远、仰慕先贤、期望建功立业的伟大志愿和美好情操。

晁补之在其诗歌《次韵苏公翰林赠同职邓温伯怀旧作》中，将苏东坡贬谪黄州时期和现在的生活作对比，表达了作者对苏轼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不平，透出委婉的讽刺。诗人感慨，百年之间的人世变化谁能够料得到，那赫赫耀眼的宝剑之光，竟然是丰城潮湿阴暗的青苔覆盖下的上古青铜剑发出来的，这里是暗喻苏轼杰出的才华、高尚纯洁的品格不为当政者赏识、理解。

诗人深情地说，当地的名人雅士为苏东坡先生建造的蜀公亭，是当年先生离开黄州时与众多朋友和百姓依依惜别的地方，那些似锦的繁花、翠绿的柳条并没有随着春风的离去而枯

萎，仍然分外繁茂。东坡雪堂已陈旧、布满灰尘，仍然有人经常去拜谒寻访。诗人借助旁人的眼光，颂赞了东坡先生高尚的人格和巨大的影响力，表达了对恩师的深切怀念和自己执着追逐其精神风范的强烈愿望。

苏轼好友刘攽的西山和诗，通过描述苏轼漫游武昌的情景，展现了苏轼当时的艰辛困顿，作者严肃地说，只有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有志者，才能成为后代永远怀念的风流人物。

邓温伯即邓圣求，是唱和苏轼武昌西山诗的发起人，却因多方原因，其和诗仅存残句：

武昌山水诚佳哉，当年五柳亲栽培。
家家开门枕江水，春风照耀桃与梅。

作者对鄂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秀美如画的风景了然于心，对鄂州山水的热爱眷恋之情溢于言表。此诗语言质朴自然，感情真挚深厚，写景抒情融合，风景人文交汇，画面宏阔、雄浑，富有诗情画意。

北宋诗人袁百之次韵东坡西山诗残句：
长江雪浪过樊口，西山翠插天崔嵬。

诗人说，东坡先生乘船横渡长江，那一串串如雪花般的浪花扑打而来，舟工却临危不乱、稳操舵向，那一叶小舟在激流中轻快迅疾地到达了江南樊口，只见鄂州西山苍翠的山峰直插云霄，异常高峻雄伟。其作品状物写景精细入微，形象逼真，气势磅礴，意境宏远，全句未曾写人，但东坡先生磊落博大的胸襟、孤傲不群、超然物外的性情跃然纸上，是为妙词佳句。

南宋诗人陈杰对苏轼感情深厚，充满敬佩。他的和诗深刻表现了苏轼诗对其创作的巨大影响和艺术启发。其作品语言简洁、清丽、流畅，读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针砭时弊，评判历史、臧否人物十分中肯、准确；结论发人深省，意味深长，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深刻的历史价值。

诗人、学者朱槔《用东坡武昌寒溪韵三首同杨良翰》是诗人激情澎湃，一气呵成的作品，表达了对苏轼、邓圣求等前辈诗人的深切怀念和追逐仰慕之情，也寄托了作者洁身自好、淡泊明志、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崇高理想和独特孤傲的人格精神。

第一首诗描述了苏东坡与邓圣求昔日漫游鄂州西山时的具体情景及归来后的深沉感

慨。形象反映了他们风流潇洒的气度、旷达闲适的心境、纯洁高尚的情操。

第二首诗单刀直入，直接写东坡先生的人生际遇与高尚纯洁、傲岸不群的精神风范。诗句饱含了作者对前辈诗人深厚的爱慕、敬仰、怀念之情，表达了对其坎坷多难人生的感叹和愤懑。

第三首诗由上述二首诗作生发而来，作者联想到自己与东坡相似的人生际遇：虽然半世坎坷，却寄情山水痴心不改，矢志不渝地追随古代名士狂放不羁、洒脱豁达、洁身自好、淡泊名利的高尚风范，在朝政腐败、危机四伏的大环境下依然坚定保持人生理想和民族气节。诗人用形象的语言、精辟的议论，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激发起无数读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苏轼侄孙苏籀多次虔诚地寻访武昌西山，七言古风《游寒溪次醅字韵题九曲亭》是诗人依据其伯祖父的武昌西山诗原韵而写成的一首优秀作品，其艺术风采和浪漫情怀完全肖像于乃祖，表达了对先祖高洁、正直、坦诚、豁达的品格的追随。这首七言古风，就是对苏轼、苏辙遗风的一次深刻体验，也是大诗人苏轼武昌西山诗对后世文人产生重大影响和巨大教育作用的一大明证。

（三）促进了鄂州文明进取风气

苏轼在游览鄂州西山风景名胜、品鉴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其纵情山水、诗酒风流、旷达闲适的文人风范，不畏强权、正直坦诚、洁身自好、豁达乐观的精神品格，积极影响着地方的文明进取风气，为当地民众和后人树立了榜样，形成了深厚的精神文脉。

在后代的众多文人、艺术家中，因为仰慕苏东坡的文采和品格而不辞辛苦，千里迢迢畅游西山的代不乏人，并且留下了许多佳作，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据《武昌县志》记载，自三国两晋至清代以前，诗人写武昌西山的诗词作品就有四百多首。如曾经见证了苏轼黄州岁月的北宋诗人张舜民，其诗作《再过黄州苏子瞻东坡雪堂因书即事题于武昌王叟斋扉》记述了诗人寻访东坡雪堂的落寞情景，真实反映了江南父老对苏轼先生深切的怀念之情，表现了诗人与苏轼纯洁、真挚的情谊，形象说明了东坡文化对后世的巨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元代文学家、书画家王冕在其《送王瑞卿归武昌》一诗中深情吟唱“武昌樊口最幽绝，东坡曾为留五年”，表达了诗人对苏轼高尚人格的由衷赞美和对其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

明代诗人、竟陵派作家谭元春在其《入西山》一诗中，通过对西山风景的细致描述和历史人物的回顾，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题赠慧光僧》一诗中表达了作者心向佛学、对世事人生的深刻感悟和思考。

《题武昌寒溪寺》是一首篇幅较长的七言古风，诗中由景及物，由诗及人，高度评价了古代诗人美好人格，颂赞其忧国爱民、清正廉洁、积极作为的优良品质，同时也抒发了作者的深沉感慨。

鄂州本土诗人孟登先后创作出《洗剑池》《试剑石》《松风阁》《咏寒溪寺绿萼梅小引》《游菩萨泉》等多首描写西山风景的作品，借古抒怀，表达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深沉的历史观。在《松风阁》一诗中，诗人由古松联想到古代的英雄豪杰、名流异士，将松树坚劲挺拔、奋进向上的秉性外化为人物精神的象征，颂赞了先贤高尚、纯洁的品格。全诗言简意赅，对松风阁独特的风景和蕴含的丰富人文精神描画细致、完整、形象，题旨深刻，意味深远。

《咏寒溪寺绿萼梅小引》一诗对西山寺梅花描写细腻生动，精彩传神，从其独特的外部形态到其不畏风寒冰霜的坚强品格都作了传神描写，也写出了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美好品格，寄托了诗人洁身自好、坚贞不渝、自我牺牲的人生理想和高贵品质。

清代诗人范轼《武昌寒溪访陶桓公手植桂用少陵古柏行韵》通过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方式，摹写古老的桂花树高大神奇的外表和独特的品性，塑造了昔日名士崇高、伟岸的形象。诗中重点描述了陶侃将军镇守武昌时的英雄气概和亲民爱民、精忠报国的博大胸襟，最后部分诗人有感而发的议论，深刻揭示出人生的哲理和社会发展规律，极大鞭

挞了封建皇权的黑暗丑恶，揭示其可悲的结局。

承其武昌西山诗的余绪，清代诗人、状元鄂东人陈沆，有缘畅游西山，写下了《武昌西山赋》《灵泉寺》《寒溪寺》《焦琴斋观察命两公子陪游西山，长歌志谢》《松风阁小饮》等名篇佳作，表达了诗人对西山风景的无比热爱和追逐前贤的高尚风范。其《灵泉寺》是诗人由景物而生发议论，抒发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感慨和领悟，显示出诗人的哲理思考和智慧启迪，热情讴歌了古代名士的高洁品性、纯净思想和对理想的坚贞不渝，也表明了诗人对理想人生境界的执著追求和无限向往。

陈沆在饱览武昌西山风景名胜之后激情而作《焦琴斋观察命两公子陪游西山，长歌志谢》，作为对朋友的酬答。作品表面记游写景，其实借景抒情、追思怀古，寄托了诗人宏阔高洁的人生理想。诗作结尾以对比和设问的艺术形式，抒发了作者希望畅游祖国名山大川的愿望，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诗人、书法家郑孝胥学有经年，饱读诗书，对传统儒学造诣颇深，善诗文、工书法，在晚清政坛、文坛都有一定的地位，为历史进步做出过贡献。他为官多年，阅历颇深，但性格软弱温顺，因而在时代的风云中逐渐沉落，最后竟然沦落为国人唾弃的大汉奸，具有悲剧色彩。其长诗《游武昌西山九曲亭至陶桓公祠》真实记述了诗人畅游西山的具体情景和真切细腻的心理感受，表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人生理想主义光芒，让我们惊叹和震撼，亦让我们感受到人生的沉重和岁月的荒谬无情。“危亭据九曲，江树遥可认。东坡千人耳，名与此山峻。”此诗以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达了他对苏轼、苏辙的深切怀念和景仰之情，说明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崇高的人文精神是中华坚韧而永恒的民族灵魂。

晚清政治改革家、文学家张之洞慕名探访武昌西山，在其《西山》《九曲亭》等作品中形象描写了鄂州西山的名胜风景和厚重的人文景观，既对古代名流、风云人物进行了历史评判，又借景抒情，怀古喻今，颂赞了东坡先生的儒雅风流和高洁人格，展现了东坡文化、东坡精神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四）促进了鄂州旅游文化的发展

由于苏轼鄂州西山诗文作品的巨大影响和特殊意义，后人纷纷聚焦鄂州西山等名胜古迹，创作出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留下许多历史佳话。

此后，文人墨客探访东坡赤壁、东坡雪堂、鄂州西山等成为一种时尚，千年以来络绎不绝。登西山，访九曲亭，游寒溪寺，品菩萨泉，探访吴王避暑行宫，寻觅摩崖石刻，历代名流雅士乘兴而来，凭栏远眺，临风怀古，挥毫泼墨，酣畅淋漓，他们歌咏祖国雄奇壮美的山水，抒发自己的博大胸襟和爱国主义激情。人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传承千年不息的人文精神，追寻人生的真谛。文脉源远流长，奔流不息。黄庭坚在东坡先生离开黄州二十年后，他与朋友同游鄂州樊山，在一座亭阁里过夜，因而写下闻名遐迩的诗篇《武昌松风阁》。张耒等人多次前往黄州寻找东坡遗迹，照看其遗产，修葺雪堂，探访临皋亭，甚至在黄州居住了数月之久。南宋爱国主义诗人、抗金英雄辛弃疾、陆游、范成大、文天祥溯江而上追寻东坡遗迹，写下了千古绝唱。当代诗人、作家徐迟先生游览鄂州西山后激情喷涌，挥笔写下散文佳作《鄂州西山记》。鄂州西山以其秀美如画、旖旎多姿的原生态风景和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触发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创作激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在当前的旅游经济发展和社会精神重构中将起到巨大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总之，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苏轼在贬谪黄州期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鄂州西山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情缘，主导了一

场场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文化旅游活动，并成多元式发展影响着后世，为当时文坛和后人点燃了智慧的火炬，为我们带来爽心悦目的艺术享受和深刻人生启迪，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树立了崭新的精神丰碑。

注释

[1]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曹万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法治》杂志黄冈鄂州记者站副站长，《城乡故事》杂志执行主编、《巴河文苑》杂志常务副主编。

(上接第59页)殊不思贪墨之吏，欲为奸者，无施不可，何必假于营造一节乎？”^[3]

这段话其实说得十分明白，不过苏轼毕竟在位，文中还不敢如此直白地指责朝廷。

仔细品味该《滕县公堂记》，结构严谨，引典自然，论述平实，含蓄委婉，充满正能量，并无什么错误，不过是客客气气地给上级提意见。他借用孟子的“厉民以自养”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建之功”等话，在新党官员看来，开始也没觉得批评刺耳。可是诗案发生后，实在找不到苏轼政治、经济、作风上的问题，这篇文章就被当作讽刺朝廷了。神宗皇帝都在位十年了，连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都龟缩洛阳，编写史书，再也不吱声，苏轼这个唯一的“杂音”就十分惹当权者忌恨。在乌台诗案中，该《滕县公堂记》被新党的御史们拿到，作为重要的罪证，比那些诗词更有佐证力。

《滕县公堂记》碑修复后，李存建得到完整的样稿，十分高兴，同意送到市上，申请将立在县衙的新碑重建。毕竟碑上有几个错别字，机器刻的隶书也很掉档次，有负苏轼当年对滕县的深情厚谊。

注释

[1] 范纯粹(1046~1117)，字德孺，范仲淹第四子，以荫入仕，性格沉毅干练，和苏轼关系不错，有诗文往来。

[2] 王安上，字纯甫，江西临川人。王安石同母三弟，在政坛、文坛有一定的影响。苏轼知徐州时，王安石已被排挤，退养金陵。

[3] 见洪迈《容斋五笔》卷12《当官营缮》。

[4] 束湿意为苛酷急切。

[5] 滕县古代为徐州属县，新中国成立后，徐州该属江苏，滕县属山东。今为滕州市(县级市)。

[6] 苏轼后来到元祐年间，才完成《范文正公文集叙》。因避其祖父名讳，苏轼在文中用不“序”字。

[7] 天圣二年为1023年，所以苏轼说距离滕县公堂落成，已经有52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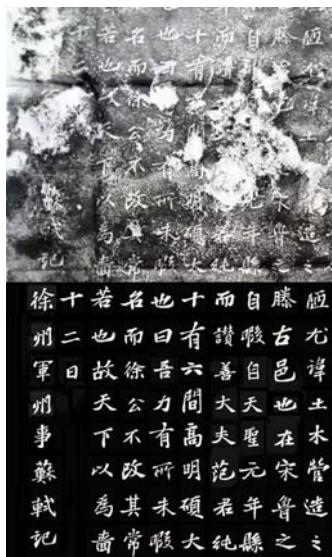
[8]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9] 今邹城一带，位于滕州市北侧。

[10] 滕国故城是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东省滕州市西郊滕城村，有文公楼、唐古槐、善国碑林等景观遗存，当年孟子居住过的上宫馆就在故城里。

[11] 泰在此意为骄奢。

王龙海，眉山市甘眉工业园区工会主席；李存建，山东省滕州市墨子故里博物馆馆长。



修复前后对比照片

苏轼廉政诗文点评二则

饶学刚

方山子传^[1]

方山子，光、黄^[2]间隐人^[3]也。少时慕朱家、郭解^[4]为人，闾里^[5]之侠皆宗之^[6]。稍壮，折节^[7]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8]。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10]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11]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12]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13]，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耸然^[14]异之。

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15]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16]，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17]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18]，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19]。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20]。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21]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22]，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23]之与？

题解

因“乌台诗案”，神宗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东坡被贬黄州，时年45岁。他人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思想、生活处于极端苦闷和艰难中。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走躬耕田野、放浪山水、厚自养炼的道路。《方山子传》就是在这种生活背景下诞生的。

方山子，即陈慥(zào 灶)，奶名陈四，字季常，号龙邱居士、静庵居士。苏东坡年青时

的好友。《方山子传》主要是给清廉的陈季常画像。

陈季常是一位历尽坎坷而有个性的人物。

“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间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著帽，方屋而高”。寥寥几笔，就将陈季常生活历程和人生变异，生动地勾勒出来了：侠士——儒士——隐士——道士。

正如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东坡在往凤翔签判途中，别子由于郑州，对人生所作卜卦性的预料：“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东坡《和子由渑池怀旧》）往事迷茫如烟，人生偶然无定，他最后走上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归隐田园道路。

注释

[1] 方山子：即陈季常，名慥，奶名陈四，号龙邱居士、静庵居士。四川青神（今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人。其父陈希亮（字公弼）任陕西凤翔府太守，苏东坡任凤翔府通判时，相识三年。季常怀才不遇，隐居光（河南潢川）、黄（湖北黄州）间的岐亭。嗜好饮酒、击剑、打猎，出没于山林间。岐亭人见他所戴的帽子，形似方屋高耸，便称之为“方山子”。

[2] 光、黄：二州名。光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潢川县，黄州治所在今湖北黄冈市黄州区。

[3] 隐人：隐居山林之人。

[4] 朱家：汉初鲁（今山东曲阜县）人。郭解：字翁伯，汉初河内轵（今河南济源县）人。二人都是两汉时著名游侠。详见《史记·游侠列传》。

[5] 闾里：乡间。

[6] 宗之：尊奉、模仿他。

[7] 折节：改变以往的志向、行为。

[8] 岐亭：宋代镇名，在今湖北省麻城市西南。

[9] 岌：其。

[10] 方山冠：古代的一种帽子。汉代祭祀宗庙时乐工舞女戴它，唐宋时多为隐士戴它。《后汉书·舆服志》载：“进贤冠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方山冠似进贤，以五彩縠为之。祠宗庙大予，

八佾、四时、五行，乐人服之。”

[11] 适见：苏东坡《岐亭》诗叙：“元丰三年正月，余始谪黄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慥季常也。为留五日，赋诗一篇而去。”

[12] 犜(ju é)决然：惊讶相视的样子。

[13] 环堵萧然：室内四周空空荡荡，凄清冷落。堵，墙。语见陶潜《五柳先生传》：“环堵萧然，不蔽风日。”

[14] 耷然：吃惊的样子。

[15] 使酒：喝醉酒后放任恣纵。

[16] 余在岐下：指苏东坡在凤翔时。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苏东坡任凤翔府签判时，陈季常的父亲陈希亮知凤翔府。这时苏东坡已同陈季常交往。

[17] 怒马：被鞭策而奔驰的马。

[18] 勋阀：功臣的门第。阀，古代仕宦人家大门外常立左右两柱，左柱称“阀”，右柱叫“阅”，用以榜贴功状，以示家族荣耀。

[19] 显闻：很闻名。苏东坡《陈公弼传》云：陈希亮字公弼，官至太常少卿，理当封妻荫子，但他“辄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说明陈慥没承袭做官，而是遁居山林。

[20] 等：相等，相同。

[21] 此岂：这难道。

[22] 阳狂垢污：假装疯癫，浑身污秽不堪。阳狂，即佯狂。

[23] 倏(tāng)见：偶然相见，意外而来。

点评

《方山子传》约作于元丰四年间。

苏东坡的好友很多，为什么特为方山子立传？

《方山子传》与别的传记不同，它不重点写人物生平业绩，而是以生命为红线，以游侠、狩猎、隐居三事为载体，演奏陈季常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而又看破红尘、不同流合污的人生悲歌。

陈季常是一位“道法自然”而又安于清贫的人物。苏东坡对与陈在岐亭相会并不感到突然：“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陈季常不答，其实是有答案的。苏东坡初仕凤翔时，遇见了严厉太守陈公弼。僚吏不敢正视太守，苏东坡屡与他争议，常常面红耳赤，关系紧张。而苏东坡照样陪他饮酒赋诗，照样陪他儿子陈季常习书狩猎，从而初露了在苏东坡身上潜在的与人友好的廉善家风。

陈季常怀才不遇，远离罪恶，隐居光、黄间的岐亭，嗜好饮酒、击剑、狩猎，出没于山

林间，仍然过着“庵居蔬食”、甘于清贫的仙居生活：“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至今传为佳话。

孔子曾经主张圣人应是这样：“饭蔬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陈季常对此实践得特别好。“传”的补叙一段，富有哲理性，道出了陈季常的清贫廉洁人格之源。陈季常论家世有“勋阀”，皆有条件接官；论财富有河北田亩，家财万贯(少时“用财如粪土”)，有洛阳园宅，级与公侯等同，而他不慕荣利富贵，鄙夷仕途，毅然辞弃，独自隐居岐亭山中。这种愤世嫉俗、不为五斗米折腰，人浊世浊我独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精神深深地打动了苏东坡先生，所以他才写出了如此激奋人心的传记文章，成为廉政名篇。

李宪仲哀词^[1]并叙

同年友李君讳惇，字宪仲。贤而有文，不幸早世。轼不及与之游也，而识其子膺有年矣。膺自阳翟见余于南京^[2]，泣曰：“吾祖母边、母马、前母张与君之丧，皆未葬。贫不敢以饥寒为戚，顾四丧未举，死不瞑目矣。”适会故人梁先吉老^[3]闻余当归阳羡^[4]，以绢十四、丝百两为赆^[5]。辞之不可，乃以遗膺，曰：“此亦仁人之馈也。”既又作诗，以告知君与膺者，庶几皆有以助之。膺年二十五，其文晔然^[6]，气节不凡，此岂终穷者哉？

大梦^[7]行当觉，百年特未满。

遑哀^[8]已逝人，长眠^[9]寄孤馆。

念我同年生，意长日月短。

盐车困骐骥^[10]，烈火废圭瓒。^[11]

后生有奇骨^[12]，出语已精悍^[13]。

萧然野鹤姿，^[14]谁复识中散。^[15]

有生寓大块，^[16]死者谁不窆。^[17]

嗟君独久客，^[18]不识黄土煊。^[19]

推衣^[20]助孝子，一溉滋汤旱。^[21]

谁能脱左骖^[22]，大事不可缓^[23]。

题解

《李宪仲哀词并叙》作于元丰八年(1085)三月，在南都(今河南商丘)，苏东坡时年50岁。

元丰七年，苏东坡自黄州改谪汝州。元丰

诗文鉴赏

八年正月，苏东坡发泗州，再乞常州居住。二月，至南都，得请归常州阳羨时，流离颠沛之余，俸禄几绝已数年。受梁吉老十绢百丝之赆，可见非有余者。三月，闻神宗遗诏，苏东坡举哀成服，作《神宗皇帝挽词三首》。苏东坡生活处于极不稳定之中。随之，李宪仲之子李方叔自阳翟，以饥寒、“四丧未举”事来见苏东坡，苏东坡则尽以故人梁先所馈绢十四、丝百两，作为包括李宪仲在内的四丧之举葬礼资助转赠之，并作方叔父李宪仲哀词，告知李方叔及其父友人“皆有以助之”，表示关怀：“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汤旱。谁能脱左骖，大事不可缓。”

李宪仲，初名彊，讳惇，字宪仲。与苏东坡同年生。仁宗嘉祐（1057），与苏东坡同年举进士。华州（陕西华县）人。贤而有文，家贫，不幸早逝于英宗治平元年（1064）。其子李廌，字方叔，自号太华逸民，生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中年以后，定居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富有才华，气节不凡。与苏东坡可谓故交。他曾以文章“谒苏轼于黄州，贽文求知。轼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宋史·李廌传》）

苏东坡为李宪仲所写哀词，非同一般，不仅是转赠绢十四、丝百两助李家之葬，以表达“仁人之馈”的社会孝廉伦理，更重要的是张扬李方叔“四丧未举，死不瞑目”的忠孝家风。

诚然，孝是中国道德教育、社会教化产生的根源、基点和核心内容。孔子曾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曾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他们指出了道德教育必须以“仁爱”为核心，以“孝悌”为基础。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孝敬长辈，那就无从谈做人做官的资格。我国从汉武帝时起就开始举孝廉。其历史作用是：其一，为统治者提供庞大的官僚队伍来源；其二，孝廉人物中以儒生最多，使得官吏队伍逐步儒学化；其三，在孝廉制度刺激下，读书人竞相讲求孝行、廉洁，有助于全社会养成一种注重名节、操守的风气。

苏东坡把儒家经典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思想，由孝推及忠、廉的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相结合的思想，在这篇铭文中做了极为巧妙的统一和融会，从而让廉政文

化的诸多元素，进入了千家万户，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注释

[1] 哀词：文体名。古时用以哀悼夭而不寿者，后世亦用于寿终者。多用韵语写成。

[2] 阳翟：古地名。即今河南省禹州市。传说为禹之都。[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县下班固自注：“夏禹国”。应劭曰：“夏禹都也”。[东汉]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禹受封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县是也。”

[3] 梁先：字吉老。曾经与苏东坡供职彭城（今江苏徐州市），通经学，书学于欧阳洵，颇精绝。

[4] 阳羨：县名。古称荆溪、荆邑，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阳羨县，属会稽郡。西汉高祖五年（前202），阳羨县令尹灵常从征，历时七年，建立功勋。十二年（前195），被封为阳羨侯，改称阳羨侯国。隋代废义兴郡，改阳羨县称义兴县，属常州。

[5] 赆：临别时赠与、赠送或馈赠的财物。

[6] 眥然：光彩鲜明貌。《宋史·文天祥传》载：“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

[7] 大梦：古人用以喻人生。《庄子·齐物论》载：“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唐]李白《与元丹邱方城寺谈玄作》诗：“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丁福保《佛学大词典》载：“长寢大梦，莫知怖出。”比喻生死之境界。

[8] 遑哀：“遑”通“惶”，恐惧不安。意为恐惧哀叹。

[9] 长眠：死的婉辞，指人去世。[宋]李昉《太平广记》载：“（郑郊）过一家，上有竹二竿，青翠可爱，因驻马吟曰：‘冢上两竿竹，风吹常袅袅。’久不能续，闻冢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长眠不知晓？’”

[10] 盐车困骐骥：喻指贤才屈处于困境，不能尽其才。[西汉]刘向《战国策·楚策四》载：“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跗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纻衣以幂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一匹千里马老了，服役于盐车而上太行山。它伸着蹄子，弯着膝盖，尾巴流水，脚背溃烂，口涎水洒地，白汗交流，拉到半山坡上就徘徊不前，驾着车辕不能继续上山。正巧伯乐遇上了，他下了车，攀扶着这匹马哭了起来，并脱下自己的麻布衣服盖在它身上。于是，千里马低着头喷着鼻子，仰起头长鸣了一阵，宏亮的声音直达天际，好像是从钟磬之类乐器发出的声音一样。为何这样？缘于千里马遇见了知心人伯乐。）

[11] 烈火废圭瓒：给人以鉴戒，不可失信于民。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首先载于[西汉]司

马迁《史记·周本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即“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幽王是周朝的最后一个天子。一把玩笑火就废掉了一个圭瓒般的周朝。圭瓒：古代的一种玉制酒器，形状如勺，以圭为柄，用于祭祀。《书·文侯之命》载：“平王赐晋文侯秬鬯、圭瓒。”《礼记·王制》载：“（诸侯）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后以圭瓒代指极为珍贵的物品。

[12] 后生有奇骨：后生，指李方叔。奇骨，气节。

[13] 精悍：精干强悍。

[14] 野鹤姿：道人风姿。

[15] 谁复识中散：谁都不会认识之后而疏散。

[16] 大块：原指大自然锦绣般美好的景色。出自[唐]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清]黄景仁《砚铭》载：“眉山苍苍，大块文章，兽纽头，篆鸟迹，中空无物，何止容卿辈数十。”假我：佛教语：所谓“我”者，实际上并无“我”之存在，仅由五蕴和合所成之身，假名为我而已，故称假我，又作俗我。为“实我”之对称。后人将“大块”与“假我”合用以称赞别人内容丰富的事物。

[17] 窥（kuān款）：空虚，空乏。

[18] 久客：久居外乡的人。[南宋]陆游《宴西楼》载：“万里因循成久客，一年容易又秋风。”《汉书·杨王孙传》载：“报祁侯书曰：‘裹以布帛，鬲以棺槨，肢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

[19] 不识黄土煊：不了解人入土为安。

[20] 推衣：即推食解衣。极言恩惠之深。亦省作“推食”、“推解”、“推衣”。《史记·淮阴侯列传》载：“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

[21] 一溉滋汤旱：言灌溉解除了旱情。喻培养了好孝子。

[22] 脱：指把货物等售出。这里指卖掉左骖而求赙。

[23] 左骖：古代驾车三马中左边的马。《礼仪·觐礼》载：“使者降，以左骖出。”郑玄注：“左骖设在西者，其余三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从者于外。”《礼记·檀弓篇》载：“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脱骖而赙（赠送财物助人治丧）。”

[24] 缓：怠慢。

点评

《尚书·康诰》中早有周公重视“孝”“友”的记载，他认为人之罪恶莫大于“不孝不友”。《李宪仲哀词并叙》，唱的是中国千年传统的

友道之赞歌、孝廉之赞歌，亦即“仁者爱人”之赞歌。

古代先贤们有着精辟的友道言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唐白居易《琵琶行》）“一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宋]晏殊《金枢园》）儒家重视友道，这跟儒家的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准则有关，其内容主要是“仁者爱人”。苏东坡在哀词中，把这种友爱经典做了非常形象的诠释。他与李宪仲虽是同年友，但“意长日月短”；后结识了其儿子李方叔，又把这种友爱延传下来。赞叹李宪仲是大梦当觉、未尽其才的早逝人。他把与李宪仲友的分离，看作是人生最大的悲痛；把后结识的李方叔的举动，看作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所以当李方叔以四丧未举，而见自己时，他毅然地赠以故人梁先所馈绢十四匹、丝百两，作为举葬资助转赠之。其实，这不是苏东坡的独举。他在阳羡时，就结识了居士章季默。“而父母与兄之丧，贫不能举”，亦求于苏东坡，苏东坡亦有以助之。后人评苏东坡友道曰：“其高谊盖出于天资矣。”天资者，即苏东坡人的本份也。一言中的。也难怪李方叔在祭苏东坡文中发出深沉的赞叹：“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

苏东坡是中国士大夫文人中尽孝的模范，所以他极力鼓励和支持他人的葬举。在哀词中，他赞美李宪仲友人“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汤旱。谁能脱左骖，大事不可缓”的友道风范，也赞美孝子李方叔“后生有奇骨，出语已精悍。萧然野鹤姿，谁复识中散”的道人风度。而且指出要辩证地对待孝道：生的时机，一切皆美，大行孝道；死后归土，一切空虚，并非久客。在《与李方叔书》中说：“深愿足下为礼义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讲的就是上面辩证地看待人生孝廉的意思。

苏东坡的哀词，辞越哀，意越深。“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墨子·修身》）当今之人亲丧未举，孝子欲尽孝，岂免求哀于时？假若借举葬图名唯利，光宗耀祖，以广求侈葬，则恐失“脱骖”之本意也。

饶学刚，黄冈师范学院退休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应似飞鸿踏雪泥

——陆志成著《苏东坡与颍州》评介

梁家贵

“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这两句诗在阜阳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诗的作者是北宋大文豪、政治家、教育家苏轼，他与阜阳有着不解之缘，曾两次到阜阳（当时称颍州）。在阜阳为官期间，苏轼爱民如子，兴利除弊，政绩显赫，深得百姓爱戴；同时，饮宴会友，赋诗著文，留下了不少佳作和胜迹，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阜阳厚重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轼为人豁达乐观，拥有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以及敢于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豪迈之情，深得人们的喜爱和推崇。然而，苏轼到阜阳为官迄今已有 900 余年，学术界尚未有一本系统研究他与阜阳这段历史的专著，这无论是对于学术界，还是对于阜阳人民的情感而言，均是一个不小的缺憾。陆志成先生新著《苏东坡与颍州》，2019 年 11 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41.6 万字，填补了苏轼与阜阳历史文化研究的空白，弥补了学术界这一缺憾，也极大地满足了阜阳人民迫切了解这段历史的需求。

《苏东坡与颍州》一书具有以下五个亮点。

一是立意高。作者从事苏轼与阜阳的研究并非出于纯粹的学术研究追求，而且基于一种强烈的为家乡文化建设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如在《后记》中所指出的，该书的撰写动机主要来源于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邓建设 2013 年 11 月 21 日在《阜阳日报》发表的《颍人愧对苏东坡》一文，认为“有很大触动”，“心中甚至还产生一种羞愧之意，尤其是了解到苏东坡一生的为人、为官、为文的情况，和他在颍州一些令人感怀的政绩之后，深深感到应该为苏东坡做点什么。”正是在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驱动下，年逾八旬的作者开始研究苏东坡、宣传苏东坡，为阜阳的东坡文化建设献计献策贡献力量。《苏东坡与颍州》的撰写是作者相关事项之一，也是服务阜阳东坡文化建设的重要体现。

二是视野广。《苏东坡与颍州》一书旨在还原苏轼在阜阳的一段历史，但作者的关注点并不局限于

此，而是运用多角度、全方位、立体性方法，既考察苏轼两次来阜阳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为官期间的主要政绩，如拒开八丈沟、通焦陂浚西湖、雪中赈饥民、治安缉盗贼、奏议解民悬等，记录了他留在阜阳的墨宝、诗文，以及行迹，还兼及有关人物如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以及“四学士”“六君子”，和事件如竹寺题诗案、乌台诗案以及远谪海南等。小切口、大视野。人们透过苏轼与阜阳这样一个切入点，了解到的是一个完整、实在的苏轼。一个有血有肉、丰满的苏轼便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三是观点新。《苏东坡与颍州》一书在研究领域、研究观点上有很多创新之处，如宋代文坛盟主责任交接、拒开八丈沟、疏浚西湖，以及苏轼的教育活动等等，分析透彻、新意迭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阐述了自己的探究和思考，同时还留给读者很大的回味空间。

四是根基实。历史研究特别注重史料翔实，要求论从史出，史由证来，史论结合。《苏东坡与颍州》一书坚持“杜绝戏说”，遵循了历史研究这一基本原则，既充分利用官修史书、地方志等古代文献资料，也高度重视今人研究成果；既深入分析、比较苏轼的相关著述，也广泛参证相关人员的著述。据统计，该书参考文献达 46 种之多，爬梳掇拾，钩稽推绎，从而使全书的论证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基础之上，具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

五是文字美。《苏东坡与颍州》一书文字简洁而流畅，叙述朴实而优美，议论精辟而透彻，堪称雅俗共赏、少长咸宜。从每部分的标题，到正文内容的表述都能看出作者匠心独运，颇费了一番心思，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力。因此，该书不仅可以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还可以作为地方历史文化辅助教材，为广大教师提供真实可靠的教学参考资料，为大中小学生提供知识素养。

（下转第 75 页）

“俯视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十二）

——历代对苏轼《易传》、《书传》、《论语说》的研究

舒大刚

王若虚批评苏氏之说的也不在少数：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引东坡“君子之丧亲，常若见之，虽欲变之，而其道无由，是之谓无改于父之道”。东坡之意在于说明，孝子心常念故去的亲人，没有可能改变哀亲心情，而与父亲生前所行的道无关，这主要是针对“绍述新政”说的。王若虚又引叶梦得、胡寅、游酢、张栻诸说，认为以上诸人皆“为说过正”。又“思无邪”，引东坡解，评曰：“予谓苏子此论流于释氏，恐非圣人之本旨。”而用杨时之说。又“吾道一以贯之”，东坡曰：“一以贯之者，难言也。虽孔子莫能名之，故曾子‘唯’而不问，知其不容言也。虽然，论其近似，使门人庶几知之，不亦可乎？曰：非门人之所及也。非其所及而告之，则眩而失其真矣。然则盍亦告之以非其可及乎？曰：不可。门人将自鄙其所得而劳心于其所不及，思而不学，去道益远。故告之以忠恕。其曾子之妙也。”又引苏辙《进策》、程颐、谢良佐之说，而总曰：“诸公张大之如是，其意必欲极‘一貫’之妙故耳，恐未必然。”又“朝闻道夕死可矣”，先引程颐说，既引东坡：“未闻道者，得丧之际，未尝不失其本心，而况死生乎。”又引苏辙：“一日闻道，虽死可以不乱。”评：“所谓过于深者也。”（俱卷4）又“宰予昼寝”，先引王安石说，继引东坡：“昼居于内，非有疾不可。予盖好内而怀安者。”评曰：“皆求之太过也。”（卷5）又“颜渊死”，引东坡：“古者行礼，视其所有而已。遇其有，则脱骖于旧馆人；及其无，不舍车于颜渊。”又引胡寅说，评曰：“予谓胡氏之论，若胜于东坡。”又“或问子西”：引东坡“或谓楚子西，非也。

昭王之失国，微子西，楚不国矣”。又引苏辙纠正东坡，谓“此盖楚子西”，王评曰：“予谓颍滨……似有理，然其自为说亦未当也。”（俱卷6）是用其弟而疑其兄。又“孟庄子之孝”，引东坡：“闻孟献子之孝，不闻庄子也。”意谓“庄子”当为“献子”之误，王氏评曰：“夫圣人以为孝则固孝矣，而必求他而证信，不亦过乎？”（卷7）一向善疑善辨的王若虚，不知何以作此模棱之论？又“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说“东坡以为子贡言此者，盖不许武王伐纣之事”。又引张无垢说，评曰：“皆谬见。”（俱卷7）又“子贡问政”至“民无信不立”章，苏轼解“孔子较礼、食之轻重，礼重而食轻则去食，食重而礼轻则去礼。惟色亦然。而孔子去食存信，……从孟子之说，则礼废无日矣”云云，王若虚评曰：“东坡以孔子去食存信之义，破孟子礼轻色重之论，以为使从其说则礼亡无日矣。张九成亦疑其非而置之不说。予谓不然。”（卷8《孟子辨惑》）由于王氏《论语辨惑》的目的是辨近世宋人过为高深的言论，故对苏轼的评论否定多于肯定，但并不能说明他对东坡其它《论语》解说就没有好感，观其“东坡之经解，眼光尽高，往往过人远甚”的称扬就可见一斑了。

孔子曰：“吾不仕故艺。”如果说正是一生不得志造就了孔子这位伟大教育家和思想家的话，那么苏轼晚年的贬官和闲废也促成了他完成三部经学著作而成为杰出的学问家。丰富的人生阅历，扎实的学术功底，飞扬的文采辞章，特别是大起大落的仕途生涯，都促成了他能够沉潜反复于圣贤之经，优游涵泳于道德

义理之域。他代圣人立言，借圣经垂教，将自己一生的学术心得，也将自己的一生不得志，含着泪，蘸着血，点点滴滴，著之丹青和竹帛。这三部学术著作，已经脱却浮华，洗尽藻丽，言言语语都是他心灵的绝唱，也是他理想的寄托。论东坡文学，自然有那万古流芳的雄文大赋、诗简词章；而论苏氏学术，我们除了对《易传》、《书传》、《论语说》进行深入研究外，还能根据什么呢？《庄子》说“《书》以道事，《易》以道阴阳”；孔子说“《书》以道事，《易》以神化”。《尚书》是对二帝三王远古历史的追忆，《易经》是天地阴阳、万物化育之演绎，那里有历史，有政治，有哲学，有科学，有天文，有地理……《尚书》和《易经》就是上古先民经验的总结，也是先民理想的寄托。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东坡贬黄州而作《易传》，这并不是历史的简单重演，也不是偶然的巧合，更非如扬雄、王通之伦企圣而拟经，那是大智之人在人生之旅陷入迷途时的冷静思考，是希望从人事的无常中寻找出宇宙有常的真理探索！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此夫子之自道，亦东坡所同感！其《与滕达道书》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岂在文字之间哉！《墓志铭》所称“既成三书，抚而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东坡寄意于后之“君子”者，岂在乎简牍之事乎！盖有以矣。

而后之“君子”，是否真的是东坡的知者呢？曰：唯唯，否否！其书也，始成之日，遇赦北归，由海康适合浦，东坡携以自随，猝然遇洪水之厄，虽然有惊无险，最终得以保全，可是她的主人东坡先生却天不假年，病疾卒于北归之途。抚书长叹，不能见其刻版行世，唯以托诸友人：“愿勿以示人”，而期“知者”于“三十年后”（何薳《春渚纪闻》卷6）。徽宗年间，党祸继起，先朝臣僚非贬即禁，元祐学术视若洪水猛兽，后死者也只有将其书谨慎缮录，“以待后之君子”而已。然而，文章乃天下公器，是非曲直公道自在人心，宣和年间有好事之人，曾于蜀中刻其《易传》以传，即其明证。

靖康之乱，党禁为开，南宋初政，高宗、孝宗相继奖谕苏轼父子兄弟，于是苏文盛行，士子文人仰之如泰山北斗。经解三书是否获得

皇上青睐，却史无其文。唯可知者，乃洛学门生的挞伐和口诛，尹焞、杨时先之于前，朱子、蔡沈继之于后。他们纵然对东坡的嘉言谠论、缜密考订不无勾取，但究属枝叶末节，无关宏旨。而对东坡的整体思想，特别是茕茕逐臣之泣血孤衷，不仅未能领会，而且反复申斥，必欲置之绝地而后已。朱子常说：“东坡解《易》，大体最不好。”“如说《易》说甚性命，全然恶模样！”在奉朱子为圣人的时代，有此一评亦足以定其生死矣。苏氏《易传》幸因世人神秘其书而犹有存，《书传》则因朱熹、蔡沈所摘引而几于不传，《论语说》则终因朱子所驳而诛绝。在徽宗朝，因政治高压使东坡三经解秘而不传，此人所理解；南宋朝苏氏文章得到皇帝重视，其书反而不显，此何故邪？得非朱子乎？

元、明、清科举程式，《易》用程氏《传》、朱子《本义》，《书》用蔡氏《集传》，《四书》用朱子《章句集注》，东坡三书益遭冷落，不绝若线。明嘉靖、万历间，厌倦于程、朱说教的有识之士，如唐顺之、胡直、焦竑诸人，搜奇访遗，重又表倡东坡学术，辑刻《两苏经解》，苏氏蜀学复又小盛于两百余年之后。迄至明末，凌濛初、毛晋诸人至有升苏子于孔庙，退程、朱于廊庑的倡议。然而，利禄之路在彼而不在此，诸人的热情呼唤终无如钦定学术者何！清人虽然不满于程、朱理学，但是那只是学问家不愿受其束缚以便于自出新意的愿望而已，对“奉天承运”的大皇帝来说自然愿意高歌“存天理，灭人欲”了，因为“天理”即天子之理；“人欲”即人民之欲。因此，由他们所敕撰（或御纂）的《四书五经大全》（或《汇纂》）无一不以程朱之学为宗，也无一不用程朱之“理”来论断天下之理。胡广《大全》不足论，即或是清康熙“御纂”的《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也不例外，他们都是以程朱的经典注释为准的，而“折中”诸儒以弥缝之。苏轼三书虽然在被“折中”之列，但也是支离破碎，最多不过充当补天罅漏的“五色石”而已。

近代以来，人们汲汲于从古人那里挖掘其“人民性”、“阶级性”，整个儒家都在打倒之列，更遑论影附于儒家经典而立论的诸儒传解！
(下转第 80 页)

扛鼎之作，情系栾城

——记陈冠明教授的苏味道研究

李升旗

如果系统地对“赵州苏李”乃至进而扩大到“文章四友”进行有一定深度的探讨研究，可以改写现有的《中国文学史》或《唐代文学史》。由李峤做领袖的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所实现的律诗“第一次飞跃”，不正是对诗歌盛唐气象的呼唤吗？而作为“苏李”连称结合体、李峤的忠实搭档“铁哥儿们”——苏味道（648~705），所发挥的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不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了！

归葬作为一种丧葬制度，自“周公盖祔”以来，一直相沿不改。从文献记载来看，人们对卒后归葬，都视为人生最后归宿，历代都是如此。唐代的归葬制度，是前代归葬制度的继续。苏味道卒于初唐后期，其官眉州，虽是贬逐，然非配流，卒前已拜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故其归葬当在此后不久，而且极有可能是诏丧。《栾城县志》说：“苏味道墓，在城西十八里苏丘村。”“丘”之为地名，有“丘墓”，“苏丘”者，苏味道之丘墓也。

1998年8月28日，在山东省诸城市召开的第十届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研讨会上，来自河北省栾城县的史志办公室主任、三苏文化开发领导小组负责人杨梅山，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大会发言《苏味道考索》会引起一位专家的关注！

年谱，成为献给十二届苏轼研讨会重要礼物

当天晚上，一位先生敲开了杨梅山的房门，来人中等身材，白皙面孔，一幅儒雅气质，

他——就是鲁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陈冠明先生。他对杨主任说：“你的发言很好，对我有启发，我正好在研究苏味道以及‘文章四友’，几年前就进行研究了，手里掌握有大量资料，苏味道和李峤的年谱已经写出大部分，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杨主任闻此十分高兴，说：“我们县里缺少研究人员，正需要专家学者们的帮助，2000年第十二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将要在栾城召开，这正好是我们献给大会的重要礼物呐！”

于是，陈教授在紧张的教学之余，抓紧撰写苏味道李峤年谱。2000年1月，冒着北方凛冽的寒风，他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三苏文脉之源、苏味道故里栾城，住在条件十分简陋的招待所里，没日没夜地苦干起来。赵新朝县长和县领导专程来看望他，出版年谱事宜，商谈十分顺利。3月下旬，陈教授第二次到栾城，送来书稿，进行一校。赵县长又来看望他，反复叮咛杨梅山主任：“一定要照顾好陈教授！”杨主任跑前跑后忙着照料，并特地抽调专人给陈教授做帮手，负责校对、誊写等杂务，做到有求必应。至5月底，陈教授第三次来栾城，进行最后一校，出清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苏味道李峤年谱》一书终于在6月初脱稿，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对苏味道、李峤以及“文章四友”的研究作了突出贡献！

陈教授在书中提出七个重要观点：

第一，唐初的文学馆学士制度造就了一批

杰出的诗人。文学馆创始自李世民的秦王府文学馆（李世民登基做皇帝前为秦王）当时有十八学士。到太宗朝设弘文馆学士，高宗朝设详正学士，武则天设北门学士、珠英学士，中宗时设修文馆学士，这些学士们的文学创作对当时的诗坛影响巨大，起着导向的作用。武则天任命李峤为撰修《三教珠英》的大学士，也是珠英学士的领袖；到中宗时李又为修文馆大学士，加上他丰硕的创作成果和突出的艺术成就，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时人称他为“文宗”。自然，“四友”也都是学馆学士。据陈教授考证，苏味道是珠英学士无疑，苏待诏禁中享受“北门学士”的待遇。可惜天年不假，苏没有来得及北归而早逝，没有成为中宗景龙修文馆学士。然而，苏李的文学地位，尤其是李峤的领袖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五言律诗、排律、七言律诗初步成熟于武则天后期到中宗时期，正是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们在竞争性创作中，使得声律艺术得到超常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诚如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所言：唐诗成熟走过了百年蹉跎的道路。然而，自南朝齐、梁间沈约、谢朓、王融等创立“四声八病”说之后，为什么历经梁、陈、隋，入唐后近百年，一直发展缓慢？而到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们手里时方才出现“飞跃”呢？这是学士们相互切磋、应制题诗唱和、比赛选拔邀赏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假如没有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们的努力，格律诗还不知道要发展几百年呢！也就不会出现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的巨匠了！这，决非危言耸听！

第三，李峤的《杂咏诗》百二十首，在诗人逝世 50 年后随遣唐使东渡日本，为日本嵯峨天皇（810~822 在位）抄写，该钞本已定为日本国宝。自日本平安朝（867~1086）以还，《李峤百二十咏》曾作为基本幼学读物，在宫廷贵族及士族间广泛流传。李峤去世 30 年后，唐天宝年间士子张庭芳为《李峤百二十咏》做注，序言中称赞李诗“藻丽词清，调谐律雅”。张注本也对李峤杂咏诗在日本普及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1900 年 6 月 22 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时，李峤《李峤百二十咏》和张庭芳注本的写本残卷也在其中。

第四，苏味道的五首《杂咏诗》虽然没有传到日本，但是他有一首诗传到了日本。据复

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先生考证，苏味道的《和梁王武三思于天中寺寻复礼上人之作》在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馆陈列有影印件，是随遣唐使东渡日本的。此诗为五言排律，“人寻鹤洲返，月逐虎溪回”一联，“鹤洲”用汉梁孝王兔园雁池地名，以切梁王武三思；“虎溪”用晋慧远送客过虎溪事，以切复礼师。此诗用典精切而对仗工整。流播东瀛，良有以也！另外，明代文学评论家胡应麟《诗薮》所列五言律诗范本，其中有苏李二集。胡认为，如果刻《初唐十二家》合集，其中应该有苏味道、李峤二集。

第五，“文章四友”的风格大抵可以一个“丽”字概之，或靡丽，或绮丽，或藻丽，或典丽，或清丽，或富丽，或宏丽，苏李的诗，概莫能外。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近伏盈川雄，末甘特进丽。”仇兆鳌注曰：“于杨炯则服其雄，于李峤则嫌其丽。”（盈川指“初唐四杰”的杨炯，特进指李峤。）《唐音癸籤》卷五说：“巨山五言，概多典丽。”（巨山是李峤的字。）苏味道的诗亦大概如此，如《初春行宫侍宴》“花柳发韶年”，《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赠封御史入台》“曲草对芳菲”，《嵩山石淙侍宴应制》“隐暖源花迷近路”等等。那么，苏李诗歌的风格是什么呢？可以概括为：边塞诗之雄放，应制诗之典雅，怀古诗之悲凉，田园诗之闲逸，送别诗之凄恻，写景诗之清新，杂咏诗之典实，可谓异样纷呈、尽显风流！

第六，唐开元时期诗歌评论家殷璠在所著《河岳英灵集叙》中云：“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即是说，唐玄宗宰相张说和徐坚率集贤院的学士们，进行了与中宗景龙修文馆学士一样的文学创作，促成了唐代律诗的“第二次飞跃”，遂使得盛唐诗歌风骨成熟、声律具备。然而，由李峤做领袖的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所实现的律诗“第一次飞跃”，不正是对诗歌盛唐气象的呼唤吗？而作为“苏李”之一、李峤的“铁哥儿们”——苏味道，所发挥的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不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了！

第七，关于如何看待史书上对苏、李的文学成就评价甚高，而对二人的官场品行极力贬斥问题呢？新旧《唐书·李峤传》上记载李峤：“不知逆顺，状陈诡计”“验以彌谐之道，罔有贞纯”“为世讥薄”“凡人有言，未必有德”。

时人张鎡讲：“李公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章，憎人才笔；性好贪浊，憎人受贿。”新旧《唐书·苏味道传》：“脂韦其间，苟度取容”“特具位”时号“苏模稜”。同是新旧《唐书》却又说他们是：“苏李文学，一代之雄。”“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这是为什么呢？陈教授认为：第一，从武后革命到中宗复辟、睿宗继统，再到玄宗登基，是权力政治斗争的集中高发期，而胜利者从自己的是非价值观出发，打击排斥退出历史舞台的异己，并借助修国史贬斥失败者，可谓颠倒黑白、倒上为下，越是在文坛上名气大的就越是把他们讲的越坏！第二，文学传播的方式是公开透明的，这与权力斗争的隐蔽和残忍性是两码事。同时，苏李的文学成就及文学作品已经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已经形成公论，想抹杀篡改也是做不到的！在唐代，从统治阶层到民间社会，都对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报有极大的兴趣，能够宽容、兼容一切，他们认为政治和文学是两码事，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唐玄宗时期修的国史，对苏李是一边倒的指斥责骂了！

陈冠明先生认为：“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系统地对‘赵州苏李’乃至进而扩大到‘文章四友’进行有一定深度的探讨研究，可以改写现有的《中国文学史》或《唐代文学史》。”

综括言之，“四友”先后由政治的边缘地带辗转走入了武则天政权的中心，成为武后新兴政权中以文词进军高层政治之典型的实例。自是，四人皆随武氏政权之兴衰而升沉。从上引诸多材料中可知，四人在宫廷中从文学贡献一端而言，名望最高者应是崔融无疑，李峤、苏味道向以“苏、李”并称，可相抗衡，然正如《新唐书·李峤传》所言“（李峤）前与王勃、杨盈川接，中与崔融、苏味道齐名，晚诸人没，为文章宿老，一时学者取法焉”，特以其年寿而影响至为久远。从宫廷文学上说，四人中显然以杜审言为最次。杜氏在宫廷的时间最短，两《唐书》也无他在朝廷作表章的记载；但从诗歌艺术成就上看，他又是个性最为鲜明的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章四友”名成何时，名次如何，不是关键问题。笔者认为，最值得重视的倒在于“文章四友”这一文学团体的形成方式——以文为友及其本身所隐含的社会

文化意义。以“文章四友”的形成过程为中介，我们或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视一下社会机制的转型是如何具体地渗入文学领域的，即以文为友的交游方式如何在唐人的文学道路上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风尚，从而最终影响到诗歌创作。

“归葬”，让争议和疑虑一锤定音

前些年，因为发现《苏氏族谱·苏味道传》中有记载：“葬公于眉之西南杨梅山。”而在眉州的杨梅山苏氏墓地，也有苏味道墓。因此，就有人提出栾城苏丘苏味道墓是假的，或者说是“衣冠冢”，甚至说是苏味道父亲苏崇的墓，据此认为栾城没有必要搞三苏文化了。这种错误观点一时引起争议和疑惑，但也立即遭到众多的驳斥，批评他们是否想把苏味道研究引向歧途！其实，陈冠明教授早在2000年8月22日第十二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上，在所发表的《苏味道归葬赵州栾城考》一文，就对此种无知妄议做了有力的批驳。这也说明，持此观点的人根本就没有读过或没有认真读过陈教授的论文！

苏味道归葬栾城，陈教授做了详尽而确凿的考证！

陈教授写道，苏味道卒后葬于何处，新旧《唐书》本传不载。神龙三年（707）八月，沈佺期由岭南贬所北归至潭州，闻友人苏味道、崔融相继去世，作《哭苏眉州崔司业二公》诗。诗云：“铭旌西蜀路，骑吹北邙田。”“骑吹”句，指崔融葬于洛阳北邙山；“铭旌”句，指苏味道权葬于西蜀。此为同时友人所说，最具权威性。《苏氏族谱》卷一苏味道小传也记载：“贬眉州刺史，复还益州长史，未就道卒……葬公于眉之西南杨梅山。”然而，清康熙《栾城县志》卷二却明确写道：“苏味道墓，在城西十八里苏丘村。”

一人而葬二处，且皆言之凿凿，如何解释这个谜团呢？陈教授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葬于眉山；二是葬于栾城；三是先葬于眉山，后归葬栾城。究竟葬于何处，他分析是第三种情况。为解决这一疑案，他对古代的归葬制度，尤其是唐代的归葬制度作了系统的考察。

“归葬”——指旅居异国、他乡之人死后由家人或他人将其灵柩送归故国、家乡安葬。

《左传·成公三年》载晋知罇对楚共王曰：“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归骨”即将骸骨归葬于故里晋国。《史记·管蔡世家》：“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悼公死于宋，归葬。”“归葬”一词出于此。“归葬”指归葬于鲁国。此皆为死于异国之人得以归葬故国的较早的文献，分别在春秋鲁成公三年（前588），曹悼公九年（前515）。

从文献记载来看，人们视卒后归葬为人生最后归宿，历代如此，《周礼》中称之为“公墓”“族葬”“族坟墓”，东汉时称“旧茔”。因特殊原因，不能归葬，权葬或暂厝于旅居地者，称为假葬或“权厝”。

唐代的归葬情况，有以下三种：一是归葬原籍先茔；二是归葬先茔；三是归葬先茔附近。

杜甫的归葬是比较典型的，现试以此例来说明：

《旧唐书·文苑下·杜甫传》：“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之前。”杜甫卒于湖南耒阳。元和八年（813），杜甫之孙嗣业，自耒阳迁杜甫之灵柩，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途经江陵，士曹参军元稹为作《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葬事于偃师。”系曰：“甫字子美。……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旋殡岳阳，享年五十九。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歿后余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说见拙著《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杜甫亲眷交游年表》）。

自唐宪宗元和年间杜甫归葬之后，湖南应该不存在杜甫坟墓了。但事实是，不仅河南、湖南有，湖北、陕西、成都也有。计有七处：湖南平江县治南三十瑞安镇小田村、湖南耒阳县治北原杜陵书院（今耒阳第一中学）内、河南偃师西首阳山下杜楼村、河南巩义西北康店镇康庄村邙山岭上、湖北襄阳城南岘山下、陕西长安韦曲镇东南少陵塬西、四川成都西郊。

晚唐诗人凭吊的几乎都是耒阳杜甫墓，例如郑谷《送田光》诗：“九陌低迷谁问我，五湖流浪可悲君。著书笑破苏司业，赋咏思齐郑

广文。理棹好携三百首，阻风须饮几千分。耒阳江口春山绿，恸哭应寻杜甫坟。”杜荀鹤《哭陈陶》：“耒阳山下伤工部，采石江边吊翰林。两地荒坟各三尺，却成开解哭君心。”贯休《读杜工部集二首》之二：“甫也道亦丧，孤身出蜀城。彩毫终不撅，白雪更能轻。命薄相如命，名齐李白名。不知耒阳令，何以葬先生。”

可以看出，除归葬偃师首阳山墓之外，在唐代切实存在的是杜甫卒地耒阳的杜甫墓，可能是归葬时，原墓保存，为衣冠冢，其他则是后人为纪念杜甫而建造的。

杜甫墓，便是中国历史上名人墓葬文化的一个缩影。

苏味道归葬栾城，根据历代礼制，理由有三点：

其一，归葬祖籍的礼制。归葬祖籍礼制，是最重要的礼制，历代遵循。苏味道祖籍是赵州栾城，理应回葬栾城。且其父亦是归葬，尤可证明，说见下。

其二，归葬先茔的礼制，即祔葬的礼制。

《旧唐书·苏味道传》：“长安中，请还乡改葬其父，优制令州县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为宪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又见《册府元龟》卷三十三。《新唐书·苏味道传》作“更葬其亲，有诏州县治丧事”。

“改葬”“更葬”涵义相同，知其父之墓原不在栾城。《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长安四年三月，系此事，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丧事。”胡三省注：“苏味道，赵州栾城县人。”意最显豁、明确。

苏味道之父名荣，据《苏氏族谱》《苏氏宗谱》，苏荣为梓州参军，当是终官。联系“改葬”“更葬”“归葬”等字样，可知苏荣卒并权葬于梓州（今四川三台）。至长安四年（704）诏丧，结合苏味道行事，苏荣权葬梓州，估计在二十年以上。

赵州栾城既为籍贯，又有苏味道先父之茔，故苏味道之归葬，亦是十分自然的事。

其三，“五世反葬”的礼制。

“五世反葬”的礼制，虽出于西周齐太公时期，年代遥远，但由于出自儒家经典《礼记》，因此，影响最大。其存在，与当时的昭穆之制相为表里，互为补充。而昭穆之制，唐代似乎仍旧流行。

以上三种礼制，都是以先茔为其核心内容。依据这种礼制，苏味道虽权葬于西蜀，而最终必须归葬，且必定归葬。

苏味道什么时间归葬栾城？是诏葬吗？

苏味道卒于初唐后期的 705 年，其官眉州，虽是贬逐，然非配流，卒前已拜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故其归葬当在此后不久，而且极有可能是诏丧。《唐会要》卷三八：“旧制，铭旌，三品以上长九尺。……皆书云某官封姓之柩。旧制，凡诏丧，大臣一品则鸿胪护其丧事。二品则少卿，三品丞。……旧制，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蚨，上高不过九尺。……凡石人、石兽之类，三品以上用六，五品以上用四。”苏味道曾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而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为从三品，见《旧唐书·职官志三》《新唐书·百官志四下》。所以，苏味道应该是诏丧。即权葬西蜀，若干年后，诏丧归葬赵州栾城。

退一步说，即使未能诏丧，其儿子完全有能力将其父归葬栾城。苏味道有子四人：仙，膳部员外郎；份，未仕；倜，兗州刺史；俛，太原府司录参军、职方郎中。见《元和姓纂》卷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四上》。苏洵《苏氏族谱》说：“唐神龙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是始。”据笔者考证，“留于眉”的一子是苏份。其他三子出仕当在开元中。扶柩归葬亦当在此时。苏味道归葬后，其权葬西蜀之墓尚在，苏份之留眉州，正因为此。唐人归葬之后，原权葬之墓仍在。如杜甫，宪宗时归葬，直至唐末五代时，罗隐尚有《经耒阳杜工部墓》诗，诗云：“旅魂自是才相累，闲骨何妨冢更高。”真像是杜甫之“旅魂”“闲骨”仍在耒阳。苏味道西蜀之墓，情况当亦如此。

康熙《栾城县志》说：“苏味道墓，在城西十八里苏丘村。”“丘”之为地名义，大致有三：其一，小土山。如山东有章丘、安丘，安徽有霍丘。其二，丘墟、村落。如《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说：“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正义引《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寿丘”“轩辕之丘”“姚丘”之

丘，均指丘墟、村落，故“姚丘”又称姚墟。其三，丘墓、坟茔。如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阖庐冢，在阊门外，名虎丘。”

《文选·王粲〈登楼赋〉》：“北弥陶牧，西接昭丘。”李善注：“《荆州图记》曰：‘当阳东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楼则见，所谓昭丘。”

栾城为平原地带，苏丘村无小土山，故第一义不合。苏丘如作为村落解释，应是苏姓人家居多，即苏家村；而此村实无苏姓人家，故第二义亦不合。因此，“苏丘”之“丘”，乃丘墓之义，“苏丘”者，苏味道之丘墓也。孔子有言，“礼失而求诸野”，今于村野之名，犹可考知当时村落命名之由。苏丘，今作苏邱，乃清雍正三年（1725）上谕避孔子讳，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字，并加“阝”旁为“邱”。地名之字亦用“邱”。

1999年11月初，栾城县人民政府于苏邱村苏味道墓遗址，重建苏味道墓；1999年10月18日清明桥（苏味道后人在清明节上坟路经洨河的桥，初建于明代成化三年1466年）修复；2001年10月1日苏东坡祖籍纪念馆建成。得其所矣！

李升旗，中国民族报社原副总编辑，科普作家，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上接第 68 页）

苏轼有“应似飞鸿踏雪泥”。陆志成先生的《苏东坡与颍州》一书必将有力推进苏轼研究乃至宋史研究。更重要的是，该书作为一部阜阳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必将在提升阜阳文化软实力，推动阜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建设实力阜阳、大美阜阳过程中发挥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

梁家贵，阜阳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圣方的绝配

方永江

正是海棠夭夭时节。

今年的海棠寂寞开无主，零落成泥兀自妖艳。阻击不期而至抑或如期而至的新型冠状肺炎激战犹酣，观测阻隔、化整为零是降妖除魔的良方。对于这个来势汹汹的瘟神，我称之为“新肺”，真个是无心无肺，你懂的。宅在家里，都太难了。海棠是不能亲近了，海棠诗篇只好演绎为隔空喊话网上切磋。说起三苏祠的海棠，宅里宅外的人总是不约而同地照见苏轼的红妆：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苏轼《海棠》

我对海棠的最初印象，却在边城漂泊。清瘦、烟瘾张狂而长发飘飘的王苑青，乃边城怀揣梦想的少年，那是需要仰视的。至今，读他1994年创作自传“籍贯阆中。有诗在《诗刊》等发表。面对诗歌，我为自己的动机不纯而忏悔”，也会油然而生“另类”之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穿了一条极新潮的牛仔裤去《乐山日报》副刊部游动。一年轻编辑随口说了句：“你这条裤子巴适！”“瞧得起，就拿去！”王苑青解带脱裤执意要送他……其诗曰《海棠香国》：

那一个匾是旧郡的珍宝
玲珑珑珑的是海棠枝上的腮香
一种柔软的氧气
遂在淋漓的字迹里蠕动

一笔一划都是根
是流水行云的气候

……
这种舞蹈是千年的口诀
臆想有期
盟誓无期
伸手去摹
睁眼去摄

奈何空有一招一式

或有书生押着韵

一念之间

吟为切齿的呢喃

……

“天下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因了上苍格外的眷顾，乐山发起飙来“古有苏东坡，今有郭沫若”，底气十足。分分合合，眉山与乐山长期一个锅里舀食，同样可以“海棠香国”自许。东风海棠因其精短生动、简洁明了，广为人知、广为人传，却不是苏轼最爱。此前一月的《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才是他的至宝。940年前的正月初一，“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石《元日》）参差十万家的开封城喜气洋洋，过江之鲫削尖了脑壳拼了老命小命往酒池肉林里钻；45岁的苏轼被御史台差人押解出京，踏上恓惶逆旅。早春二月，惊魂未定的苏轼，写下了这首诗。此后，长期的流放日子，黄茅冈上，黄皮寡瘦的苏轼，拄一根黄杨木的锄头，内心不知多少次翻江倒海这首诗；诵之一够，反复书写、广赠友朋。可有墨宝流入扶桑？耳熟能详的，是日本早早就有了“寿苏会”；奔走相告的，是这首诗新近成了东京大学考试题目。2020年的春天，除捐赠物资外，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化用苏轼诗句“我家峨眉阴”、“共饮玻璃江”，用毛笔写下“与子共饮玻璃江，遥看日升峨眉阴”，助力眉山战疫，最是暖心暖肺。从来天涯伤离别，940年后的春天，我每每读之，亦是涕泗横溢……

“远海何须恨，来游不偶然。风光类吾土，乃是蜀江边。”正是这首为“土人”不理不睬的海棠曲，天造地设般地把眉山与黄州连在了一起。以天下为故乡的苏轼，无论是高峰还是低谷，无论是突围还是超越，黄州对于苏轼而言，终究不过一个腾挪辗转的驿站，与其他历

典和宦迹的地方一样；而眉山苏轼对于黄州来说，则有“一自苏公到斯地，天下不敢小此郡”的非同寻常！苏轼所到之处，都让那个地方烙上深深的眉山印记，长成那里独具魅力的文化符号。正如林语堂所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一说起苏轼，都会引起亲切敬佩的微笑。苏轼把他所经历的地方，植入了千千万万景仰苏人们的心里，说起这些地方，同样总会引起亲切敬佩的微笑，滋生由衷的喜欢和惦念。吾州之俗、他郡莫及，沐仁浴义的苏轼，蔼然仁者，如和风轻拂山川，如丽日照彻大地，成就了这些地方，成全了这些地方，一一没有其他！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深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此刻，苏轼凝望着眼前这株海棠，思绪飞越关山，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南轩。五颜六色的鲜花开满庭院，郁郁葱葱的竹林、苍劲森森的柏树、低矮繁茂的桐花生长其间；黄鹂、画眉、喜鹊等鸟雀在花丛竹树间呼朋引伴、筑巢产卵，哺育幼鸟。一向慈爱、厌恶杀生的程夫人担心家人伤害鸟雀，一再告诫子女和婢仆，谁也不许捕杀鸟雀，掏取鸟蛋。不少在茂林修竹高处筑巢的鸟雀感受到了苏家人对它们的友善，纷纷把鸟窝安放在低矮的树枝上，鸟巢中嗷嗷待哺的幼鸟埋首即见，惹人怜爱。珍异难见的桐花凤竟栖息枝头、雀跃花丛，乡亲父老格外惊奇纷纷来到苏家一睹为快。这其中就有一株程夫人精心呵护的海棠：翩翩少年一步一趋，浇水、锄草、修枝，不曾想成了今日黄州的母本。往事越千年，眉山修建苏轼故里牌坊，两边立柱上欲镌刻极富眉山特色的文字，众说纷纭；“孕奇”、“蓄秀”，一锤定音。

苏轼的到来，眉山的秀奇，随这株海棠开枝散叶。乳母任氏十四岁入程家，侍奉程夫人。后随程夫人一起进苏家，从此，半个多世纪须臾不曾离去。苏轼横遭“乌台诗案”，任氏一直在为他担惊受怕。九死一生，今又随苏轼一路颠沛流离，来到僻陋多雨、气象昏昏的黄州。元丰四年，苏轼第一次游览赤壁没几天，七十多岁的老人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苏轼一心要奉养老人安享晚年，命乖时蹇，一至于此；肝胆俱裂，亲撰亲书《乳母任氏墓志铭》，刻之

于石，立于墓前：

赵郡苏轼子瞻之乳母任氏，名采莲，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俭，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与轼，养视轼之子迈、迨、过，皆有恩劳。从轼官于杭、密、徐、湖，谪于黄。元丰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黄之临皋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黄之东阜黄冈县之北。铭曰：

生有以养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从与享之，其魂气无不之也。

苏轼的这篇墓志，行文精简、情感克制，但透过苏轼鲜为他人作墓志的罕见之举，仍能感知其非同一般。离黄前夕，苏轼郑重将任氏墓的修葺、看护委托给黄州人氏潘彦明：

东坡甚烦葺治，乳媪坟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与潘彦明十首》六）

潘家对此十分留意。离开黄州后，每逢任氏的忌日，苏轼一定给潘彦明去信表达自己的思念。元祐四年，苏轼特意吩咐两个儿媳为任氏做几套衣服，托人带给潘彦明，请他烧化给乳母，细枝末节一一到位：

两儿子新妇，各为老乳母任氏作烧化衣服几件，敢烦长者叮嘱一干人，令剩买纸钱数束，仍厚铺薪刍于坟前，一醉而烧之，勿触动为佳。恃眷念之深，必不罪。（《与潘彦明十首》九）

任氏病逝一年后的元丰五年七月，苏轼与绵竹武都道士杨士昌再次泛舟赤壁，写下了《赤壁赋》，苏子曰：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我家江水初发源”。大江东去、华发早生，且让这同天风月带去对故乡的思念吧。苏轼恍忽又回到了纱縠行。一天，两个丫鬟在那里熨烫绸缎，其中一个突然惊叫起来。程夫人和家人闻声赶来，只见她的双脚深陷泥土。七

景苏札记

手八脚帮她把土刨开，拉她上来。这时有人发现，几尺深的泥土下面，有一个瓮，瓮上面还覆盖着一块乌木板子。七嘴八舌说瓮里可能装有财物，建议取出看看。程夫人说，那东西是前人埋下的，不属于我们苏家人所有，不能发取。她命人用土将坑填塞好，反复叮嘱大家不准去挖。事情到此没有结束，续集在苏轼凤翔签判时上演：深冬的一天，天下大雪，到处白茫茫一片，正在院中欣赏雪景的苏轼偶然发现，院中那株古老的大柳树下，竟然有块一尺见方的土地上没有丁点儿积雪。等到雪后天晴，那地方又隆起了一个小土包。苏轼就想，这下面是不是有古人埋藏的丹药呢，挖出来瞧瞧吧。他正准备叫仆役动手，王弗赶忙阻止说：“如果母亲还在，一定不会让你发掘。”听了妻子的话，苏轼一下子警醒了过来。弹指一挥间，眉山修起了苏轼故里牌坊，古纱縠行这面也要镌刻极具眉山特点的文字，同样众说纷纭；“崇仁”、“尚义”，一锤定音。

苏轼的到来，眉山的仁义，随这株海棠自在葳蕤。苏轼贬谪黄州的当年冬天，与友人同游安国寺，郑重其事写下了《记张公规论去欲》：

太守杨君素、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录之。

此文虽是养生活题，但我不仅作如是观。“其语有理”，苏轼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世人之病莫不“难在去欲”。今人之贝，执念成贪。贪心一起，利欲熏心、欲壑难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今同源。病根找到了，症状又如何呢？

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峨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此三十二字，吾当书之门窗、几席、缙绅、盘盂，使坐起见之，寝食念之。

对症下药，其方曰：

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

以当肉”。——苏轼《书四适赠张鹗》
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
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
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

——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其实，苏轼刚到黄州，就扮演起了悬壶济世的角色。

元丰三年（1080）三月，居无定所、贫病交加的苏轼，听说鄂黄民间有一对夫妻只养二男一女，过此数则将初出婴儿放入盆中溺死的恶俗，苏轼“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奋笔疾书鄂州太守朱寿昌，恳请他出面革除这种陋习。苏轼还给老朋友开具了处置良方：大义凛然的法律依据、义不容辞的职责担当、含仁怀义的有效监督、亲仁善邻的互帮互助。苏轼还把西晋王濬的善举和自己在密州收养弃婴的经验告诉了朱寿昌，目的就是要他断然出手施仁布泽。同时，自己也在黄州积极行动起来，联合一帮宅心仁厚的人成立了“育儿会”，布衣蔬食、随僧一餐也捐钱十千。仁心仁术、仁至义尽，自然仁者能仁、求仁得仁。活人无数，苏轼视为谪居黄州的一大乐事，喜作《黄鄂之风》：

近闻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盆中浸杀之，江南尤甚，闻之不忍。会故人朱寿昌康叔守鄂州，乃以书遗之，俾立赏罚以变此风。黄之士古耕道，虽椎鲁无它长，然颇诚实，喜为善。乃使率黄人之富者岁出十千，如愿过此者，亦听，使耕道掌之。多买米布绢絮，使安国寺僧继连书其出入。访问里田野有贫甚不举子者，辄少遗之。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

“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苏轼作陂种稻、身耕妻蚕的时候，童年好友巢谷千里来访。巢谷，字元修，因排行称“巢三”，也算奇人一个。巢谷举进士不第，改学骑射。熙河名将韩存宝教其兵书。元丰四年（1081）七月，韩存宝在泸州讨伐蛮乞第的战事中坐“逗留不进”之罪，自度必死，以银数百两托巢谷转交妻儿。巢谷改名换姓，怀银步行数百

里，终不负所托。巢谷唯恐连带之罪发，一直避祸江淮间；知苏轼谪居黄州，便来相从。绍圣初，苏轼兄弟远谪岭海，士大夫惟恐避之不及纷纷与他们断绝往来，平生亲友也无片言只语相间讯。只有巢谷慨然而往，万里步行去见苏轼兄弟，听说的人莫不笑其狂妄不羁、不识时务。七十三岁高龄、瘦瘠多病，远非依然似虎、风节愈坚的巢谷，见过苏辙后，不听一再劝阻，执意渡海去见苏轼。船至新会，遇上小偷，盗其盘缠，巢谷尾随，追至新洲，病歿于此。这是后话了。

苏轼不想使好友觉得自己是吃闲饭而内心忐忑，便请巢谷担任苏迨、苏过的老师，“师授极严”。此间，巢谷时常煮猪头，灌血膾，作姜豉菜羹，让苏轼不时品尝到家乡的味道。一天，巢谷说起秘方圣散子治疗伤寒极为灵验一事，苏轼惊叹之余恳请传授，以防来日不虞。此方巢谷是连亲生儿子也不传授的，见老友苦苦相求、个中又颇有心得，在反复叮嘱不能外传，并指江水为盟后，方始传授。时隔不久，巢谷与苏轼依依惜别于雪堂，回到眉山。

事有凑巧，鄂黄两地突发伤寒瘟疫，苏轼用圣散子救治百姓，活人无数。为了使圣方发挥更大作用，苏轼违背盟誓，将之传给当地名医庞安常，以期有益于后世。为使巢谷之名与圣方不朽，苏轼又特意作序一篇，其中云：

自古论病，惟伤寒最为危急。其表里虚实，日数证候，应汗应下之类，差之毫厘，辄至不救。而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凡阴阳二毒，男女相易，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守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差。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正尔无恙。药性微热，而阳毒发狂之类，服之即觉清凉。此殆不可以常理诘也。

若时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平居无疾，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圣散子叙》）

不残鸟雀，是仁；为仆作志，是仁；非义不取，是仁；移风易俗，是仁；见天下无一不好人，更是仁。不发宿藏，是义；相从不违，是义；背盟传方，是义；贫不改志，是义；不贪天之功为已有，更是义。性仁、行义，是圣

方的绝配，是绝佳的药引，没有她，再好的药也发挥不出效力；甚而至于，在治病救人、定国安邦中，她都是当然的主角，领演一幕幕仁爱忠义的大戏！

“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衙子飞来定鸿鹄。”（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早在黄州落脚之时，苏轼便在回李常信中说得明白：“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苏轼守其初心、始终不变，把一蓑烟雨活成了清风徐来；苏轼报国之心、死而已，把江海余生活成了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传奇。

“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哪忍触！”（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苏轼在垂老投荒、生死未卜之际彰显出的人性之美、人性之光，特别值得大书特书。苏轼拯救溺婴、助力抗疫“活人无数”，多少人因之苟全性命于乱世、多少家庭因之命运逆转。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的春季，苏轼的仁爱之心、忠勇之为，正在这片先贤智慧民族精神滋养的英雄之城、红色大地上，书写新的荣光。天涯流落豪迈放歌，直面对艰春暖花开！

方永江，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

清明祭扫苏洵家族墓地

4月3日，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严格按照疫情防治要求，组织在眉山的部分苏学专家代表张忠全、刘川眉、熊朝东、胡先酉、孙开中等，在濛濛细雨中，前往苏坟山祭拜三苏。

今年的清明祭扫苏坟活动简朴却郑重。祭拜仪式上，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方永江恭诵祭文后，全体人员怀着崇敬之心向先贤三鞠躬并献上鲜花。由于疫情的影响，不少苏学专家、苏学爱好者及市民等未能亲临现场祭拜，但他们也用自己的形式纪念三苏。

苏坟山位于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有苏洵、程夫人、王弗之墓和苏轼、苏辙的纪念墓。据有关文献记载，自康熙年间眉州太守金一凤带领众乡绅重修墓地后，清明祭扫苏坟便成为眉州一大文化盛事。敬苏、爱苏、拜苏、祭苏，眉山人用清明祭扫苏坟等形式传承东坡文化、传扬东坡精神，将文化的种子与精神的力量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

有愚，《苏轼研究》编辑。

郦波“三苏祠”开讲

5月9日下午，郦波走进三苏学社文化沙龙，以《三苏诗词与当代精神》为题，解读从眉山走出的“一门三父子”。郦波从三苏父子说起，讲到了三苏父子如何成为人生范本，当代人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

郦波认为，苏东坡是苦难造就出的一位“偶像”，正是因为苏轼在官场失意，转而将精力投入艺术创作、投入生活，进而才慢慢进阶成一位伟大的意境超然的文学巨匠。此外，郦波还分析了苏辙和苏洵的人生轨

迹，号召大家学习苏辙的行动力与苏洵不断丰富思想充实内心的思考力。

郦波从小在圣贤孔子的老家山东曲阜长大，他说“眉山与曲阜都是诞生过伟人的城市”，他从文化的角度寄语传承，“希望我们的城市气质与建设中带上‘三苏文化的基因’，让‘三苏文化’从小深入人们的生活，走进人们的灵魂。”

有愚，《苏轼研究》编辑。

（上接第70页）于是发于性情的苏轼辞章，因其有体察民间疾苦的内容而备受青睐，至于他那欲阐“千载微言”的《易传》，那“推明上古绝学”的《书传》，和他那“发孔氏之秘”的《论语说》，当然就只有求知音于天了（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后之君子”不以其书为“凶衰不祥之书”而加以褒讥贬绝，就已经不错了，东坡先生又何必求知于后人呢？历观古今学人，对东坡三书，其褒之者纷纷，其贬之也纭纭，爱之者欲捧上云天，升之入孔

子庙堂；而恶之者欲挤之下地狱，逐出圣人门墙之外。或褒或贬，皆无足痛痒，都对东坡三书的学术生命力无毫发增损，然而东坡三经解所寄托的孤衷隐曲，渺渺千载，卒未能发。岂不哀哉，岂不哀哉！子曰：“予欲勿言！”亦不得已也。

舒大刚，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